

# 新视界

## NEW VISION

2012 级迎新特辑 ..... P65

### 学术讲堂

全球化对于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 ..... P01

### 学术论文

联盟为何走向瓦解 ..... P05

### 书山有路

东亚区域主义的缘起及未来 ..... P31

### 聚焦

伯克利之旅 ..... P50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

## 编者的话

寥廓秋景中，落木纷纷未可留，轻扬向苍穹。

在天高气爽的秋季，伴随着丰收的喜悦，新一期《新视界》乘兴而来。在这样的时节里，悠久的南开园迎来了壮志满怀的新同学，年轻的《新视界》也将注入创新进取的新力量。在南开，新生的梦想与才华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而这里则尽显南开国关人的精神和特质。

本期《新视界》真诚奉献给读者与新生。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国的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和企业有怎么样的影响，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值得他国借鉴，岳健勇博士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视角；理解纷繁的国际关系现象需要国际关系理论的支持，联盟作为国家间互动的重要方式理所当然地成为理论的焦点之一，那么联盟瓦解的机制是怎样的，是否和联盟形成的机制相反，本期“学术论文”为我们理解联盟瓦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利用假期走出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和环境，是探索和完善自我的重要途径，本期“聚焦”栏目为我们讲述南开学子暑假在国外的丰富经历。

《新视界》倡导“原创性、交流性、知识性”，为国际关系不同年级同学之间以及与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每一个新生的成长都离不开师长的引导和鼓励，本期“迎新特辑”提供了国内外知名学者对学科感悟、学长学姐的经验以及学习的路径，力图为满怀热忱的新生提供指引，帮助他们了解大学、了解国关。这正是《新视界》无可比拟的优势，让有梦想的新人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提供奋斗的方向和超越的目标，增强国际关系专业的活力和知名度。在这个团队中可以学到对学习、生活有益的经验，增进与老师及外校师生的交流，认识更多朋友。这是南开国关靓丽的名片。

严谨、原创的内容是《新视界》最大的自信，也是每一个关注她的人所热切期盼的。每一期的《新视界》都会有所改进，从内容到形式以至细节。所谓“求其上者，方得其中”，只有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只有我们付出多于应有的努力，我们才能够做得更好、变得更加优秀。

唯有不懈努力，今日之《新视界》才能比昨日精进，而明日之《新视界》将比今日更胜一筹。日日上进，永无终止。

董柞壮

2012年9月

# 目 录



新视界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



2012 年秋季号

【总第 11 期】

2012.09 出刊

主编：李金潼

本期执行主编：姜忆楠

副主编：董柞壮 江育恒

吕海 孙迪

编辑部成员：

曹滢 郝丽君 权贤美

任娟 沈琳 石宇

孙跃 田光强 王芳琳

徐芳宇 杨雪 张晓康

左锦涛

校对：

曹滢 董柞壮 姜忆楠

江育恒 吕海 孙迪

封面设计：曹滢

美编：徐芳宇

编者的话..... (I)

## 学术讲堂

全球化对于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 .....岳健勇 (1)

## 学术论文

联盟为何走向瓦解? .....刘 丰 董柞壮 (5)

## 时事观察

金正恩时代的朝鲜动向.....李家胜 (29)

## 书山有路

东亚区域主义的缘起及未来.....李金潼 朱 旭 (31)

## 国关人物

罗伯特·考克斯.....江育恒 权贤美 左锦涛 (44)

## 聚焦

伯克利之旅.....曹滢 刘 明 (50)

牛津之旅.....刘雨晨 赵 政 (55)

印度之旅.....王芳琳 (58)

## 英采飞扬

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江育恒 (61)

危机救援基金.....吕 海 (62)

# 目 录

## 2012 级迎新特辑

- 梦圆南开 ..... 韩召颖 (66)
- 大师风采 ..... 斯蒂芬·沃尔特 (69)
- 名家话国关 ..... (73)
- 学习攻略 ..... (75)
- 班级风采 ..... (81)
- 国际关系专业学习入门推荐书目 ..... (84)
- 国际关系系 2012 届部分毕业生学位论文题目及毕业去向  
..... (87)

## 新书架 (三) ..... 郭晓琼 杨 雪 左锦涛 (89)

## 院系活动

- 学术交流 ..... (92)
- 师生活动 ..... (95)

## 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 (99)
-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 (100)
-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 (104)

## 读编往来 ..... (110)

##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 (113)

## 征稿启事 ..... (119)

### 刊物简介

《新视界》(季刊)于 2010 年 6 月改版创刊,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新视界》编辑部主办。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张睿壮教授语),在学院领导、教师的悉心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也得到院内外师生、校内外读者的关注与好评。

《新视界》编辑部下设编辑处、秘书处和宣传处等部门,由不同专业、年级在校学生组成。编辑部成员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以此为平台,活跃学术氛围、引导学术思辨、推动学术争鸣,为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者、学习者、关注者开启“新的视界”。

编辑部倡导“立足于南开,但又不限于南开”,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师生来稿来函,为刊物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和强劲动力。

### 通讯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新视界》编辑部  
(300071)

###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 网址: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newvision>

**注:未获本刊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本刊原创内容。**

## 全球化对于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

**【编者按】**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中国的崛起正是发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但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条件下面临怎样的挑战以及机遇，目前存在不同的观点。最近，岳健勇博士在牛津大学畅谈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本期学术讲堂带您一起领略岳健勇博士的珠玑之言。

主讲：岳健勇

时间：2012 年 5 月

地点：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欧洲研究中心

**主讲人简介：**岳健勇，知名自由学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化与中国的发展，东亚国际政治。1985-89 就读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在江苏和深圳国有企业工作 9 年，1998-99 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MBA 硕士，之后在瑞士跨国公司北京代表处任副总经理，后在新闻界短暂任职。2004 年留学英国至今。国内著名经济时政评论学者，《南风窗》、《凤凰周刊》等特约撰稿人，曾在《读书》、《战略与管理》、《当代中国研究》、《二十一世纪》等发表论著若干。

首先感谢约翰（John）的热情邀请。很荣幸今天能够在牛津大学谈论全球化——这是我最喜欢的话题之一。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全球化对于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我打算将这个题目扩展为“全球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目前的主流观点是，中国显然在高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方面从全球化中获益巨大。中国企业正变得更大更强，因此，中国正在快速实现工业化并成为经济上的超级大国。

我认为全球化对中国经济而言是双刃剑而非有益无害，因此我质疑这种主流的观点。一方面，全球化确实发挥了中国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刺激了中国出口导向型高 GDP；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将中国企业卡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阻碍其技术水平升级，从而限制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众所周知，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领导人做出的重要决定。这对中国的企业而言是一场冒险，因为在“入世”之前，这些企业与全球企业相比，在任何方面都极弱，彼得·诺兰（Peter Nolan）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研究，这些企业或者没有被征询意见，或者被排除在协议之外。与中国跟全球经济深度整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的传统观点相反，我认为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自然融合不仅是由于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成功，

---

\* 感谢岳健勇博士授权本刊首发。本文未经作者审校，翻译疏漏由本刊编辑部负责。

还在于改革和工业化的困境迫使中国尽可能早地加入 WTO 以保证经济增长。前国家总理朱镕基在 2002 年对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an Roach）说得很明白，“中国如果不加入 WTO，就不可能实现重组和维持经济增长”。

全球化的逻辑是竞争是万能的。竞争会使低效的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变得更有效率。但竞争真正的操纵者是政治。中国领导人在谈判桌上做出了广泛的让步。究其原因，是在 1989 年之后经济增长是其执政合法性的唯一可靠来源，加入 WTO 被他们认为是对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的重大刺激。

贸易和投资的激进自由化意味着中国放弃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在东亚生效的大部分工业政策。这违背了工业化先于经济自由化的通常做法。用夏俊昌（Ha Joon-Chang）的话说，“事实上，现在的所有发达国家在赶超阶段，都实施过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中国是个例外吗？

实际上，许多中国企业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已经发展为行业巨头。然而，这些企业都是在过去十几年间没有得到政府扶持的寡头国有企业（SOE）。私人企业在加入 WTO 前的 90 年代曾经受到鼓励，但是它们日渐陷入困境。总的来说，私人资本家的成长在政治上是不受现行体制欢迎的。与之相反，外国资本家在政治上的危险更少，因为他们关注的更多是钱而不是政治，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中国政府的同盟，因为它们游说中国政府将贸易从政治中剥离出来。

这些政策明显限制了私人企业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角色。更广阔的市场准入和廉价劳动力使得中国成为跨国企业心中最理想的产品基地，这些企业将“核心经济活动”重新定位于中国。他们是市场领导者，并且通过主导中国高科技部门和国际贸易增加竞争力。随着很多产业政策因 WTO 协议而无效，中国维持在国有部门的外部干预不是为了使得国有企业更加有竞争力，而是为了使它们规模更大、通过寡头或垄断取得更大的效益。

加入 WTO 后由于国外直接投资的涌入而带来的新一轮投资热潮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作为世界主要的制造业大国，中国毫无疑问是 19 世纪主导工业创新的英国的翻版。随着全球供应链的延伸，中国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装备制造基地。

面对跨国企业日益渗入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体系的形势，本土的企业不能在立足于中国国内市场基础上在全球层次上竞争。随着全球范围内国际劳动分工，本土企业在从先进国家的“设计、主要零部件和制造设备”进口方面的依赖日益加深。它们得到的只是最后劳动力密集装配阶段的微薄附加值（以苹果为例）。尽管它们进口尖端设备制造产品，鉴于相比外资企业无竞争优势可言的现状，它们几乎没有选择的机会，只得制造无差别、标准化的产品。这种所谓的商品化的生产降低了准入门槛，也急剧降低了本土企业的利润水平。

因此，本土企业不能在研发升级领域大量投资。截止 2005 年，在市场主导力量上，外资企业提升而中国制造业企业衰弱使得市场主导方换位。本土企业提出国家主导创新的理念，即要求国家提高研发投入、引入一系列产业政策提升本土企业的创新力以降低国内对国外技

术资源的依赖,争取从目前的 50% 降至 2020 年的 30%。

我不会细讲国内创新。这是傅晓岚博士的观点,该理念的重点在于加强国内企业的资本吸引力,通过强制实行“地方性内容”确保技术由跨国企业转向本土企业。除此之外,在 2005 年前后,中国政府在 2004 年制定了《政府采购法》,2008 年制定《反垄断法》。以上再加上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消退共同组成了中国产业政策以提升本土创新力。

然而,为提升国内企业原创能力而制定的中国本土创新计划被很多跨国企业视为“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技术剽窃计划”。外企对中国政府为平衡国内外投资技术而制定的“地方性内容”尤其敏感。这实际上夸大了中国追赶西方的能力,因为缺乏本土企业吸引力的重要提升,中国没有办法在长期竞争中脱离创新赶上西方,即使中国通过各种非常规途径获得复杂的西方国家技术。这与前苏联如出一辙。

此外,本土创新力毫无疑问是“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的,并没有违背中国的 WTO 协定。这些产业政策是 WTO 框架内的法律政策指导规范。例如,中国签订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禁止了“地方性内容”的原则要求,但是这些实际上是灰色地带,即中国可以在法律上把“地方性内容”规定应用到少数未开放的产业部门。

因此,中国不是在通过扶持工业化来寻求自由的全球化替代方案,相反,这是试图在严格的 WTO 规则约束下进行现代化的行为。从中美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中国进一步的自由化协定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这三轮对话中,中国同意向国外投资者开放“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能源储备和环境保护产业领域”,加入 WTO《政府采购协定》(GPA),撤回“地方性内容”条款,并且开放股票交易。中国不得不接受这些要求以换取美国继续向中国产品开放市场。

本土创新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中国在这一方面还远未取得成功,这部分是由于政策不连贯,部分由于来自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持续的自由化压力。结果外资企业的市场主导趋势在 2005 年后没有减弱反而得到加强。迄今为止,国外直接投资已经控制超过半数的中国国际贸易和 85% 的高科技出口。官方报告宣称截至 2009 年,由外资企业控制的市场已经超过国内产业安全水平。

因此,大多数的中国企业被卡在全球价值链的最底端,这证实了阿姆斯特登(Amsden)提出的非主流论证,即全球经济体系的后来者没有必要通过低端产业的专门化来实现简单工业化。除非大量专业的民族企业成为国内外市场的领头人物,否则国家无法实现产业化,这是实践的结果,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自我预言。产业化也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还需要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从任何层面来说,经济的独自增长无论如何都不是中国崛起的象征。全球化没有让中国成为产业的巨人,崛起的道路依旧是遥远的。

在现今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的成员有责任恢复全球市场的平衡。中国不需要采取美国的方式,后者通过在近 5 年内实施一些策略性产业政策来增加出口,将工业制造利润带回国内。制度性的产业升级受到 WTO 规则的阻碍,将增加中国实现从出口增长

型转变为创新增长型国家的难度，即使这有实现的可能性。

总之，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发展模式还远远无法成为其他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效法的成功模式。随着特殊的利益群体逐渐强大并控制国家政权，在威权政治的框架内不可能找到实现独立发展道路的改革政策。另外，中国出于国内综合发展考虑提出的对于全球规则的任何修订，都将冲击过去几十年费心建立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需要实现在国内外的两个变革。打破贫富分化的政治变革是必需的，却不是唯一的。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到全球制度变革中，实现全球化更有利于全球发展的目标。只有优化全球化，中国才可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同时实现全球经济更加稳定与健康。

[翻译整理：权贤美 姜忆楠 王芳琳 董柞壮]

[责任编辑：董柞壮]

### ..... 赖斯 .....

美国国务卿、黑人女性康多利扎·赖斯出生在种族隔离制盛行的伯明翰，小名康迪。很多人听说她在伯明翰长大，便推测她的童年没有受到过很好的教育。

母亲在康迪幼年时对她进行了孜孜不倦的音乐教育。在春季学期的某一天，她发现了新的目标。那门课是“国际政治概况”，那节课主要讲的是斯大林，教授是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父亲约瑟·考贝尔。“这一课程拨动了我的心弦，”她后来说，“这就像恋爱一样……我无法解释，但它的确吸引着我。”考贝尔博士被她的聪明和激情所感染，鼓励她到该校国际关系学院读书。考贝尔成为康迪生活中的“智力父亲”。

康迪开始学习政治科学和俄语，但并没有关上学习音乐的大门。这种背景使她最终成了一个为数不多的学音乐出身的政府高官。

康迪的勤奋为她进入白宫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整理：孙跃 彭紫嫣 于凯玥 王宝盆]



## 联盟为何走向瓦解?\*

刘丰 董柞壮\*\*

**内容摘要:** 在联盟政治研究领域,联盟瓦解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讨论。尽管国家之间为了应对共同威胁而结成联盟,但是威胁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联盟的解体。因此,联盟形成与瓦解的机制并不相同,维持联盟的条件消失或改变可能不会直接导致联盟瓦解。本文试图检验联盟瓦解的三项机制:威胁的上升和盟国间的冲突会导致联盟更容易瓦解;体系的不稳定以及联盟背景的剧烈变化会导致联盟的瓦解;而当成员国面临的外部压力越大、国内观众成本越高时,联盟越不可能瓦解。这些机制表明,背景条件和维持条件的改变会引发联盟价值的改变,联盟内部成员会在比较联盟价值和抛弃成本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抛弃联盟。通过改进已有研究中的变量并引入新变量,借助新的联盟数据库,本文应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对联盟瓦解现象的大样本分析表明,抛弃联盟是国家的一项战略选择,机会主义的表象背后反映了国家的理性考量,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联盟理论以及周边国家联盟政策的理解。

**关键词:** 联盟价值; 双边关系; 抛弃成本; 联盟瓦解

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联盟政治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关于联盟形成的经典阐述认为,国家之间建立联盟的首要目的是应对共同的外部威胁。<sup>①</sup>然而,联盟有立有破,成员国废除其参与的联盟也是国际政治中经常发生的重要现象。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在联盟的形成、演变、管理以及联盟与战争的关系等问题上都做出了比较充分的讨论,<sup>②</sup>但是有关联盟瓦解问题的考察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系统而成熟的研究。<sup>③</sup>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之所以缺乏重视,部

\* 本文是笔者主持的2012年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美国海外军事干涉行为与国际秩序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2YJCGJW007)的阶段性成果。在写作过程中,陈冲对论文设计提供了宝贵意见,阿拉巴马大学的道格拉斯·吉布勒(Douglas M. Gibler)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尼尔·纳兰(Neil Narang)博士耐心解答了本文的数据问题,笔者在此表示感谢。本文将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同时也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存在的疏漏由笔者负责。

\*\* 作者简介:刘丰,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邮箱 liufeng00@gmail.com;董柞壮,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09级本科生,邮箱 DongZuozhuang@gmail.com。

① 根据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研究,威胁主要包括综合实力、地理毗邻性、进攻能力和进攻意图,参见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 1.

② 对联盟形成的讨论可参见 Christopher Sprecher,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Timing of War Involvement,”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0, No. 4, pp. 331-347, 2004; Anessa I. Kimball, “Alliance Formation and Conflict Initiation: The Missing Link,”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3, No. 4, 2006, pp. 371-389;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 pp. 461-495;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James D. Morrow, *Game Theory for Political Scienti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有关联盟与战争爆发之间关系的研究可参见 Alastair Smith, “Alliance Formation and War,” *International Study Quarterly*, Vol. 39, No. 4, 1995, p. 405。

③ 阿维·科伯(Avi Kober)指出,学界对于联盟瓦解问题并没有对其给予应有的重视,参见 Avi Kober, *Coalition Defection: The Dissolution of Arab Anti-Israeli Coalitions in War and Peac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2002, p. 4.

大部分联盟是大国与小国或小国与小国组成的，而小国面临冲突和危机时更有可能不履行联盟义务。这一发现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涵，因为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面对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的制约，考察美国联盟体系的维持成本和联盟价值有助于在崛起中减少阻力。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周边小国并不必然捆绑在美国的联盟体系中，也有可能脱离与美国的联盟，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善中国的周边环境。其三，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体系结构以及战争和冲突经历等背景变量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联盟的价值，进而影响国家的联盟战略选择。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改进，我们发现，其他国家与超级大国之间的联盟更稳定，1945年之后涉及民主国家的联盟更不容易瓦解，这对于理解国家的联盟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并启发我们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进一步研究联盟这一经典议题。

[责任编辑：李金潼]

### ..... 早稻田大学 .....

早稻田大学(日文:早稲田大学, 平假名:わせだだいがく, 英文: Waseda University), 简称早大, 是本部设在日本东京都新宿区的私立大学。其前身是 1882 年大隈重信设立的东京专门学校。

早稻田大学是亚洲最为国际化的大学之一, 拥有日本最先进的图书馆, 留学生数也位居日本大学第一(2008 年), 学校推行广博教育, 宽进严出, 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 传统强势科目为政治经济学等文科科学, 毕业生在企业中的满意度常年雄居日本第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韩国前总统金泳三, 以及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 在访日时都选择了早稻田大学进行演讲。除了政治上令世人瞩目的影响力, 早稻田大学在科学技术上一样享有国际声誉。爱因斯坦就曾在 1922 年 11 月访问早稻田大学, 并在校园中央的大隈铜像前露天讲演。

早稻田大学培养了众多的政界、经济界和文化界的著名人士, 如陈独秀, 李大钊, 彭湃、石桥湛山、北原白秋、坪内逍遥、福田康夫、江户川乱步、村上春树、菅野洋子、吉野弘幸、大河内一楼、野田佳彦等。早稻田大学在中国的名声比其在日本国内还响亮, 恐怕是其和中国的联系之紧密以及培养了中国几代的革命者和人才是分不开的。

[整理: 孙跃 彭紫嫣 于凯玥 王宝盆]

## 金正恩时代的朝鲜动向

李家胜\*

金正恩正式成为朝鲜领导人时,朝鲜国内的局势与对外政策尚不明朗。彼时,金正日至少遗留给金正恩三大政治遗产:第一是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先军政治”,第二是对于朝鲜必须拥有核武器的坚持,第三是继续维护朝中友好关系。在这三大前提之下,朝鲜半岛的局势必然会平稳保持金正日时代的特征,即时不时爆发出一些“危机事件”。“先军政治”是朝鲜国内的传统,坚持这一传统,朝鲜国内文官政治体制的建立必然面临困境,国内的民主政治建设也难以推进。而拥有核武器,是朝鲜认为的维护其国家领土安全的必要手段。朝鲜至少面临两重安全困境,其一是南北朝鲜困境,国家统一是其长期面临的问题之一;其二是朝鲜与美日的安全困境,朝鲜一方面面临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对其严厉的经济制裁,另一方面面临着切切实实的美日同盟的军事威胁。与西方关系僵化的同时,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也出现微妙变化。一方面,朝鲜在国际现实的博弈中亟需中国的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朝鲜的拥核化也会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尴尬局面,朝鲜核问题的白热化令美日加强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这不仅威胁到朝鲜,而且也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因此,朝鲜的外交要有所突破,必须首先转变其对待金正日时代的政治遗产的态度,在国际社会塑造出新的形象,方能打破其所处的国内国际困境。

如上所述,朝鲜外交政策的新面貌必然与这三方面的转变紧密联系。首先,在“先军政治”方面,朝鲜国内近日的变化已经崭露头角。四月份,朝鲜尝试发射人造卫星,顿时让东北亚的局势紧张万分。好在卫星发射试验失败了,东北亚局势依然保持在可控的均势状态。当时国际各方的评论普遍认为,朝鲜的卫星试验失败远比成功要让世界乐见得多。西方对这一事件的代表性态度是,美日指责朝鲜是以卫星试验为幌子进行弹道导弹试验。因此这一尝试如若成功,就不排除美日对朝鲜按照处理导弹试验的国际危机去处理的可能性。如果说本次朝鲜卫星试验是军方强硬姿态的一次展示,那么七月份发生的事件则预示着“先军政治”的某种转变。虽然朝鲜当局对此表示否认,并且也指责西方国家妄自猜测朝鲜内政变局,但是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笔者也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判断。七月,朝鲜当局以“身体健康问题”为由解除人民军总参谋长李英浩一切职务;次日,玄永哲被授予次帅军衔,接替李英浩的职务;紧接着,金正恩获授元帅军衔,成为朝鲜历史上第六个获得元帅及以上军衔的人。本次高层人事变动加强了金正恩对军队的领导权。而李英浩作为金正日时代的将领,在权力过渡期的确对金正恩的权力巩固做出贡献。但是新任领导人要进行朝鲜的革新,必须弱化军队对国内政策的影响,而李英浩作为朝鲜“先军政治”的代表,在朝鲜国内变局中首当其冲,这是很容易预料的一幕。金正恩成为共和国元帅大大强化了他对朝鲜人民军的领导力。自此,

\* 作者简介:李家胜,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2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兴趣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与中国外交战略。邮箱:lijiaosheng.1989@163.com。

金正恩正式成为朝鲜国内党政军的领导核心。这对于金正恩推行朝鲜国内改革是一大突破，这个年青人的个性因素也会导致他将把朝鲜带入一个新的时代。金正恩是接受过所谓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教育的领导人，这一特征区别了他与朝鲜以前所有的领导人。

“先军政治”不是“唯军政治”，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客观的调整空间。

其次，金正恩上任后也面临着朝鲜半岛核问题。自朝鲜退出“六方会谈”以来，朝鲜核问题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在朝鲜看来，朝鲜本国必须拥有核武器，因为它时刻面临着美军在日本与韩国驻军的威胁，朝鲜若得不到美军的安全保证，那么自身就必须强化国家军事实力。解决朝鲜核问题，重返“六方会谈”，关键的因素是处理好朝美双边关系。前段时间，朝核问题有所缓解，美国有意给予朝鲜一定的粮食援助，以缓解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但是随着朝鲜在四月份发射卫星事件导致东北亚局势的再度紧张，这一“无核换援助”的交易也不了了之。在金正日时期，朝鲜经常借助核问题发出声音，引起国际各方的关注与地区局势的紧张。在新的时期，朝鲜要塑造新形象，这种老生常谈的状况必须得到改观。按照笔者评估，朝鲜的自身安全是否面临着绝对的威胁，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个人认为，朝鲜不必要拥有核武器，因为美国已经在朝鲜半岛这个地方摔了一跤（即朝鲜战争），美国当前的国内困境以及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局面也很难让奥巴马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朝鲜完全可以通过缓和政策打一场“擦边球”，实现国内经济的发展。毕竟，强大的经济才是武备的后盾。

最后，在对华关系方面，前期的朝鲜国际部部长金永日访华与中国中联部部长的回访为金正恩的访华已经做了充分的铺垫。金正恩访华也将成为金正恩时代朝鲜外交的开局。对于中方而言，朝鲜半岛局势的基本稳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关切。一个繁荣与稳定的朝鲜，是中国所希望的朝鲜。金正恩访华的重头戏当然是朝鲜国内的经济改革。朝鲜已经在中国南方等地区派遣了大量的工人与专家团队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朝鲜劳动力在中国东北地区就业以及中国赴朝鲜旅游行业都在蓬勃发展；同时，朝鲜也向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派出少数精英学习自由市场经济。这些事态都表明朝鲜经济发展将会成为未来外交的重点关注方向之一，而不只是核与国家安全这一单一问题了。当然，未来的金正恩访华也会提及朝鲜核问题。中国的表态不会发生变化，即不支持朝鲜拥有核武器。为此，金正恩不得不在朝中关系上寻找一个经济援助与核问题的平衡点。

那么，面对当前的朝鲜动向，中国应该如何研判与决策？个人认为，朝鲜半岛的稳定是中方在该地区的最大关切。“六方会谈”机制与朝中双边关系都是缓解这一地区局势的有效途径。但是，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朝鲜常常会采取“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因此，中方应该利用经济贸易、科技交流等多重手段加强对朝鲜外交决策的影响；同时，中方应该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不改变，坚持保障朝鲜地区基本稳定的努力不放弃，坚持反对西方武力干涉朝鲜内政的态度不妥协，坚持扩大中国在朝鲜地区影响力的措施不松弛。

[责任编辑：石宇]

## 东亚区域主义的缘起及未来

——评《经济区域主义的政治学：解释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sup>\*</sup>

李金潼 朱旭<sup>\*\*</sup>

**内容摘要：**区域主义是二战后国际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凯文·蔡 (Kevin G. Cai) 基于既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结合全球/结构、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因素构建了一个关于区域主义的综合分析框架，在与战后多边主义的比较中，把世界区域主义进一步划分为“硬封闭”和“软开放”两种类型，较好地解释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区域主义所呈现的不同形式。另一方面，蔡的研究在变量设置、关键因素的考察及对东亚区域主义的简单量化分析方面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关键词：**区域主义；硬封闭；软开放；东亚

### 一、问题的提出

二战后，美国凭借其雄厚的实力优势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方式逐渐建立起以西方主要贸易国家为主导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 (Liber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强烈支持多边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出于冷战地缘政治的考虑，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支持西欧战后恢复，并允许西欧采取与多边主义原则 (Principle of Multilateralism) 背道而驰的区域主义 (Regionalism)<sup>①</sup>措施，应对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面对西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种区域一体化方式也逐渐为拉美、非洲、亚洲等地区效仿。<sup>②</sup>自此，区域主义通过一系列区域贸易协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 成为战后国际经济中一股重要力量，这也被视为现代意义上第一次区

\* 感谢邓子立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及《新视界》匿名评审编辑的建议。本文将刊于《国际政治科学》2012 年第 3 期，作者同时也感谢该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 作者简介：李金潼，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1 级硕士生，邮箱 nklijintong@gmail.com；朱旭，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1 级博士生，邮箱 michaelzhuxu@126.com。

① 对“区域主义”的定义国内外学界未达成一致的看法，因为它通常不仅意味着地理邻近，还隐含着一种文化、经济、政治或组织的凝聚力。本文中，区域主义主要用于指特定地理区域内具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及组织凝聚力的国家间的互动。为了便于讨论，本文没有进一步区分“区域主义”和“一体化”，本文中二者的含义基本相同。见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1。另外，对区域主义概念的讨论可以参见 C. M. Dent, *East Asian Reg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Theodore H. Coh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Longman, 2003, pp. 273-310。

② 有学者认为，西欧的一体化在启动后更趋向于一种内生性的发展，而第三世界的 RTAs 则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其中存在一对根本矛盾：希望通过贸易自由化推动一体化的观念与企图借助进口替代促进工业化的保护主义逻辑之间的矛盾；此外，作为全球霸权的美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且普遍反对 RTAs。因此，这些效仿都没有成功。参见 Rune Dahl Fitjar, *The Rise of Regionalism: Causes of Regional Mobil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09; Theodore H. Coh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273-310。

域主义浪潮。<sup>①</sup>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东欧和苏联的剧变使得战后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铁幕”轰然落下，人为的东西方割裂逐渐弥合，世界再度连结在一起。随着冷战的落幕，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美国以其压倒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优势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谋求建立和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特别是 2009 年“重返亚洲”战略从“口号”转变为行动后，更不允许任何国家充当某个区域内的区域霸权，以威胁其在世界各个区域的“自由”和利益。考虑到在欧洲的教训，美国在东亚更多的是构建以其为中心的“轮辐结构”（hub-and-spoke structure），不断离心东亚区域的联合倾向。与此同时，全球化趋势和新一轮区域主义浪潮揭开了序幕，世界经济焕发出久违的生机与活力，世界经济版图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推动了欧洲以联盟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北美自由贸易区在美国的主导下匆匆组建和运转，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逐渐展开和深入，新兴市场国家把握全球化的机遇，经济取得强劲发展，各种区域组织或安排明显增多（见表 1），西方少数贸易大国主导的经济版图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表-1 不同时段区域贸易协定（RTAs）数量增加情况一览

年份	1947-1989	1990-1994	1995-2000	2001-2011	总计
时间间隔（年）	43	5	6	11	65
数量	76	33	6	390	505

（资料来源：表格为笔者自制，数据参见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ion\\_e.htm](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ion_e.htm)，数据统计时间截止到 2011 年 11 月 15 日。）

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和时代特征为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既往的区域主义研究，特别是对欧洲一体化实践的研究涌现了很多有益的成果，涉及联邦主义<sup>②</sup>、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sup>③</sup>、新制度主义<sup>④</sup>及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等经典理论，为研究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区域主义提供了富有创见的思想。然而，这些理论绝大多数仍是基于欧洲的区域一体化经验，当用于解释其他区域特别是东亚<sup>⑤</sup>的经济区域主义时则显得不太相关（less

① 值得注意的是，1949 年，苏联与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组建了经济互助委员会（CMEA）。尽管 CMEA 涉及技术合作等联合项目，但以国家中心主义导向的共产主义政治经济体阻碍了迈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真实步伐。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第一次区域主义浪潮始于 1957 年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和 1960 年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的组建。参见 Theodore H. Coh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273-310.

② 参见 Leon Lindberg,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③ 参见 Sajal Lahiri, “Controversy: Regionalism versus Multilateralism,”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8, No. 449, 1998, pp. 1126-1127; Albert Fishlow and Stephan Hagg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g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ECD, 1992.

④ 参见 Joseph Nye, ed.,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Readings*, Litt: le Brown & Co, 1968, p. 5.

⑤ 本文中的“东亚”范围限定在东盟 10+3 机制的所有国家、朝鲜和蒙古。

relevant)<sup>①</sup>。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的区域主义有什么差异?为什么民族国家(nation-state)会纷纷趋向区域一体化?为什么不同区域区域主义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东亚的区域主义和一体化进程有什么特点,其前景如何?加拿大学者凯文·蔡的新著《经济区域主义的政治学:解释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了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为我们从东亚各国及美国学者外的视角考察和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 二、区域主义:以东亚区域一体化为例

### (一) 区域主义: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

如前所述,二战后,现代意义上的区域主义浪潮始于西欧,尔后扩展于北美、拉美、东亚和其他区域,与美国倡导的多边主义相左。冷战后,政治、经济和技术力量推进了国家市场(national markets)<sup>②</sup>的全球化,同时促进了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兴起和深入。区域一体化因区域不同而相异,从西欧以政治动机和制度化为特征的一体化到东亚以市场驱动和“低制度化”(less institutionalized)为特征的一体化,<sup>③</sup>共同构成了世界区域主义的实践图景。有学者把前者称为“旧区域主义”(Old Regionalism),即由国家和区域政府间组织主导、明确限定区域合作领域且具有内向(introverted)保护主义色彩政策导向的区域主义,把后者称为“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即由国家、市场、公民社会和外部行为体共同参与、具有广泛区域合作领域且具有外向(extroverted)开放色彩政策导向的区域主义。<sup>④</sup>然而,蔡认为,无论何种形式或类型的区域主义,自 1980 年代中期复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会深刻影响 21 世纪世界经济的性质和演变。<sup>⑤</sup>

以往考察区域一体化的理论在某些方面提供了富有创见的思考,如有的学者考察了一体化的范围和行为体的动机,但是未能给予影响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更广泛的国际背景足够的重视<sup>⑥</sup>;有的学者关注了外部事件和行为体的角色,却没有回答国家为何走向区域化(go regional)

① 参见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reface, p. xii.

② 这是一个外来的概念,亦即“全国市场”或“统一的国内市场”。对此的简单辨析可参见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与空间结构》,《浙江学刊》2010 年第 4 期,第 5-14 页。

③ 参见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1; 对衡量区域主义发展水平的论述还可参见 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91, p. 12.

④ Fredrik Söderbaum, “African Regionalism and EU-African Interregionalism,” in Mario Telò, ed., *European Union and New Regionalism: Regional Acto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a Post-Hegemonic Era*, 2nd edition, Aldershot, England 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2007, p. 187.对“旧”、“新”区域主义的讨论还可参见 Björn Hettne, “Beyond the ‘New’ Regionalism,”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 No. 4, December 2005, pp. 543-571; Jens-Uwe Wunderlich, *Regionalism, Globalis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 Aldershot, Hampshire 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2007.

⑤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2.

⑥ E. B. Haas, *The Obsolescenc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9-11.

等。<sup>①</sup>由此，在蔡看来，它们都难以同时解释两个关键问题：（1）为什么民族国家致力于走向区域化？（2）为什么区域主义在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另一方面，虽然东亚区域成为当前世界最具活力的区域，相较于欧洲一体化，解释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文献还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为此，蔡在已有关于经济区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融合全球、区域和国家因素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以总体考察世界区域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

在讨论之前，需要对有关概念进行区分。罗伯特·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界定了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和帝国（empire），认为它们是相对立的现象。<sup>②</sup>简言之，纯粹的经济民族主义仅仅是依靠经济的自给自足，在现代世界这样的极端现象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冷战时的东方集团，虽然它们几乎隔绝了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但它们集团内部是有经济往来的。另一方面，一个世界帝国则意味着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和—一个世界政府下的单极权力结构，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存在过，古代中国和罗马帝国也只是在较大而有限的区域内行使过权力。蔡认为，世界经济生活是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现象，其间能被普遍认同的是多边主义和区域主义。多边主义是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倡导的原则，意味着非歧视性，即一国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给予其他所有成员国同等待遇，这根植于最惠国待遇原则之下。经济区域主义意味着在既定地理区域内一组国家在经济事务中对彼此的特惠安排（preferential arrangements）。<sup>③</sup>多边主义在战后的三十年居于主导地位，但1970年代后开始受到削弱，并与逐渐壮大的区域主义力量形成了对照。蔡认为，要判断世界经济是多边主义导向的还是区域主义导向的，一个恰当而便利的方法就是比较在非歧视原则下与特惠贸易安排原则下的世界贸易比例。<sup>④</sup>

大多数学者把1980年代中期后的区域主义称为“新区域主义”，蔡根据不同区域主义的特点进一步分为了“硬封闭区域主义”（hard-closed regionalism）和“软开放区域主义”（soft-open regionalism）。前者指制度化、歧视性（discriminatory）的区域主义，通常是政府间达成政治协定的结果，如当今的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就是其典型代表；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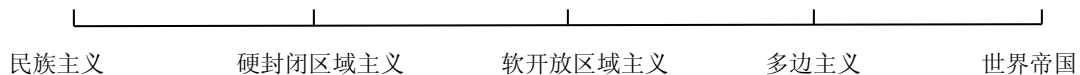


图-1 世界经济秩序的形式

（资料来源：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29, Figure 2. 1.）

①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8.

②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29.

④ 凯文·蔡在书中还介绍了其他判定方法，即比较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在贸易和投资流动方面的比重，政府在解决对外经济问题诉诸多边与区域或双边机制频率的差异等。详细分析见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p. 29-30.



指受市场力量驱动的非制度化、非歧视性的一体化进程, 尽管有时也会得到某些政府的鼓励和支持。通常情况下, “硬” 区域主义趋向于 “封闭”, “软” 区域主义趋向于 “开放”。(见图 1) 而区分 “硬封闭” 和 “软开放” 区域主义的标准主要是: 制度化水平、歧视的程度、对域外国家的开放程度等。

蔡关于经济区域主义的分析框架建立在一系列对全球或结构、区域和国家因素的假定之上。这些假定有以下四个:

假定 1: 经济区域主义的出现首先产生于国家决策者、精英和利益集团对外部和内部必要性的感知。

假定 2: 经济区域主义随后在速度、水平和形式上的发展取决于该区域在区域和国家层次上的特定条件。

假定 3: 区域主义通常会带来连锁反应效应, 即一个区域区域主义可能引发其他区域的区域主义作为回应, 并进一步加强这种趋势。

假定 4: 经济区域主义是逐渐演变的, 从较低层次的区域安排到较高层次并包含周边越来越多的经济体。<sup>①</sup>

基于上述假定, 蔡界定了某些重要变量以表征世界经济秩序的形式。<sup>②</sup>在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方面, 这些变量包括: (1) 区域主义的连锁反应效应, 记作 C1; (2) 国际相互依赖变量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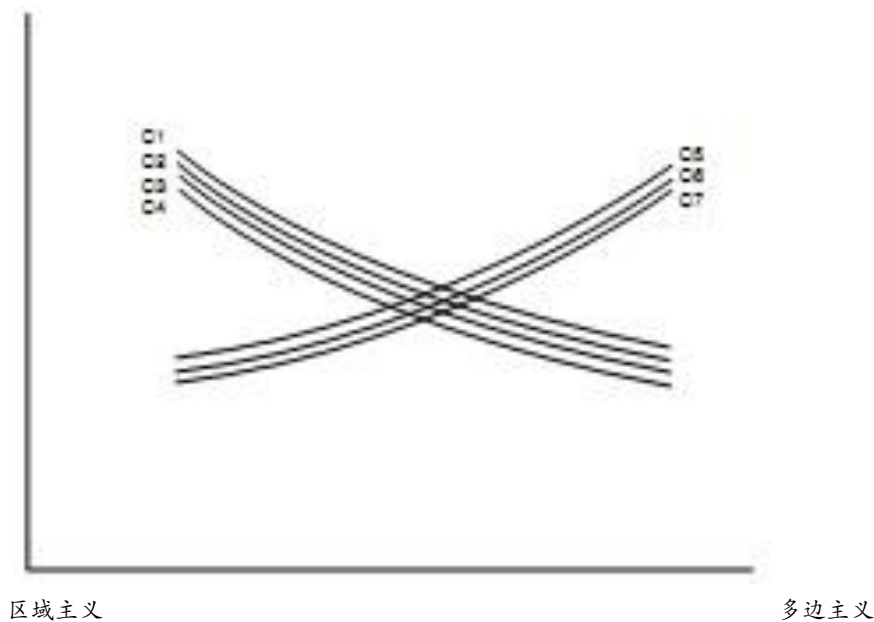


图-2 区域主义 vs. 多边主义

(资料来源: 见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34, Figure 2. 3.)

①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32.

② 详细的变量讨论可参见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p. 33-35.

和全球化的消极与积极效应程度，分别记作 C2、C6；（3）主要区域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记作 C3；（4）全球霸权权力的水平，记作 C4；（5）区域内国家经济结构的补充，记作 C5；（6）多边主义规范的盛行程度及国际机制的效力，记作 C7。

如图-2 所示，以 C1 为例，某区域的区域主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效应，即这种效应越强，引发其他区域采取的对应措施就越多，区域主义趋势就越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就被广泛视为是对西欧深入的一体化的直接回应，自此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实质性地转变了对待区域主义的态度并积极参与其中；以 C2 为例，如果国际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消极效应，或者就像基欧汉和奈所说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水平越高，则世界经济秩序越趋向于区域主义导向。1960-70 年代曾经出现的切断发展中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联系的呼吁可能源于对这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不满。其他变量可同理推导得出相应结论。

变量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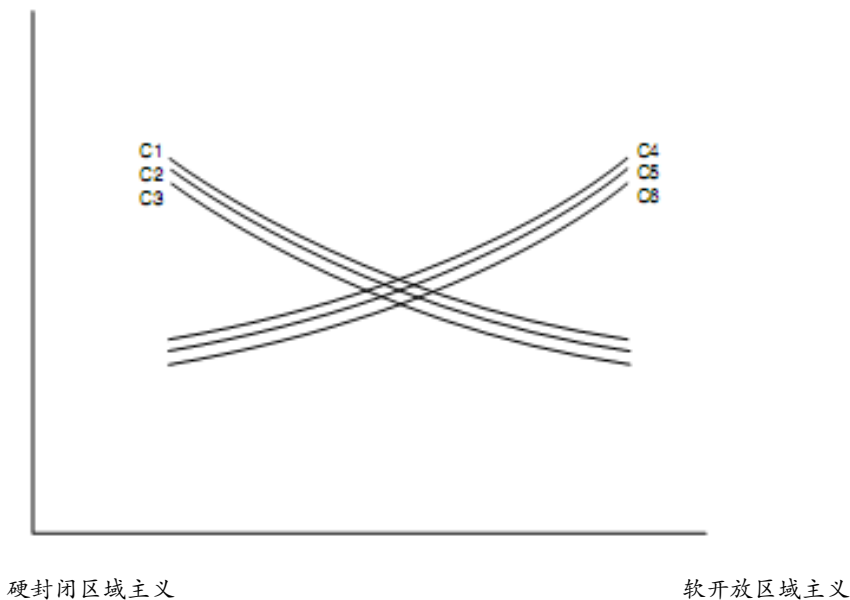


图-3 硬封闭区域主义 vs. 软开放区域主义

（资料来源：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36, Figure 2. 4.）

鉴于区域主义在不同区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形式，蔡通过六个变量（1）区域内贸易的依赖度及其他经济交流，记作 C1；（2）区域外部的竞争，记作 C2；（3）区域政治信任和共识、历史联系、文化临近、共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感和共有的利益，记作 C3；（4）与外部的政治、安全和经济联系，记作 C4；（5）区域经济体的竞争力，记作 C5；（6）区域内政治猜疑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多样性，记作 C6（如图-3 所示），来分别考察变量水平的

高低差异对“硬封闭”和“软开放”区域主义的塑造。<sup>①</sup>限于篇幅，仅以 C2 为例，即当某区域面临外部经济竞争越强烈，该区域的区域主义特征就越趋向于“硬封闭”，西欧的联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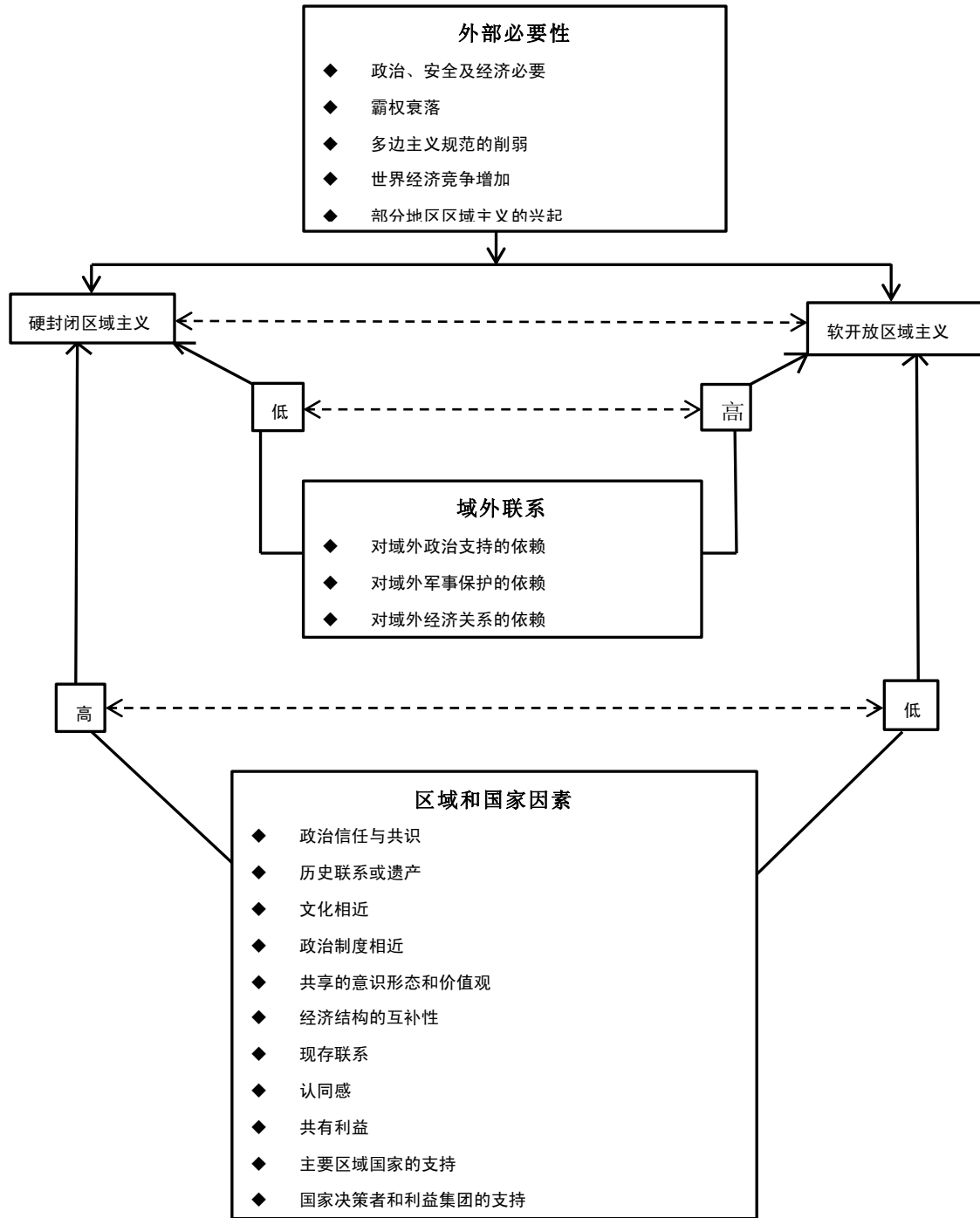


图-4: 经济区域主义的综合分析框架

笔者注：实线箭头表明关系属性是单向的，虚线箭头表明关系属性是可转换的。

(资料来源：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38, Figure 2. 5.)

<sup>①</sup> 对变量的详细说明可参见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p. 35-37。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来自外界的经济竞争的回应；反之，则趋向于“软开放”区域主义（如 C5）。

在蔡看来，区域主义的兴起和深入首先是由区域内外的必要（imperatives）所引起。随着美国经济霸权的相对衰落及多边主义规范的弱化，尤其是冷战后各国为了应对外部挑战、提高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浪潮下竞争力，更愿意走向区域联合。而任一区域主义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是由区域内现存的区域与国家方面的条件（如区域政治信任与共识、经济结构的互补性等）以及不同区域与域外的不同联系决定的。并且，随着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条件的变化或演进，区域主义的形式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由此，蔡构建了一个经济区域主义的综合分析框架（如图-4 所示）。

## （二）案例：东亚区域一体化

国际经济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政治格局和国家利益决定的<sup>①</sup>，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和演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两大最显著的因素决定——冷战政治和美国霸权。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随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sup>②</sup>，美苏争霸局面有所缓和，加上石油危机和尼克松“新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的冲击，美国支撑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意愿也逐渐降低，特别是随之而来的全球治理的多边主义框架越来越难以解决诸如世界经济新秩序建设、全球变暖、能源危机及全球金融体制改革等一些紧迫的问题，世界不同区域的国家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都试图仿效西欧的联合，推动本区域内区域主义的发展和深化，以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维护国内政治稳定。

此时，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利用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转移的机遇，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创造了“东亚奇迹”。特别是 1970 年代末，中国从封闭自守转向改革开放，主动参与到区域和国际经济活动中，改变了东亚政治经济环境，且为更加有效的区域合作和区域市场的扩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东亚区域内部的经济交往逐渐增多。然而，由于东亚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内产业结构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故大多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并通过政策优惠吸引外资和技术，形成了对域外国家政治、经济上的依赖。这使得东亚经济区域主义起初就带有“软开放”区域主义的特征。

尽管东亚国家间经济关系日密，但真正推动完整地缘意义上东亚经济区域主义“觉醒”的是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次危机波及了整个东亚区域，从侧面说明东亚国家间的实际联系(linkage)程度超出了人们之前的主观认知。各国开始迅速谋求区域制度化建设。

基于上述综合的分析框架，蔡认为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有五大重要因素：有利各方的稳定政治环境，生产要素和经济结构的互补性，需要集体有效应对的区域复杂问题渐增，

① 对此的详细论述可参见 Robert Gilpin, “Three Models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9, No. 1, Winter 1975, p. 37.

② 1950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占世界 GNP 的 2/5，而 1970 年则降为 1/3，1980 年更是降至 1/4。参见 M. Sakamoto, “Japan’s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J. H. Makin and D. C. Hellmann, eds., *Sharing World Leadership? A New Era for America & Japa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89, p. 182.

地理邻近带来的在货物、服务和人力流动上巨大的成本优势,不同程度的儒释道文化传统。

另一方面,尽管联合的力量强烈,更加制度化的区域一体化建设也面临着一些主要障碍。由于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差异,在东亚国家间经济因素的角色依然很大程度上限于政治关系之中,即传统观点的“低级政治”仍然通常会从属于“高级政治”;东亚经济体都是外部导向且严重依赖对外贸易;历史记忆也使得国家间信任脆弱。此外,东亚各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及在世界经济中的不同地位使得它们往往追求不同的政策目标<sup>①</sup>,这也使得它们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态度上不尽相同。

现阶段“软开放”区域主义不利于从根本上保护东亚区域各国经济安全,面对组建区域范围内自由贸易协定的困难和复杂性,这暂时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方式。同时,东亚国家政府正寻求一种实用、渐进的方式谈判和缔结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以期为将来真正区域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建设创造有利条件。<sup>②</sup>

### 三、学术贡献及不足

凯文·蔡从加拿大学者的角度为我们分析现代区域主义的演进和扩散,特别是东亚的区域主义发展路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书在研究问题及解释框架、研究方法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冷战后,在全球化席卷下,世界主要区域出现了众多区域组织或机制,使得区域主义成为一股各国都不可回避的力量。然而,各区域主义的动力不同,制度化水平不一。以往关于经济区域主义的理论主要探讨的是制度化的区域一体化,特别是欧洲的一体化,而本书在明晰世界主要区域的一体化特征基础之上,指出了相比欧洲和北美由政府谋划的、高度制度化的区域主义,东亚的经济区域主义肇始于一个自发的、非制度化的过程,它是在市场力量 and 经济发展需要的驱动下,随着迅速增长的区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动而产生的(见下表2),即东亚区域内贸易增长迅速,东亚与美国的贸易往来明显下降。这一区分廓清了人们对区域主义动力的模糊认识,并为作者构建一个经济区域主义的综合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蔡在解释一般的区域一体化现象特别是东亚的区域一体化形式和过程中,克服了强调体系压力或国家结构的不足,而是把区域主义的动力纳入体系压力、区域环境及国家内部结构的综合解释框架中,清晰地勾勒出不同内外环境对区域主义演进路径(即“硬封闭”和“软开放”的不同路径)的不同影响。欧洲的区域主义是在强大的体系压力下,为了谋求区域的和平及发展,各国达成了联合的共识;而冷战后的东亚在政治、安全、经济等方面的压力没有两极格局下那么紧迫,且区域环境及各国内部结构的多样化使得区域层面联合的共识或认同尚未形成。当前,欧洲与东亚的区域主义在不同发展路径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的分析框架

<sup>①</sup> 对此的类似论述可参见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2页。

<sup>②</sup> 见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p. 128-131.

为我们思考东亚区域主义的前景提供了全面的“理论地图”。

表-2 东亚进出口额分布，1985-2003

	区域内			美国			世界		
	1985	1995	2003	1985	1995	2003	1985	1995	2003
出口额	67.6	343.1	576.3	103.9	235.2	312.1	295.7	1002.6	1473.0
占总出口比重 (%)	22.9	34.2	39.1	35.1	23.5	21.2	100	100	100
进口额	67.4	340.4	563.9	45.4	158.1	148.4	253.9	899.7	1334.5
占总进口比重 (%)	26.5	37.8	42.3	17.9	17.6	11.1	100	100	100

注：进出口额单位为 10 亿美元。表格为作者自制。表中数据引自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94.

作者在分析区域主义兴起和演进的过程中，在研究方法上遵循了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一，蔡有意识地试图摆脱以往大多数研究“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性特点，在提出研究假定的基础上，努力抽象出一系列相关的解释变量，较好地同时回答了研究的关键问题，即民族国家为什么会趋向于区域主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能减轻有关国家单独面对国际多边主义框架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sup>①</sup>，不同区域的区域主义为什么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并科学地选取了有说服力的案例；其二，作者也试图寻求对东亚“新”区域主义的兴盛进行简单的量化分析。作者借助对 1980 年代中期后东亚区域内外的贸易及直接投资等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东亚区域内部经济依赖逐渐加深的进程；其三，作者在全书中娴熟地运用有关史料且有意识地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sup>②</sup>，清晰地展现了从战后到 1980 年代再到 21 世纪世界各地区域主义的发展图景，尤其是把东亚与欧洲在体系压力、区域环境及国家内部结构方面做对比，为人们思考和探索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路径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借鉴，并让人们轻松地从事恰当的比较研究中对作者论证的观点产生信服。同时，这也为人们借鉴历史、比较政治等学科的有益知识进行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sup>③</sup>

另一方面，本书虽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区域主义演进的综合分析框架，但在变量设置、关键因素的考察和简单量化分析方面也存在一些可供进一步商榷之处：

首先，蔡基于前人的研究构建了一个关于区域主义的综合分析框架，从本文图 4 的框架

① 有学者从成本—收益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了考察各个国家对国际规则的公共选择问题，即个体逻辑怎样形成集体逻辑并促进主权国家走向区域一体化。此外，他认为，现行的全球性国际规则的合法性不够，因为强势国家拥有对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力，企图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大家的利益。见张宇燕在第四届北京国际关系博士生论坛上的发言，载于吴彤、赵毅：《地区化的国际政治——第四届北京国际关系博士生论坛综述》，《国际政治科学》2008 年第 2 期，第 118 页。

② 目前国内的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研究在“比较”研究上还非常薄弱，对“比较”方法重要性的讨论可参见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中国需要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 年 10 月 20 日，第 231 期，第 15 版；李巍：《层次回落与比较政治学的回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7 期，第 52-56 页。

③ 国内部分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富有启发的讨论。参见唐世平：《浅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载于共识网 2012 年 2 月 10 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zd/sxyj/2012/0210\\_53384.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zd/sxyj/2012/0210_53384.html)。

图可以看出,作者包含的变量繁多,几乎把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可能因素尽收其中,过于庞杂,不够简约,有面面俱到之嫌,不利于判断出其中关键的(key)解释变量。此外,蔡在研究中模糊了区域和国家不同层面的变量<sup>①</sup>,且考察的部分变量有交叉之处,如经济必要性与经济结构的互补性等,显示出其分析框架的繁冗。

第二,作者认为通过“软开放”的区域主义最终能带领东亚各国走向一个高制度化水平的区域主义。然而,“开放的区域主义”本身就存在一种悖论,因为“完全开放的经济不能实行歧视,而贸易上的区域化却要求实行歧视待遇”<sup>②</sup>。笔者认为,1980年代中期以后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进展缓慢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东亚区域主义一开始就采取了“开放”的形式,很容易受到域外势力的干扰<sup>③</sup>,甚至被域外国家“各个击破”,进而形成了当前“软”或“弱”的形态。区域主义“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它是出于国家的理由而设计执行的”<sup>④</sup>,因此,笔者认为,区域内部经济交流或相互依赖的加深仅仅是区域一体化谋求制度化建设的助力,而区域内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和安全竞争程度仍然是区域一体化推进和深入的决定因素<sup>⑤</sup>,而冷战后的东亚区域安全的总体特征依然是竞争性的,故寄托于“软开放”区域主义推进东亚一体化迈向高制度化水平是难以想象的<sup>⑥</sup>。此外,我们需要明确,“硬封闭”区域主义在政治、安全、经济等行为中并非是排他主义的,不是“闭关锁国”,它们更多只是以一种联合的姿态出现,提高与对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为本区域谋求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福利。相应地,这会进一步加深区域内部的经济、安全依赖,深化区域合作,提高区域主义制度化水平。

第三,蔡在书中使用了一些经济数据企图对东亚国家经济关系进行简单的量化分析,但他忽略了这种经济关系内部的质量问题。综观全书,作者主要使用的是东亚各国间或东亚区域与域外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并未深入挖掘这些数据的结构成分。目前,东亚国家绝大多数仍是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居于半边缘的地位,依然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存在很大的依赖<sup>⑦</sup>,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意味着东亚国家尚不能像欧洲和北美国家一体化那样通过自身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

① 有学者指出,在分析使用数据时,还需要注意数据的测量层次问题,尽量避免出现生态学谬误(ecological fallacy)。简言之,生态学谬误是指将高层次的信息、经验、发现应用到低层次的分析单位上。对此的具体讨论可参见 William S. Robinson, "Ecological Correlations and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5, No. 3, 1950, pp. 351-357; 刘丰、陈冲:《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5期,第40页。

② 希夫、温斯特:《区域一体化与发展》(郭磊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③ 最近的实例就是美国企图在亚太区域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④ Ellen L. Frost, *Asia's New Regionalism*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8), p. 15.

⑤ 有学者认为,和欧洲、北美等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其他重要地区相比,东亚的安全构造是最不确定的。东亚地区安全中欠缺几乎所有的稳定要素,例如,没有一个区域性的多边安全制度、大国崛起、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多样性、领土争议、历史问题以及冷战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地区的残存等等。见朱锋:《“区域性”特征与东亚安全研究》,《当代亚太》2008年第2期,第62页。

⑥ 制度化水平与制度数量多少意义不同,因为数量多少不能代表运作质量和效力,甚至还会出现制度竞争的困境。见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第7页。

⑦ 有学者提出“无技术工业化”,即并不否定中国在某些尖端领域所取得的科技成就,而是指就整体而言中国高技术领域被外资牢牢控制、本国产业创新能力不足,因而严重依赖技术引进或外资技术转让,由此导致中国工业化进程缓慢这一不争的事实,对中国在技术创新上的困境进行了理论概括。对此的讨论可参见岳健勇:《全球化是中国的强国之路吗?》,《凤凰周刊》2011年第35期、36期。

因而也难以形成本区域主导的、高制度化水平的一体化。

#### 四、对东亚区域主义未来的一点思考

蔡在书中并未指出区域国家应该选择何种区域主义，主张各区域根据体系压力、区域环境及国家内部结构的综合因素来选择适合本区域的发展路径。

从东亚的历史和现实可以看出，东亚各国面临着复杂的体系压力、区域环境和国内结构。在体系结构上，当年西欧面临着苏联的“考验”，也承受着美国的“压力”，这对推动区域一体化产生了刺激作用。但从欧洲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看，西欧的联合很大的一个考虑就是在战后迅速恢复并向世界重新展示它的影响力，即西欧各国对联合在政治、安全、经济等方面的自主预期才是其不断推进一体化的关键因素。冷战后的东亚并没有两极结构下西欧国家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担忧那么沉重。区域周围除了美国似乎再没有第二个超级大国能对东亚安全形成威胁，且区域内主要国家至今尚未也不可能表现出征服整个区域的“野心”，这说明区域内国家对深入一体化的收益预期才是刺激一体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区域环境特别是区域安全方面，东亚表现出与西欧完全不同的形式。与西欧的多边安全机制或协定不同，东亚既存在独立自主的防务力量，也存在与美国签署的双边或多边防务协定，通常称为“轮辐结构”。东亚国家间长期痛苦的历史记忆使得区域国家间政治互信的形成面临极大的阻力：首先是区域主要大国——中日间由于曾经的战争、殖民历史，加上现实的政治、领土争端、国内民族主义因素，使中日双方缺乏战略互信，双方都希望主导区域一体化进程但又担忧由对方主导；其次是日本与其他东亚被侵略国之间经济交往水平大幅提升，但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致使后者对前者的意图不时保持一种怀疑态度等。这些都为美国势力介入东亚区域安全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甚至区域国家在美国的离间下对增进互信的信心进一步下降。以美国为首的“轮辐结构”得以持续获得动力，东亚似乎陷入了美国“玩转权力”（powerplay）<sup>①</sup>的游戏。

有学者认为，美国在东亚提供安全保障的行为保证了区域的稳定与和平。<sup>②</sup>但从以上简要分析中看出，正是美国对东亚事务介入过多，才使有关国家更愿意追随现有的可预期的“霸主”，致使该区域文化结构的塑造打上了美国的“烙印”，缺乏普遍的政治互信和区域认同，成为阻碍该区域建立有效的安全机制、迈向更高层次的安全合作形成诸如西欧那样的内部安全依赖的巨大障碍。而诸如安全等“高级政治”问题上困境的减轻甚至化解仅寄托于经济、文化等交流难以彻底解决，这种内部安全依赖的低层次成为目前束缚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和深

<sup>①</sup> “玩转权力”（powerplay）是指具有权力优势的国家通过构建非对称性同盟以最大程度上控制较弱盟国的行动。对此的详细论述见 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2009/2010, pp. 158-196.

<sup>②</sup> 参见[德]海因里希·克雷夫特：《美国——亚洲稳定的关键》，《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2期，第51-53页；Evelyn Goh, “Hierarchy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8, No. 3, 2008, pp. 353-354;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 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p. 49-51.



化的关键因素<sup>①</sup>，也就是说，东亚区域内部分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并不能促进该区域的一体化进程。要真正深入推进可持续的东亚合作，必须在东亚区域内形成共识，必须由区域内的国家主持。因此，“软开放”的区域主义只是为外部势力干预东亚事务、维护其国家利益做了“嫁衣”，并不能实质性推进东亚区域主义的制度化水平。

[责任编辑：姜忆楠]

### ..... “安全两难” .....

“安全两难”是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而导致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的现象。

“安全两难”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和命题，自 20 世纪中期该概念提出以来，被各国学者所广泛吸收。“安全困境”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巴特菲尔德把这叫做“霍布斯主义的恐惧”（Hobbesian fear）。他指出，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你会对其他国家有现实的恐惧感，别国也会对你有同样的恐惧感。也许你对别国根本无伤害之意，你所做的只是一些平常不足为奇的事情，但你无法使别国真正相信你的意图。你无法理解别国为什么会如此的神经质。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以为对方是有敌意的、无理性的，都不肯作出可使大家都获得安全的保证或承诺，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就是这种“安全困境”状态的产物。

针对“安全困境”问题，一部分现实主义者认为，只要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不得到本质上的改变，“安全困境”就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和消除的；而一些新现实主义者则主张以新的思维来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以合作求安全”的观点。

[整理：孙跃 彭紫嫣 于凯玥 王宝鑫]

<sup>①</sup> 与本文类似的观点可参见王传兴：《区域安全竞争中的东亚区域主义——基于对欧洲/北美区域主义的比较分析》，《当代亚太》2011 年第 5 期，第 28-41 页。

## 罗伯特·考克斯

**【编者按】** 罗伯特·考克斯是西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先驱。其理论特性,不仅表现在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上,也表现在对当今世界秩序的现实批判上。考克斯对世界秩序的分析始终强调历史辩证法,主张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发现矛盾与冲突、以及世界秩序的变化与发展。在他的学术生涯里,他以激进的独立立场、对主流理论的批判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而闻名于世。

### 学者简介

罗伯特·考克斯 (Robert W. Cox), 1926 年出生于加拿大, 1946 年毕业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 并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47 年起, 他进入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 (ILO) 工作; 在其间的 25 年中, 他曾任助理总干事, 参与设计创立了隶属于 ILO 的国际劳工问题研究所 (IILS), 并在 1965 年至 1971 年间担任该研究所主任。

1971 年起, 考克斯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组织。1977 年, 他受聘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一直工作至 1992 年, 之后成为该校政治科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名誉教授。退休之后的考克斯仍然活跃在学术界, 经常撰写文章, 举办讲座。

在任职 IILS 期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之初, 考克斯的学术研究仍然集中在主流领域,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组织问题。这与他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经历不无关系, 他也在其间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国际组织的研究专著, 如《国际组织: 世界政治》(*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orld Politics*, 1969), 《国际组织的政治: 多边社会和经济机构的研究》(*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tudies in Multilateral Social and Economic Agencies*, 1970), 以及与哈罗德·K·雅各布森合著的《影响力的剖析: 国际组织的决策》(*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Decision Mak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73)。

70 年代后期, 他的学术观点转而更加激进。在约克大学任教期间, 他重新以历史主义的视角审视国际关系, 创立并发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批判理论 (the Critical Theory)。这一理论立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哲学、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的理论和匈牙利思想家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等思想基础之上, 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支流。1981 年, 考克斯发表了著名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1986) 一文, 宣告国际关系研究的批判理论的诞生。1987 年, 考克斯出版了著名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 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1987)。在本书中, 通过鉴别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 考克斯创造了一种新的权力研究方法。

2002 年, 考克斯与迈克尔·斯切克特 (Michael Schechte) 合著了《一个多元世界的政治经济学: 对权力、道德和文明的批判反映》(*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Plural Worl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Power, Morals*



and Civilization, 2002) 在此书中, 考克斯重新审视了其在过去二十年的学术成果, 且以全球公民社会、权力与知识、多边主义、多元文明和世界秩序为核心, 探讨了二十一世纪初的全球化浪潮。

## 一、考克斯对世界秩序的历史主义分析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是考克斯探索世界秩序的最重要成果, 该书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变革的理解, 体现了其批判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视角。全书共包含三大部分、十个章节, 分别为:

1. 社会的生产关系, 包含生产关系的各个部分、简单再生产、资本主义发展、再分配型发展四个章节。考克斯集中讨论了各种现存的生产关系方式, 它们产生于资本主义和再分配型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过程, 经发展演变后形成了今天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方式在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典型布局, 其中有些方式占主导地位, 其余的则是附属性的。

2. 国家、世界秩序和生产关系, 包含自由主义秩序的来临、帝国主义竞争时代、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三个章节。这部分探讨的是国家如何决定生产的组织, 即使国家不直接参与组织生产, 也会通过建立法律、制度、惯例和政策的框架来对其施加影响; 国家可以动员和引导社会的力量来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 或创立全新的秩序。

3. 生产关系在缔造未来的努力中作用包含世界经济危机对国家和世界秩序结构的影响、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嬗变、阶级和历史集团的形成三个章节。这一部分阐释了生产关系在缔造未来中的作用。人所组成的社会力量由生产、国家和社会秩序所形成, 而它们又决定着明天的秩序。考克斯试图对人的因素进行描述, 并提出由人组成的社会力量在建造未来时所面临的各种选择; 他旨在以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派的批判理论视角, 从权力与生产之间对应关系的角度解说目前的历史变化。

考克斯主要借助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和政治理论来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框架, 其独特的方法论和分析视角在此书中也得到集中体现。这一方法论特点是坚持发展认识论, 突出本体相对客观性, 强调意识的反思作用以及关注变革。考克斯根据“实践哲学”提出了国际关系的历史主义结构分析方法: 物质能力(生产手段和毁灭手段)、意识(主观共识与集体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各种组织和国家机构)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的行为的历史具体的环境制约; 这三股力量都是来自于实践, 且彼此没有还原性。这一历史主义的结构使国际关系研究的本体具有变化性, 且这一变化性要求认识具有不断的发展性; 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本体使现实与结构只具有相对客观性。这就强调了意识对本体的建构作用, 体现出意识反思的重要性; 而否定本体的外在本体性本身表明了对现存秩序不可变化的挑战, 以及对变革的要求。考克斯用历史结构分析人类活动的三个领域(生产、国家形式和世界秩序)及其相互作用关系, 并通过对生产组织分析研究了各种生产关系下社会力量的形成基础及其相互权力关系(即阶级分析)。

结合本书的布局,以下笔者将重点着墨于生产关系这一贯穿本书的核心概念,另介绍考克斯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霸权和世界秩序变革。

首先,考克斯认为生产的社会关系包含三个方面:第一,生产的社会背景决定了要生产何种产品以及如何生产;第二,在生产过程中,多数的生产活动需要角色的互补,即劳动生产需要社会分工;第三,生产报酬的分配由一定的惯例——即社会的权力结构决定。从分析角度区分的以上的三个方面决定生产性质的社会权力的积累、由生产过程内在的动力所形成的权威结构以及这两者造成的分配格局,在历史上辩证地互相联系,并结合成一个单一的整体(即生产的社会关系);而在整体内部,三者又相互矛盾、制约。

在考克斯看来,生产关系、生产的社会关系、生产的权力关系指的是同一种关系,区别在于强调的重点不同。生产关系外延最广泛,包括人与自然世界的技术关系,也包括劳动个体的关系,同时包括从这些关系中产生的、管理组织这些关系的法律和制度形式。探讨生产关系时,应从一般性意义入手,将劳动定义为旨在满足人的需求和愿望而改变自然的行为;而劳动既产生了满足人的需求的物质条件,又创造了这方面的社会和道德条件。在具体研究生产关系时,则需要把一般性概念分解为具体的类型,同时这些生产关系也与由国家控制的其他社会方式相互联系。因此,概括来说,生产关系有三重内容:统治生产的权力关系、生产过程中技术和人员组织、前两者决定的分配关系。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客观因素外,还应考虑相关的主观因素,即同属某一方式的人们对彼此之间的关系和行为目的有着相同的理解,主观与客观因素之间的相互配合决定着制度。这三者之间的实际存在或潜在的脱节与矛盾就是变革的来源。

其次,在考克斯看来,霸权与三大要素相关:物质权力的分配格局、世界秩序的主导性集体概念(包括一定的规范)、一组以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方式治理世界的制度(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个别国家实现主导地位的赤裸裸的工具)。简言之,“霸权是权力、观念和制度的三位一体。”在本书中,考克斯对美国霸权进行了结构与机制的分析,美国这个新的霸权是通过大国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改变而形成的,反映了各国经济与生产力量对比的决定性转移,但是并未产生新的积累结构,而是保留了帝国主义竞争时代初期出现的、从 19 世纪末经济衰退后产生的积累结构。而在美国霸权时代,出现了生产的国际化和国家的国际化。生产的国际化就是如跨国企业的生产及服务的外包等改变古典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的变化,而国家的国际化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政策和管理调整以适应国际性生产为特点的世界经济的要求的转变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世界经济中地位不同的国家形成了与自身地位相适应的国家形式,外部压力加上国内社会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的调整,造成了国家社会结构的改变,总体来说,国家的国际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含义:(1)在共同思想框架中(即对经济事件进行解释的共同标准,和以开放的世界经济这一思想为基础的共同目标),有一个国家之间关于世界经济的需要或要求达成协商一致的程序;(2)对协商一致的过程的参与分不同的级别;(3)国家内部结构得到调整,以最有效的形式把全球协商一致落实到各国政策和惯例中。如联合

国、IMF 等国际组织的成立，欧盟等地区性一体化组织的发展都是国家国际化的表现。

最后，考克斯认为，从历史上看，世界秩序结构的改变是一个复杂的进程，同时涉及四个方面的情况：主要国家相对力量的改变；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社会间生产能力的重新布局；社会内部各群体间相对力量的变化和新历史集团的组成；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即新的生产社会关系的建立；以及新的资本积累机制的成立。关于世界秩序变化的影响，考克斯认为，“世界秩序中质的区别影响到战争的性质和发生率、解决争端的方式以及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前一个世界秩序与后一个世界秩序在这些方面的区别由国家和生产的形式所决定，而世界秩序一旦确立以后，反过来又为某种国家和生产形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其中，经济危机、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等都是导致世界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之所以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在考克斯看来，就是因为现存的世界秩序存在根本性缺陷，本质上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这一秩序的受益者。

综上，《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一书目的是批判性的，即旨在找出最有用的方法来理解社会和政治世界，以求改变世界；而其批判性的理解集中注意的是变化的过程而非结果，是发动社会运动的可能性而非运动可能实现的结果。考克斯独特的思考方式为理解国际关系和社会变革提供了新鲜的视角。

## 二、考克斯理论的批判性

考克斯是西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先驱。如果我们从批判理论的界定来看，他获得这一称号是名副其实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霍克海默曾对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有过这样的界定：传统理论是把自己置于现存社会据以再生产它自身的专门化的劳动过程之中，即从恒定不变的既成事实出发，得出与现存社会秩序协调的“顺从主义”结论，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再生产过程；而批判理论则是把自己放在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制和现存劳动分工之外，使自己能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便破坏一切给定的东西，证明它们不是所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最终目的是否定现存社会再生产过程并重建新的社会秩序。

考克斯的理论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其特性一方面体现为对现实的批判，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

考克斯的理论旨在通过对现存世界秩序的解构，引导人们去理解世界秩序，进而认识世界秩序制度安排的人为性，以及这种人为安排的世界秩序的不公正性。实质上，考克斯希望通过引导人们否定世界秩序的“客观性”，进而为建立新的更公正的世界秩序而努力。

考克斯对现存世界秩序的内在矛盾与冲突的分析，实质是对全球化世界秩序中人为不公正性的批判。考克斯将对国际关系、世界秩序的分析最终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他指出，一种资本主义霸权的世界秩序最终来自某个霸权国家的生产方式，从而把对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的不公正性直接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他认为，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中的不合理、不公正，不是源于给定的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征和国家间不变的利益冲突，而是最终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于创造和维护这种制度的资产阶级。考克斯的这种分析与所有马克思主

义者一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和国际社会)弊端的病源。

考克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贡献是他对理论的批判。考克斯用历史的实践观批判了维护现存世界秩序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他认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是以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是具有工具理性的国际关系主体为假设前提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维护现存的世界秩序,为现存世界秩序的受益者进行辩护。

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政治结构不同于国内政治结构,它的组织原则是无政府,国家在国际关系中都是同质的,为了自身的安全总是倾向于最大化地追求权力,国际秩序就是一种权力的平衡。从这种逻辑来看,处于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主导者追求国家平衡,压制任何新兴的国家发展与兴起,乃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是不受道义质疑的,因为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都是相同的,都具有工具理性的本质。无政府的国际政治特征给国家带来的总是安全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个理性的国家必然通过“自助”的努力来防止这种不确定性。

与新现实主义相比,新自由制度主义也强调无政府国际政治特征对国家利益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它更强调国际体制能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尽管由某个强国制定的国际体系在道义上存在某些缺陷,但相较于没有国际体制的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动荡,它是有利于绝对地增加国家利益的。在这种条件下,理性的国家即使在国际权力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应维持这些体制,进行合作。新自由制度主义希望把现存的有利于某些发达国家的世界秩序维持下去。

针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共同的假设基础,考克斯认为,国际政治结构是建立在世界分工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它不是无政府的,而是一个霸权国家通过国际生产关系建立的国际统治结构,是一种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具有给定性。国家不是一种方法论个体主义下的原子化个体,而是一种世界生产关系和国内生产关系的历史具体的产物(或者说市民社会的产物),国家的“理性”(身份与利益)也具有历史具体性,不具有跨历史的永恒性。权力绝非是一种纯物质的强制,它还包括意识形态的认同,它产生于社会化的过程之中。从这一点来说,国际关系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秩序中的政治关系,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国家及国家利益都是生产关系的历史塑造,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产生于生产过程之中,并通过国际组织使之合法化。这一切都是人为的产物,而非“外在客观”的必然结果。世界生产关系过程中导致的矛盾是世界秩序变革的基础,而变革的现实则需要人的主观努力。

在考克斯看来,这两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为了使现存国际结构能够平衡运行地“解决问题”,是服务于现存世界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的。他指出,这些理论运用经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把历史作为一种选矿场,从中选出自己需要的数据,并把它们永恒化(跨历史的国家利益、国家本性和国家间的交往模式),以此来形成一种符合“自然科学范式”的理论,以一种揭示国际关系“客观规律”的“价值中立的理论”出现,把现存世界秩序看成是一种脱离人的创造的产物。考克斯认为,在这种“价值中立”理论的背后是一种维护强权的意识形态。在这里,考克斯强调了理论的阶级性。他认为,“理论总为某些人,为某些目的”服务。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宗旨是倡导世界各国用它们鼓吹的同一的思维方式

(工具理性)来理解国际安全,并以此作为行动指南,从而形成一种知识的话语霸权,达到改变人的“信仰”的作用。这实质上是在引导人们不要企图改变现存的世界秩序,使这种秩序永久化,这是一种为既得利益者服务的保守理论。考克斯声称,自己的“批判理论”就是要质疑国际政治现实的给定性,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其内在的变化性,以便“发现(国际)体系内最有利于变革的地方——为社会与政治改造做一些初步的工作”。总之,考克斯的理论是一种通过批判现存世界秩序与批判维护这种现实的理论去探索公正的世界秩序的理论。

当然,考克斯的理论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也存在不完整性。他的理论强调人的思维的不断反思性和批判性,这对于世界秩序的变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国际关系稳定状态远比变革状态长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稳定因素(或者说共时性因素)与变革性因素(历时性因素)是同样作用于世界秩序之中的,忽视或者仅强调一种因素都不能说是一种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这方面,考克斯的世界秩序理论与同样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正好形成一种反差。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更多地强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共时性因素,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理论特点。正是基于这一特点,沃勒斯坦认识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革命的困难性和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牢固性(尽管沃勒斯坦也承认它存在巨大的矛盾)。与之不同,考克斯的理论特别强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历时性因素和不断革命的可能性(尽管他主张的是一种主观革命,而非暴力革命)。这样的理论对于世界秩序的变革来说尽管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但对相对稳定的世界秩序的分析却缺乏相对的实用性。

(供稿:江育恒 权贤美 左锦涛)

[责任编辑:沈琳]

**【编者按】**随着暑期的结束,各种暑期旅读、暑期实践也相继落下帷幕。这个假期,我系部分同学也参加了这些项目,不过他们是在国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与实践。对于这次难忘的人生体验,他们有许多特别的感悟。相信同学们对他们的经历也充满了好奇与期待。本期“聚焦”栏目便为大家呈上了部分同学在这个假期参加国外旅读或实践的心得体会。如果你希望与作者进一步交流,可联系本刊编辑组!

## 第一部分:伯克利之旅

# 你好, UC Berkeley! ——记伯克利游学

曹滢\*

在决定暑假去伯克利之前,我对它知之甚少。当初做这个决定也只是出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即想要亲身体验一下国外的教育和生活究竟是怎样的。虽然只有短短的 21 天,但是对于初次走出国门的我而言,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而奇妙的邂逅。

7 月 22 日从上海出发,途径韩国仁川,辗转十几个小时,到达旧金山。天气微凉,加州的阳光却是名不虚传地灿烂。在去伯克利的大巴上,一行人兴致勃勃地打量着窗外的世界,完全将长途旅行的疲惫和时差的影响抛到脑后。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坐落在旧金山东湾伯克利市的山丘上,学校没有明显的边界,主要的几条道路走到底都能到达伯克利市区。校内的各个建筑错落有致,其间随处可见油亮的草地。每到午休或是课后,都能看到许多学生在草地上休憩、看书,给人一种宁静致远的感觉。Sather Tower 是伯克利的标志性建筑,正对着金门大桥,凭伯克利学生证可以免费登塔参观,一览伯克利全景,蔚蓝的天空和温柔的阳光成为登高赏景最好的布景,而我上课所在的教室即在 Sather Tower 近旁的 Wheeler Hall 里。

结合南开校历,伯克利开设的暑期课程中只有六周的 Session D 和三周的 Session E 可供选择。前者时间较长,安排的多是一些专业课,而后者则以语言课为主。由于大二的我期末考试结束得晚,所以没有选成六周的课,而是选了一门 Session E——为数不多的非语言课,叫做“和平与冲突研究:冲突解决强化训练”(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Conflict Resolution Intensive Training)。作为国际关系的学生,我先入为主地把这里的 conflict resolution 理解为国际冲突的调停。但实际上,此处的 conflict 更为微观,讲的是人际关系,将其理解为“调解矛盾”更恰当,比如说家庭矛盾、离婚纠纷等。Beth Roy 教授是一位白发苍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有着多年调解矛盾的社会工作经验。她教我们作为一个调解者如何一步一步推

\* 作者简介:曹滢,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0 级本科生。



进矛盾双方的沟通直至达成和解方案。这个过程与电视里某些情感节目所做的有点类似。在美国这种职业调解者是收费的,他们接受冲突方的委托,利用专业知识调解矛盾,推进沟通。

每天正式上课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交流最近与冲突有关的新闻,从大陆孕妇赴港生子引发的口水战到搬迁导致的纠纷,从中国的乌坎事件到叙利亚的武装冲突,这些话题都经过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立即提出,回答的不一定是老师,想回应的都可以讲解一番,比如讲到乌坎的时候,就有中国学生跑到讲台上去给西方学生讲解中国的土地制度和现实的中国国情,特别有意思。每次上课我们都会做很多的角色扮演,不是那种话剧式的表演,而是把自己想象成冲突情境中的角色进行对话和沟通。比如老师曾请来她的老友扮演房东,而我们则是面临房租上涨和被迫搬迁的住户,通过这样的角色扮演来讲解谈判中的弱者应该如何通过组织和团结来获得话语权。

每天课程结束后老师都要求我们写一篇学习日志,可以写一天的收获,也可以记录下遗留的问题和感兴趣的话题。无论是课堂发言还是在日志中提出建议都被认为是对课程的贡献,之后老师就会根据我们的反馈适当调整授课计划,从而更好地在抓住大家兴趣点的同时达成教学目标。虽然这课的重点不在国际冲突,但是由于许多学生都对这方面有兴趣,于是老师就专门组织了一次关于国际冲突的大讨论。也正是在这次讨论中,我听到了许多对于某些国际热点问题的不同观点。不同背景中的人想法固然不同,从而也带来了新的思考空间。

这里尤其使我印象深刻的是,西方学生与老师之间在课堂上的互动真的非常频繁和自然,老师对每个问题的回应也并不是一锤定音式的,而更像是在与学生进行探讨,可以说一节课就是在师生一问一答中推进的。而大多中国学生虽然也有很多想法,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语言能力的限制,从而成为了课堂上相对“沉默的大多数”。事实上,当英语世界里的人们激烈讨论时,整个课堂简直就是一场超级至尊升级版的听力考试!所以有的时候,尽管知道讨论热度在升级却只能一知半解地面面相觑。在这样的形势下,怎能不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有些许的“嫌弃”!

课程最后没有考试,只需要利用第三周的时间交上去一篇 final paper 即可。一些学生对此非常紧张,甚至在赴美之前就已经多番探听,所以老师一再强调:这只是一种工具,只要你真的学到东西了,篇幅不是问题。在上交文章之后,教授给每个人都写了反馈,我看了她给我的建议之后很是感动。相比我的这一门课,同期的其他一些课都有期末考试,平时每晚都要看许多材料,住在我隔壁的一个女生就有晚上在厕所熬夜的经历。所以说,虽然不是专

业课,想好好学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混的。

这个课堂给予我许多东西,其中我最感恩的是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他们有来自国内各个大学的,有来自欧洲国家的,有来自日韩新加坡的,当然也有来自美国本地的。课程之初,我们互不相识,努力地记着各种新名字。课程的间隙,我们相约去旧金山游玩,彼此开始熟络起来。熙熙攘攘的渔人码头、氤氲缭绕的金门大桥、郁郁葱葱的九曲花街,风景如画的旧金山的各种地标都留下了我们的欢笑与足迹。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他们都是那么的优秀,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潜移默化地受到了些感召,颇有些“见贤思齐”的味道。短暂的课程结束那天,老师特别安排了小型的 celebration,让每个人在彼此贴在背上的纸上留言。现在看那天的临别留言以及各种合影,想起那段只属于这群人的记忆,还是会觉得真好。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学好英语真的很重要!这种感悟在连点餐都不太顺利的情境下尤为强烈!个人觉得,对于有出国深造打算的人而言,提前出去一趟还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提前感受一下国外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毕竟出国不只意味着考完一系列入学考试,而是要真正面对可能和现有生活与纯粹想象有所出入甚至完全不同的世界,或者说可以预热一下,看看自己离适应乃至融入国外社会还有多少差距,然后,找好方向,继续努力。

## 学在伯克利

刘明\*

“这里是政治科学量化研究方法的教室吗?”

“是的, @#¥%.....&\*”

这一刻耳边传来的仿佛是天使的声音,多年的英语听力训练更在瞬间证明了其存在的价值。这是“政治科学量化研究方法导论”(Introduction to Quantitate Research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的第一讲,而我在这栋正确的教学楼中找到了唯一正确的教室,一路的慌乱终以喜剧收尾(不过看课表一目十行漏看教室号的行为还是很危险的,之后再没尝试)。这时,空调的凉意开始通过刚被汗水微微浸湿的衬衫透进来,但是依旧不能冷却那激动的心情——我很期待。

然后,一个助教模样的教授走上了讲台,和同学们拉了大概一刻钟的家常后,开讲。

这节课讲的是模型和理性选择的定义,从而为博弈论的展开做铺垫。什么是模型?模型就是对某一结果如何产生的标准化陈述。什么是理性选择?理性选择是指行为者在拥有连贯一致偏好(preference)的前提下总是追求最符合其偏好的结果。为了阐述什么是模型,他

---

\* 作者简介:刘明,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2 级硕士生,曾于 2012 年 6 月在南开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

拿地图做了比喻：一张地图总是只能反映现实的某一特定部分，比如：交通图不能告诉我们这一地区的矿产分布情况；而一张世界地图也不会把伯克利的教学楼一一标明，模型不是写实 (realistic) 的，而是帮助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提取有效信息（主要是因果关系）的指南和工具。接着，他举了“区域隔离”的例子：在美国，许多地方的社区是因种族而异相互隔离的，比如，一条街隔开两个社区，左边住的几乎全是白人，右边则大多是黑人居民。这一现象时至今日还可以看到。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不是特定的种族遭到歧视或者排挤了呢？甚至说，需要政府出台“种族隔离”的政策才会产生呢？谢林 (Thomas C. Schelling) 的模型提出了否定的答案。

谢林的假定是：相同种族的邻居越多，住户越快乐；而当不同种族的邻居数超过所有邻居总数的二分之一时，住户就会移走，直到有至少一半的同种族邻居。作为阐释，教授首先在黑板上随机画了一些 o o 代表两种种族住户的初始分布情况，然后，按照谢林模型的要求他开始这些住户的迁徙之旅，几轮下来，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相同种族的住户不断聚集，最终，“区域隔离”的现象产生了，完全不需要种族歧视或者政府的强制力。

这就是模型的力量。

“那如果我找到一个地方不同种族的人都和谐相处，不管邻居是谁都非常开心，是不是就证明这个模型错了呢？”

“这是个很牛 (excellent) 的问题，不过答案是否定的。模型不是现实的真实反映，而是研究者对现实某一部分的有意识抽取，你不能就假定的对错质疑，而只能针对论证的过程发问。模型的有趣之处在于，你明明知道它的假定总能在现实中找到反例，但却不得不承认借助它可以帮助我们把握社会活动中的某些规律。这当中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

这节课的最后引出了博弈论，博弈论就是在理性选择假定下的一种模型，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博弈者决策本身构成了博弈的条件，最后的结果由所有行动者的策略所决定。作为对比，教授提到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斯密那里，所有的行为者都是自利的，但是在价格机制这一无形之手的调节下，最后实现了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博弈论中，最终的结果可能并不符合集体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和所有参与者的初衷背道而驰，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猎鹿模型”和“囚徒困境”。既然理论上看不见的手可能失灵，那么行为者间的某种沟通协调甚至政府强制力的介入便有据可循了。

以上便是第一堂课的主要内容。

随着课程的开展，上课时内心的忐忑也逐渐消失，甚至面对一些美国学生问出的“脑残”问题也变得习以为常：伯克利的本科课堂，也不过如此嘛。不过，和南开相比，还是有些地方不太一样，列出如下：

### (一) 提问

伯克利学生会随时会举手,老师也经常会上来问一句: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听懂了吗?师生间的交流频繁直接,如果一直有很多双手举着,老师是断然不敢进入下一部分的教学内容的。提问的质量参差不齐,坦白讲,个人觉得很有质量的是少数。不过但凡有人问了一针见血的问题,老师都会给以非常积极的反馈,这种待遇我只得到过一次,但是感觉真的很有成就感(尤其是当前排各国女生回头看你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提问起到了帮助老师实时了解学生对新讲知识点理解程度的作用,只要不是经常有人问比较无厘头的问题,总体来说还是起到了提高课堂效率的作用。当然,这一课堂传统需要师生间的默契,我选的另外一门课上因为某些国家的学生太多,老师每次期待提问几乎都会以失望告终,以至于不得不调整讲课的节奏,因为正常情况下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提问和回应上。所以说学生的质量也很关键,再有耐心的老师,老被问“脑残”的问题也是会 hold 不住的。

### (二) 作业&期中考

在总成绩中,三次课程作业和期中考占了很大的比重。一方面,是让每一阶段的知识点都能通过学生解题的过程巩固下来(这倒是和咱们高中很像),让你平时也没法偷懒;另一方面,这也显著减少了学生应对期末考试(占总分 35%)时的压力。总而言之,这是一项鼓励你平时用功,同时让你爱惜身体,不希望你考前突击的制度安排。

### (三) 讨论课

这门课程周一到周四讲课,周五是分组讨论。教授负责讲课,助教则负责主持每周讨论。讨论课上,助教会帮助大家复习每周新学的内容或者讲解批改完的作业或考试,如果学生有疑问,这时也可以很方便地提出。这样既减轻了教授的负担,对博士生助教的教学能力也是一种培养。另外,因为讨论课人少,相互之间交流的机会也多,讨论课是交朋友的好机会(如果你想的话)。夏学期本来就短,本人一开始还是有点矜持,等到醒悟过来为时晚矣,教训啊!

### (四) 考前复习&附加分题目

这也是助教负责,不过它既不属于讲课也不属于讨论课,可以理解为考前帮大家再开小灶吧。期中和期末考试前各有一次,时间地点和复习材料都会提前通知和下发,考勤也没有要求。附加分题目附在最后一次作业后面,一共四道,多做一道期末考试多 5 分。感觉难度不是特别大,我虽然都做出来了,但因为前两次作业和期中考试发挥得都不甚理想,所以算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这种安排给人的感觉是:老师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尽量学踏实,拿高分。此外,考试内容几乎没有需要死记硬背的成分,注重的是你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这一点倒是和理科很像。反省国内的某些考试:考前突击,考后全忘,无怪乎有人讽刺说老师是假装在教学,学生则假装在学习。不知道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可以在某些具体的制度设计上有所借鉴呢?

六周的时间太短,许多认知难免有偏差和狭隘之处,希望大家能带着批判的态度选择性

吸收。鉴于有些同学可能会好奇，顺便介绍下这门课的主要内容：博弈论（主要介绍几种最基本的模型，重在帮助你明白怎样从博弈论的角度去理解一个问题）；因果推断（什么是有效的因果推断，怎么质疑别人声称的因果关系）；统计推断（就是假设检验、线性回归神马的，但是讲得很透彻，基本上就是你面对一堆数据时能简单建模并理解其含义）。

想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些，最后祝有心负笈海外的同学，都能如愿以偿，去真切感受另一种生活方式，遇见另一个奇妙的自我。然后回来顺道鄙视下这个带山寨味儿的美国大学上课见闻（本人现在是伯克利的粉丝，哈哈，beat Stanford!），不胜期待之至。

## 第二部分：牛津之旅

### 梦想照进现实：不列颠的游学生活

刘雨晨\*

英国，一个彬彬有礼的西方国度；牛津，一个所有学生梦寐以求的古老学校，现在的我坐在牛津大学奥立尔学院的教室里完成这篇稿子，想一想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儿时翻开《哈利波特》的第一页开始，便对这个与我整整相隔整片欧亚大陆的国度产生了深深的憧憬与向往。能够参加牛津这个 Summer School 真的非常幸运，得知这个项目的时候距离报名截止只有一个星期，因为报名的人很多，而我的报名时间又比较晚，差点就与这次机会错过。经过面试，经过等待，经过“兵荒马乱”的签证过程和汇款，直到坐在飞往伦敦希斯罗机场的飞机上，还是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二十几个小时后，我就会坐在牛津大学的课堂上了？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 7 月 29 日，在午夜时分到达了牛津这个宁静的小镇，一觉醒来，为期四周的 Summer School 就开始了。

四周的时间，学校提供了不同的课程给不同专业的同学，主要是经济类与法学类的课程，国际政治专业的同学可以从中选择与专业相关的课程学习。每周一门课，每周进行一次考试，任课的老师都是来自牛津或剑桥的教授和讲师，上课风格或沉稳或富有激情，都让我们领略到了世界一流学府的风范。

参加这个项目的基本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为单位，因为假期时间的原因，中国学生占了大多数，在前两周也经常见到一些外国学生，不过相比于我们，他们在牛津的学习生活早已接近尾声，不过在课堂上，也能见识到在西方教育传统下，师生互动的自然和频繁。虽然和西方国家的学生相比，我们提问的次数较少，但中国学生每次的提问都见解独到，得到老师的赞赏。在四周的时间里，我学习了国际商法与知识产权保护、WTO 与东盟、全球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危机于政府应对这四门课程。虽然课程与专业的相关性不强，但是能够拓

\* 作者简介：刘雨晨，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0 级本科生。

展自己的知识领域, 也对本专业的学习是有所帮助的。

课程之余, 学校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有周末的短途旅行, 有平时的 EVENING TALK, 有牛津的 WALKING TOUR, 我们同学也会约在一起去伦敦、温莎等地游玩。

这一个月, 远离父母和生活了 20 年的中文环境, 在这个项目中, 我们学到的不只是课程本身, 而是在比较中西不同之处的同时, 感受异国的文化与传统。我们能够熟练地买到最优惠的车票, 利用地图在完全陌生的城市中穿梭, 我们曾一天暴走伦敦游览了 11 个地方, 我们在温莎城堡和丘吉尔庄园领略贵族生活的高雅与奢华, 我们在剑桥和伊顿公学感受英式教育的魅力。

时间真的是很神奇, 在我面对着英国至尊黑暗料理时, 总是感叹一个月的时间太长, 在面对复杂的铁路地铁路线图时, 总是有种初来乍到的无措, 但是, 当我们熟悉了牛津街边的小店, 当我们挖出了牛津所有的中国菜和泰国菜饭馆, 当我们熟练使用超市的自动结账机器, 当我们甚至不用看地图就能在伦敦蜘蛛网一样的地铁线路中到达目的地, 当我们觉得自己完全熟悉了这个城市的风格, 跟上了这个国度的脚步 (英国人走路超级快~), 一个月的时间就这么匆匆而过, 转眼, 已经到了要离开的时候。

生命中有些时光会让你快速地成长, 而这样的时光, 值得让我们慢慢回味与纪念。

## 28 Days in Oxford ——记牛津游学感想

赵政\*

这次的 28 天的英国之旅、牛津之行, 于我而言是非常愉悦而新奇的。身边有着同学的陪伴, 旅途以及学习中的种种困难也被共同分担, 因此, 我非常感谢这次的暑期旅程, 我会将我感受到的学习到的与大家分享, 希望能够为我们以后的专业学习以及大学生活有所帮助。

### 生活篇

牛津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 即使是 8 月的旅游旺季, 步行在商铺林立的市中心, 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带给人们的平和、自由的气息。这次负责接待我们的是 Oriel College。Oriel College 为我们提供的宿舍干净整洁, 不少同学的房间里还有钢琴, 居住环境让大家感觉十分舒适。因为正值伦敦奥运会期间, Oriel College 还我们提供了专门观看比赛的 Bar, 我们可以在 Bar 里聊天, 看比赛, 也可以自由的进行桌上游戏。没有课的时候, 行走在牛津的街头, 琳琅满目的纪念品商店, 免费参观的各个学院的博物馆和教堂, 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从到这里的第一天, 我们就决定要走遍牛津的每一寸土地, 更好地融入这座城市。

\* 作者简介: 赵政, 女,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0 级本科生。

## 学习篇

说实话, 起初我对于在牛津的全英文课程是非常担心的, 要在短短的四周之内完成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Global and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和 Financial Crisis and Policy Responses 四门课程以及每周的测试, 不过真正经历下来, 其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困难。第一周的课程确实很艰辛的, “欧洲商法”和“国际政治”专业的内容有很大差距, 很多专业名词都听不懂, 这种情况到第二周有所缓解, 一直到最后能够基本跟上老师的语速。我所感受到的国内外大学教学的最大差别就是课前准备的部分和讨论的环节。每周课程开始之前, 老师都会发给我们很多阅读材料, 我们必须在前一天晚上读完这些材料才能进行第二天的讨论, 有的课程的同学甚至要熬夜才能看完这些材料。或许是语言的问题, 课堂上的欧洲学生还是要比亚洲学生更活跃些。庆幸的是, 每周的考试都是以选择题的形式, 只要认真听课, 通过考试并不困难。28 天的短暂的学习, 或许并不能给专业学习带来太大的帮助, 但重要的是在这段期间内思想的交流以及学习方向和方法的寻找与确定。

## 饮食篇

学院为 Full board 的同学提供一日三餐, 早餐是传统的 British breakfast, 各种饮品和水果供大家自取, 午餐尽量满足中国学生的口味, 此外也提供了正宗的 fish and chips, 晚餐是最丰盛的, 除了汤和主菜, 饭后还有精致的甜点。当然, 在品尝过英国的传统食物之后, 还是会想念家乡的味道, 幸运的是, 牛津这里有世界各地的餐馆, 我们也借此机会尝试了印度菜、泰国菜还有我们的中国菜, 大饱口福。

## 旅行篇

根据学院提供的日程安排, 周末时间是能够自己安排的。来到英国, 一定要到处走走看看。于是在第一周的周末, 我们在 CBL 的组织下, 一起去了 Bath 和剑桥, 参观了古罗马浴场并且在剑河上 punting; 第二周我们国政四人小组开始了暴走伦敦的行程, 在一天之内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大本钟、杜莎夫人蜡像馆等 11 个景点, 坐了摩天轮, 又在第二天在泰晤士河上悠闲的漂流, 并且在 China town 美餐一顿; 第三周是贵族之旅, 去了女王度假的温莎城堡以及享誉盛名的伊顿公学; 第四周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伦敦的律师事务所和银行, 没有浪费地好好领略了英国的古老与发达。

还记得第一周到牛津的时候, 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总是为 28 天的日程安排而发愁, 而今天, 旅程已接近尾声。如果一定要让我说出这次游学的最大的收获, 那就是——自由。学术的自由, 生活的自由, 心的自由。在英国, 在欧洲, 总会有很多艺人, 在地铁, 在街头, 或光鲜, 或落寞, 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自己, 实现着梦想。这样看来, 他们与我们并没有什

么不同,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对待生活,并寻找到生活最重要的部分。这次经历将成为我大学生活中很厚重的一段记忆,也相信它会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给我力量。

最后,要感谢国际关系系的老师们对我们这次游学的支持,同时也要感谢和我一起完成了这 28 天的旅程的刘雨晨同学、吕海同学、廖帆同学,谢谢你们的陪伴与照顾。接下来,让我们回到熟悉的地方,开始新的学习和生活吧!

### 第三部分:印度之旅

## 独有@印度

王芳琳\*

筹划这次的印度之行已经快半年了,期间有许多人告诉我: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家,一个年轻的女子真的不适合去。不知是我的执着,还是我的固执,我依旧去了。当飞机踏上德里的那片土地的时候,盘旋在我脑中的问题是:我能否或者坐上从这里返回中国的飞机?接下来的一个月却用事实告诉我:印度是独有的。

### 这里的美食

饮食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对于历史悠久的印度来说也是,美食一直是不容忽视的部分。在大家的印象中,印度似乎只有咖喱。其实印度还有手抓饼、土豆泥以及各种甜食。

另外,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印度人都喜欢在吃完饭后吃一点甜食(sweets),那是一种甜得发腻的点心。每个人都喜欢生活是甜蜜的,我想他们在吃甜食的时候定是在回忆生活的美好。



现在我特别介绍这种食物,这是一种类似绿豆粉的食物,里面混合了一些牛奶以及葱花,有点甜,有点咸,很奇怪的一种味道。在数次吃饭中,我都见过这种食物。

还有,在那个地方你不会找到任何筷子,几乎所有的印度食物都是用手,只有少量的面食是可以勺子的。一般来说,印度人都会用一点饼子包着一些蔬菜,然后裹

\* 作者简介:王芳琳,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0 级本科生。



着放入口中。在印度是很难吃到肉类的，因为 99% 的印度人都信仰宗教，都是素食主义的。

## 这里的人民

看过印度电影的朋友们都知道，印度人都是能歌善舞的，而且，他们都是很热情和开朗的。走在印度的街道上，会有很多人跟我们打招呼：“How are you?”、“Where are you from?” 当得知我们来自中国后，懂中国话的印度人会立即说“nihao”。

由于印度将英语作为本国的官方语言，所以超过一半的印度人都是会说英语的，但是印式英语由于长久的发展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刚到印度，我都很难听懂他们的英语。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我才能够与他们正常地交流。

虽然是亚洲国家，但印度的很多方面是与西方国家很像的，比如印度人都很喜欢开舞会，我和同屋的几个外国人都参加过印度人的舞会。舞会上，印度人都玩得很 high，他们都很能唱歌跳舞。在平时生活中，印度朋友们会热情得与我们拥抱，亲吻。

印度的家庭还是很保守的。目前大部分的印度家庭都是 joint family。父母是和儿子住在一起，女儿结婚后和夫家住在一起。由于印度没有多层式楼房，都是独立的房栋，所以父母一般住一楼，子女住二楼。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印



度家庭的聚会。在那个聚会上，几乎所有的成员都身穿传统服装。女性身穿纱丽，非常漂亮。

## 这里的景色

在所有去过的地方中，泰姬陵和恒河最令我难忘。

众所周知，泰姬陵是印度知名度最高的景点，几乎是印度的标志。泰姬陵是印度国王沙·贾汗为他的宠妃阿姬曼·芭奴修建的宫殿。泰姬陵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白色，具有很强的欧式风格，建筑物都是穹顶圆柱。去泰姬陵参观的印度人络绎不绝，而且几乎所有去印度的外国人都会去那里。值得一提的是，泰姬陵的门票有两种，外国人的门票费是 750 卢，而印度人的门票费是 10 卢。这样的差距出现在印度所有的景点。泰姬陵的出入检查是非常严格的，当时我的所有食物和中国国旗都没有能够带入里边。进入泰姬陵后，你会发现白色的建筑与蓝色的天空及其地相称。闭上眼睛，你似乎依旧可以感受到几百年前那里的繁华。

印度最著名的一条河就是恒河。为了更好地欣赏恒河，我们来到了瓦拉那西(Varanasi)。

第一天刚到宾馆的时候,我发现宾馆旁边有很多的木头。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些木头的作用,后来才得知这里都是用来焚烧的。每年都有大量的尸体在恒河的旁边进行焚烧,所有的骨灰都是撒入恒河的,而且只有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才有资格死后被焚烧在恒河的旁边。印度人都将此当作极为神圣的一件事情,很多濒死的印度老人为此特意来到瓦拉那西等待最后的时光。我所住的宾馆前面就有一个焚烧场。每天晚上,伴随着凄美的丧乐,一股股烧尸体的气味伴着层层烟雾就围绕在宾馆周围。如果不关窗户,我们根本无法入睡。除了将骨灰放入河流,很多的印度人还在恒河中沐浴。清晨推开窗户,我们就可以看见河檀上站着许多的印度人,他们都在清洗身体并将此当作生命最美好的事情。恒河的日出是极其美丽的。那天清晨,我们5点多就出发来到恒河边,坐上小舟,我们立即进入了恒河的怀抱。恒河其实并不宽,但是抬眼望去,我们依旧无法望到边,只看到那水天连接之处的一点亮光。慢慢地,太阳升起了,却还是依旧隐藏在云彩中。这样的氛围最是舒服,我们的心都沉淀了。反复进入了生命中最安静的时候,没有嘈杂,没有动荡,只有自己的心声。我想这就是许多外国人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寻求生命的本真的原因吧。日出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短短的几千字是远远无法写下我所收获的感受,只希望大家可以从我的描述中对印度有一些真实的了解。

印度是非凡的,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去印度,再去那个孔雀腾飞之地,大象奔跑之所,去探寻生命的意义。

[责任编辑: 郝丽君]

## 英采飞扬

**【编者按】**本期“英采飞扬”所选取的两篇文章与时事较为贴切。第一篇文章“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阐释了“民族国家”的定义和“民族主义”的内涵，并佐以相关的史料，相信可以启发读者对现实的思考；第二篇文章“危机救援基金”则介绍了欧元区国家为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所设立的救援基金，并阐明了不同国家对这些基金的态度及其原因，引人深思。

### Nation State and Nationalism

Jiang Yuheng\*

Nation State is a legal entity with a permanent population, a well-defined territory, and a government capable of managing sovereign authority over the nations or nationality groups living within its legal borders.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nation-state needs to have four basic conditions: territory, population, government and diplomatic recognition. Territory means an area of land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a ruler or state; population equals to all the people who live in a particular area, city or country; government refers to the group of people who rule or control a country; and diplomatic recognition is a political behavior by which one state acknowledges another state or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its legitimacy.

Generally, nations ought to be sovereign. State sovereignty, though its meanings have varied across history, also has a core meaning, supreme authority within a territory. It is a modern notion of political authority. Historical variants can be understood along three dimensions—the holder of sovereignty, the absoluteness of sovereignty,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 of sovereignty. The state is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in which sovereignty is embodied.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s the geographical bases, includes marine sovereignty, the continental shelf sovereign, the atmosphere and outer space sovereignty. As it is known, national sovereignty can be divided into exter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l sovereignty. External sovereignty refers to the independence from any authority outside one's territory; internal sovereignty means supreme authority over all other entities within one's territory. The so-called national sovereignty is the country with the highest processing power and internal affairs of an independent external affairs power and the unity of fundamental rights.

---

\* **Jiang Yuheng** is a seni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especially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ational sovereignty is being eroded by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To safeguar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is the bounden duty of every citizen.

Since there are nations states, emotions and ideas about nations exist. Nationalism is a mind-set glorifying a particular state and the nationality group living in it, which sees the state's interests as a supreme value. Nationalism is essentially requires each nation to form a sovereign state. It can be defined as a deep sense of loyalty and devotion that one feels for one's own race and country.

Self-determination refers to the liberal doctrine that people should be able to determine the government that will manage their affairs. Because of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nations all around the world can be attributable to decide their own system of government, the ruling political party,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so on.

Nationalism is conducive to the collapse of the colonial system. It does good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national economic, political, military and cultural fields. However, since self-determination can cause a large number of national disintegration and separatism, nationalism would also undermine the 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create ethnic hatred.

An ideology is a set of ideas that constitutes one's goals, expectations, and actions. It can be thought of as a comprehensive vision, as a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or a set of ideas proposed by the dominant class to all members of this society. Marx believes the ruling class ideology is a tool of political domination, while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dvocates that the official ideology exists in the dominant society's political culture.

Nationalism is essentially concerned with the national interests and maintains a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performance of national cohesion. Nationalism has obvious self-interest orientation and rash, but no class character.

## The Crisis Rescue Funds

Lyu Hai\*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European sovereign debt crisis, EU has established a lot of rescue funds to help those states who are in trouble. 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 (EFSF) is one of those funds. It was created by the agreement of 27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9 May 2010. Its objective is to "safeguar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Europe by providing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euro area Member States". There are also other funds like European Financial

---

\* **Lyu Hai** is a juni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Stabilisation Mechanism (EFSM). But funds above are only temporary funding programmes. So some EU member states, like Germany, propose to establish a permanent mechanism to replace EFSF and EFSM, both of which are to expire in 2013. What they wish to establish is 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ESM). However, ESM hasn't been established yet because there are three members of the Eurozone who haven't ratified the treaty. The three countries are Italy, Germany and Estonia. Without Germany and Italy's permission, ESM can't come in force because these two countries represent more than 10% of the ESM's 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together over 45% of the total.

You may wonder how these funds raise money. In fact, they are supported by Eurozone states. For example, The EFSF can issue bonds or other debt instruments on the market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German Finance Agency to raise the funds needed. In this way, the EFSF are able to provide loans to Eurozone countries in financial troubles. Emissions of bonds would be backed by guarantees given by the euro area member states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hare in the paid-up capital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That is if there are any losses of EFSF, Eurozone countries will pay for it. The capital guarantees are contributed by 17 Eurozone member states. But EFSF doesn't rely merely on the guarantee of the Eurozone countries. IMF and European Commission also invest money into EFSF. The Eurozone member states account for 59% of the investmen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ccounts for 8% and IMF accounts for 33%. The ESM works in similar way. But since the ESM doesn't exist now, so we don't know who will invest money into it exactly. The ESM will use the money to recapitalize banks or buy sovereign debt in order to help states who are stuck in deep trouble.

Nowadays the guarantee amounts of EFSF are €780 billion. The ESM is expected to have an authorised capital of 700 billion euros of which 80 billion is paid-in capital. That's quite a lot of money, although not every state is able to contribute their money to the funds because actually, many Eurozone countries are unable to help themselves.

But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money in these funds should be increased. Actually, EFSF enlarged its capital guarantee from €440 billion to €780 billion in 2011. However, many think it's not enough. According to Keynes's theories, when facing up with financial crisis, the government should use active fiscal policy to stimulate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ics, such as invest in public works projects to reduce unemployment and boost wages amongst low income groups. What's more, the debts PIGS own are very huge. It will take very long time for those states to repay their debts, so EU needs a lot of money to help those states out of trouble and to rebuild their economies so that they will acquire the ability to pay off what they own.

But countries such as Finland have opposed expanding the money in these funds. One of Finland's officers said that in addition to increasing the capital guarantee, the Government of Finland would be guaranteeing all of the interest and capital raising costs of EFSF in addition to the issued capital. So theoretically, Finland's government would undertake uncapped liability. In order to avoid losses caused by PIGS's default, Finland is against investing more money in these funds. Other countries, like Estonia, said increasing the guarantee amount will breach their constitution and do harm to their economic sovereignty. It's not easy to reach in agreement of increasing money in these funds. Nevertheless, Eurozone countries have to cooperate because they have no other choices.

[整理: 沈琳 孙跃]

[责任编辑: 沈琳]

# 2012 级迎新特辑

## 美丽的南开，你的家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我用青春伴随她。  
 大中路旁杨柳翠，新开碧波映晚霞。  
 古钟悠悠铭校史，主楼巍巍塑英华。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我用一生去爱她。  
 敬业广场书声朗，马蹄湖水映荷花。  
 公能校训记心上，月异日新竞芳华。  
 今日湖畔放声唱，明朝建功在天涯……”



**【编者按】**在这个秋高气爽、硕果累累的金色时节，美丽的南开园，蓬勃发展的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又迎来了一批新生力量。每年的迎新日都是南开最喜庆的节日，也是每届南开新生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季的《新视界》，在这愈渐浓郁的斑斓秋意里，愈发让人真切感受它承载的分量。愿《新视界》陪伴一届届的南开国关人走过每一度春夏秋冬，梦圆南开！

## 【梦圆南开】

### 系主任寄语

国际关系系 2012 级的全体同学们：

大家好！

祝贺大家以优异成绩进入南开大学并来到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学习！南开大学国际政治专业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本科专业的招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在全国同类专业中居于前列。我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在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全球治理与一体化研究、欧盟研究、美国对外政策、中美关系等方面有着突出的研究成果和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60 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获得明显提升。今天，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要。随着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对外交往更加频繁，这些都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也为我们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和学者创造了广阔的空间。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并在这样一个时代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

中国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为我们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中国 100 多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60 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国际交往与外交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研究素材。虽然国际关系学科源于西方，但是，只要我们汲取中国文化的营养，坚持科学、适当的研究方法，广泛地吸收世界上的优秀研究成果，认真总结中国的对外交往实践，我们一定会走出一条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之路，迎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取得理论突破的时代。这是时代对我们的召唤！

大家走进南开园，成为南开的莘莘学子，我相信，大家是满怀着理想来到这里的，希望经过四年的学习成为社会的栋梁。为此，我希望大家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能够不虚度光阴，学有所成。在这里，我愿意跟大家简单地谈谈如何学习国际关系。对于任何一门学问，要学好，首先要有浓厚的兴趣。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培养起自己的兴趣，我们才会学好和掌握一门学问的强烈意愿。对于一门学问，有了学习的意愿还不够，还要学会学习的方法。根据我个人的体验，学习国际关系，要打好扎实的基础，需要学好国际关系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而学好国际关系史和中国外交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和理解这些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与此同时，国际关系研究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需要我们了解和掌握政治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而且,它与政治学的另外一个分支学科比较政治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比较政治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世界上各国的政府和政治制度,只有对外国的政府过程和政治制度有着深入的了解,我们才会更好地理解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另外,国际关系研究的跨学科趋势日益明显,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多涉猎和掌握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如果大家能够做到我上面提到的,你们一定会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宽厚、扎实的良好基础。

南开国际关系学科的教学,无论是在本科还是研究生阶段,都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重经典学术著作的阅读。经典学术著作指的是在不同研究领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突出的代表性成果,例如,国际关系研究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关于层次分析的经典作品《人、国家与战争》、关于国际结构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理论》,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的《权力与相互依赖》、《霸权之后》等等。另外一个特点是注重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训练。科学、得当的研究方法是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保障。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相通的,它们大致都采纳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也有不少学科采用试验的方法。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主要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为了打好基础,我建议大家能够选修《逻辑分析》、《社会统计》、《高等数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等课程,为将来的研究打好基础。

另外,我还建议大家上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打好语言基础,包括中文和外文。虽然大家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语文,但是,我们本科生和研究生在语言表达上都还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连自己的语言都掌握不好,无论将来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任何其他工作,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障碍。况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掌握好自己的语言。就外语学习来说,我们大家多数是学英语的,有的同学也是从小学就开始学习了。然而,由于我们教育体制方面的原因,我们学习英语更多的是为了应试,而在应用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着很大的欠缺。尽管很多人学了多年的英语,可是有多少人能够用它来进行书面或口头的交流?希望大家能够在进入大学阶段的学习后调整外语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方向,注重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真正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这与你参加各种英语水平考试并不矛盾,你的英语水平提高了,参加各种水平考试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大家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是,学习语言贵在长期地积累和坚持。自己计划好,每天都挤出一定的时间进行中英文阅读,或者聆听英语广播或朗读英语,比方说,半个小时,哪怕十五分钟。长期坚持下来,时间长了,你自己就会发现自己取得的进步。

最后,跟大家谈谈我们专业毕业生的去向问题。这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成为掌握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特别是具备独立学习和工作能力的人才。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毕业生有的去国外进一步继续深造,有的在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学习后成为从事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的教学和研究的的高级人才,有的进入国家和地方政府机关从事外交或外事工作,有的进入新闻出版单位工作,也有人从事银行、国际商

务等工作。需要指出的，国际政治算不上时下所谓的“好专业”，也许你并不能在毕业找工作时仅凭国际政治专业一张文凭找到自己想象中的理想工作。可是，大家要记住，大学教育不仅仅是将你塑造成成为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还要让你成为具有独立思考和工作能力、健全人格的人才。我们相信，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训练会使我们的毕业生成为这样的人才，将来无论走上什么样的工作岗位都能很快适应和胜任。我们的一位学生在毕业离校之前曾在南开 BBS 上留下自己的深切感悟：“我经历了几乎每个毕业生都会经历的阶段，跟学弟学妹们说一下，专业没有好坏，可能只有冷热，找工作时专业只是众多敲门砖中的一小块，决胜的关键是你的勤奋与能力。”只要大家在大学四年勤奋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未来一定会掌握在自己手里。在南开，你不必担心没有好书读，老师会指导你读好书，你不必担心学习风气，这里的学习风气会使你用功。“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 韩召颖

2012 年 9 月

【编者按】新生刚刚接触国关，或许对国关是什么还不太了解，对如何学习国关还不太明确，我们在此整理了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斯蒂芬·沃尔特在《外交政策》上发表的对国关新人的建言，希望有所帮助。

## 【大师风采】

### Top Ten Things that Would-be Foreign Policy Wonks Should Study

Stephen M. Walt\*

It's September, which means that students in China (and plenty of other places) are heading off to college for the first time. Some of them are undoubtedly thinking about preparing for career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s a public service to those eager future diplomats (and the parents worrying about their college choices) here's Stephen Walt's Top Ten Things that Future International Policy Wonks Should Learn.

**1. History.** Trying to underst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thout knowing history is like trying to cook without know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lour and flounder. Not only does history provide the laboratory in which our basic theories must be tested, it shapes the narratives different peoples tell themselves about how they came to their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how they regard their relationship to others. How could one hope to understand the Middle East without knowing about the Ottoman Empire, the impact of colonialism, the role of Islam, the influence of European anti-Semitism and Zionism, or the part played by the Cold War? Similarly, how could one grasp the current complexities in Asia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prior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nations and the different ways that Chinese, Vietnamese, Koreans, Japanese, Pashtuns, Hindus, Muslims, and others understand and explain past events?

But don't just memorize a lot of names and dates: seek out teachers who can help you think about the past in sophisticated ways. Among other things, it's useful to know how other societies see the past even if you don't agree with their interpretation, so make sure you read histories written by citizen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if you're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don't just study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world is a lot bigger than that.

**2. Statistics.** Most high schoolers have to learn a certain amount of math, but unless you're

---

\* 斯蒂芬·沃尔特，生于1955年6月，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事务中心教授。《联盟的起源》一书是作者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其他的著作有《革命与战争》、《驯服美国权力》等。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诞生于1970年，创始人是美国政治学“泰斗”亨廷顿，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时事刊物之一。至今，这本以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总部的杂志已经成为了一个云集有深度讨论的论坛和新主张、新观念的信息来源。

going into a technical field, a lot of it won't be directly relevant to a career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But statistics is part of the language of policy discourse, and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basics, you won't be a discerning consumer of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and others will be able to dazzle you with data that may not be right. You can avoid this fate with a little study.

**3. *Foreign Language.*** If you grew up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e headed for college, you probably already speak more than one language. If you're an American, alas, you probably don't. You should. I know that everyone is learning English these days, but learning at least one foreign language provides a window into another culture that you can't get any other way, and also provides a sense of mastery and insight that is hard to achieve otherwise. I'm not particularly good at languages, but I'd gladly trade my mediocre abilities in French and German for real fluency in one of them (or many others). Don't make my mistake: get to the language lab and acquire some real skills.

**4. *Economics.*** Economists aren't the wizards they think they are (see under: 1929, 2007-08), but you can't understand world affairs these days if you don't have a basic grasp of the key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e and some idea how the world economy actually works. I might add that some forms of economics (e.g., game theory) can provide some useful ways of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interaction, provided you don't push it too far. So take enough economics to be able to read the WSJ op-ed page and know when they are BS-ing you.

**5. *International Law.*** You might think that a realist like me would dismiss international law completely, but I took a course in the subject as an undergraduate and have always been grateful that I did. Among other things, it reaffirmed my suspicion that international law is a pretty weak instrument, especially when dealing with great powers. Nonetheless, stat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ors use international law all of the time, and they certainly invoke it to try advance their own particular interests. So it's good to have some idea what international law is, how it works, and what it can and cannot do.

**6. *Geography.*** We often hear that we live in "one world," but it's divided up into lots of regions, countries, areas, and physical configurations, and these variations matter a lot. I don't know when or why we stopped teaching geography, but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 affairs tool kit. I might not go so far as to say "geography is destiny," but just look at all the international issues that you couldn't begin to understand without a detailed knowledge of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 in question. South China Sea? The West Bank? The new sea routes in the Arctic? The list is endless, yet I'm often struck by how little geography most students seem to know these days. Here's a good test: if you were given a map of the world with all the country names removed, how many could you fill in? If you can't get at least 75%, time to get out that

atlas and start brushing up. The exercise will also tell you which regions you may know well and which ones you need to learn a bit more about. If you're still not convinced that geography matters, check out Robert Kaplan's new book.



**7. Get some culture.** Educ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ends toward the technocratic, as the previous items on this list suggest. But some appreciation for art and culture is essential. The music, literature, and visual arts of different societies are where their collective souls reside, and more people have been inspired by poetry, art, and music than by the most compelling regression equations. If you don't know why Picasso, Kurosawa, Shakespeare, Solzhenitsyn, Austen, Ellington, Rushdie, Shankar, etc. matter, then you've missed out an enormous part of the human experience and y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what makes other societies tick will be impoverished.

**8. Learn to communicate.** Based on some of the graduate students I see, I'm not sure this is something most colleges teach anymore. But no matter what path you end up taking in life, being able to write clearly, quickly, and without enormous effort is a huge advantage. I'm not saying you have to aspire to be a prose stylist on the order of George Kennan, Joan Didion, or Paul Krugman, but overcoming the fear of the blank page or screen and developing the ability to write a clear, well-organized argument is an enormous force-multiplier.

While you're at it, hone your ability to speak effectively and persuasively. Regardless of what sort of career you pursue, being able to present your ideas orally will be very valuable. And I'm not just talking about formal lecturing or giving a keynote speech, I also mean knowing how to brief your boss in five-minutes or less, and how to ask a good question. I go to lots of public lectures and seminars, and I'm often struck by how few people know how to ask a clear, sharp and penetrating question. If you master that skill, you'll stand out.

Formal training and activities like debate can enhance these abilities, but mostly they come from practice. Repetition also helps overcome stage fright, and being relaxed while you're speaking is easily worth 10 or 20 IQ points.

**9. What about science?** Most of us had to take a lot of science in high school, and some of us continued to do so in college. Although in-depth knowledge of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computer science, etc., is not directly relevant to many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t is powerfully linked to a host of important political phenomena. How can one understand

cyber-security, climate change, global pandemic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host of other issues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that lies at their core? More importantly,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helps protect you from the proud know-nothingism that is increasingly a badge of honor among some politicians. So stick with some science too. And by the way: if you happen to be interested in topics where science is central (such as arms control or the environment), you'd probably be better off majoring in a relevant scientific field rather than politics or history.

**10. Find your ethical foundation.** Universities teach classes on ethics, but apart from favoring free speech and opposing academic fraud, they don't endorse any particular ethical stance. So don't expect your college to teach you what is right or moral. Nonetheless, if you haven't figured these things out for yourself yet, college is a good time to get cracking on it. You'll meet lots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views on this subject, and engaging with them will help you sort out where you stand. What's your view of the good or virtuous life? Where are the lines that shouldn't be crossed? How do you propose to handle the ethical tradeoffs that will inevitably greet you as you advance through life? And as you study, keep a sharp eye out for role models: which people strike you as admirable and worthy of emulation and which seem morally challenged? And on what basis did you decide?

Alert readers will have noticed that my list looks a lot like the classic liberal arts education. True enough: in a world that is both diverse and changing rapidly, a broad portfolio of knowledge is almost certainly the best preparation for a long career in the field. My list also leaves out variou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hat may be every bit as important as what you do in class, such as living for an extended period in a foreign country. But a solid knowledge of these fields and a serious effort to develop some key skills would serve you in good stead in a wide variety of global professions. And if you end up doing something entirely different, they certainly won't hurt.

And if you're just starting your freshman year, I hope you find the next four years challenging and inspiring. Learn as much as you can, because there will be plenty of tough problems for you to work on as soon as you graduate.

## 【名家话国关】

沃尔兹凭着一双慧眼识破了凡人肉眼视而不见的体系,通过可以明确定义并操作观察的结构,解释了国际政治中少量却重大的规律性结果(如均势的形成),提出了自己的极富科学色彩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就这样,在摒弃行为主义的前提下,沃尔兹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另辟蹊径对传统研究的路径发起攻击,独树一帜地建立起国际政治乃至整个政治学领域中唯一的“科学”、“宏大”理论。这就是沃尔兹的贡献,也正是他的非凡之处。

——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教授 张睿壮

在21世纪,中国面临着崛起成败的历史考验,世界则面临着中国崛起对世界可能产生的不确定影响。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指导我们的现实政策。从中国角度讲,我们可以从先秦思想中汲取大国崛起的经验和学习大国崛起夭折的教训。从世界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思考如何才能使中国崛起有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国际规范的进步。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阎学通

学者对媒体的影响大大小于反向的影响。学者需要通过大众传媒和网络向公众发表观点,但其观点又受制于媒体的取舍,这是学者(特别是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无法自我解脱的两难。从学者的角度说,在坚持正确观点和适应媒体需要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似乎是最佳选择。当一个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发生,学者角色的要求是客观冷静,沉一沉,想一想,在变化中看到连续性和历史长河的阶段性的。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王缉思

毫无疑问,国际政治经济学起源于美国和欧洲学术界,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和欧洲国家之外的学者只能是知识的消费者?在我看来,中国学者要成为知识的生产者也许有许多途径,但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经验,特别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成功经验,是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知识生产者的一个重要途径。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系主任、教授 王正毅

国际关系学必须有国际关系史学作为基础和一大方面内容,而国际关系史学也必须有国际关系学包含的种种理论性范式、观念和命题作为一类基本工具。无论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国际关系史学,就其大者而言之,都需要有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即“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智识恢宏性,或在这个意义上的广阔视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时殷弘

成熟的社会学科所具有的方法论体系是开放的体系,方法论原则是多元主义。人文精神要融入社会科学研究,科学方法要以人文精神为基底。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妨借用一下斯诺命题,开拓一条第三种文化的路径:人文与科学的契合。当然基本假定是,科学的终极关怀和人文的终极关怀都是对人的关怀,如此,融合也就有了前提和基础。

——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教授 秦亚青

由于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适用于不同的国际政治时期,因此,一个国际政治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一个过去的时代,并不代表其自然会成为更好或最好的引导国家现行和未来安全政策的理论。正因如此,当一国决定采用某一特定国际政治大理论来指导其政策时,它的决定不能仅建立在对某一理论的科学价值的评价上,而首先必须看其所在的世界是个怎样的世界,而后再决定某一理论是否适合他所处的世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唐世平

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与时俱进、适时因变的灵活态度,也是值得一体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关注。如果不具有对于形势变化的充分感悟,不具有对于一体化过程的深刻洞见,那么欧洲人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立即就提出有关煤钢联营的区域合作构想,从而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区域一体化的坚实基础;也不可能冷战刚一结束就立即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从而对于欧盟要成长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区域合作组织作出如此迅速的反应。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冯绍雷

国际制度的作用最终体现在其工具价值上,但构成其价值基底的还是规范价值,或称之为道义价值。对一个具体而确定的时代而言,制度是最高意义上的创新力量。制度决定了人们的预期,是终极意义上的行为规范。国际制度的核心道义价值在于,它代表了人类对共同利益和共同正义的追求,并提供了追求这些共同目标的平台,提供约束乃至阻止其他选择的机制,从而创造一种相互信任的预期,规定一种各国国际行为的基本规范。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门洪华

全球性问题不仅关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未来,而且影响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负责任国际形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给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机遇,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机构改革、提高全球意识,以及提供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新理念等方面贡献良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杨洁勉



## 【学习攻略】

### 培养你的专业兴趣

刘志\*

十年寒窗，圆梦南开。欢迎你们，南开国关的新主力！相信作为新生的你们在经过激动的六月和漫长的暑假之后都迫不及待地想见识大学的生活吧？然而，现实与想象的差距却时常存在。新生入学，虽然往往满怀期望，却常常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徘徊在对现状的无所适从和对未来的茫然情绪中。所以尽早认识自己、培养对国关的兴趣至关重要。

大一这一年的学习，我认为还是要更多的将关注点放在专业兴趣的培养和专业知识的学习上，同时又要注意平衡学习、生活和社团这三大方面。我认为，专业兴趣的培养离不开专业课的学习、对本专业课外知识的掌握、专业活动的参加以及和老师同学们的交流。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大一的课程安排。大一课程总体上是以 A 类课为主，专业课科目不多，课时较少，学习难度也不大。但 A 类课绝不可忽视，作为基础课程，它们对国关专业的学习很有帮助。特别是英语，对于我们国际政治专业的同学来说，尤显重要。至于专业课，大一只有 3-4 门，课程内容也不是很难。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保证自己对课堂内容基本掌握的情况下，花更多时间去了解一些和国关相关的、但又是课堂上没有的或者是不会讲的知识。第一学期，阎梁老师主讲的“国际关系概论”这门课程是本专业的基础课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门课程中，阎梁老师幽默风趣的风格会吸引你们的注意力。而第二学期的专业课主要是国关史和中国外交史，大量的人物、精彩的历史相信你们也会喜欢的。这两门课对记忆力的要求稍微高一些。

专业课的“容量”有限，因此新生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本专业的课外知识。我建议可以读一读老师推荐的书目，也可以阅读一些国关名著。了解诸如沃尔兹、基欧汉、约瑟夫·奈、温特、吉尔平、保罗·肯尼迪、基辛格等国关领域顶级学者的著作和思想，也可以关注国内该领域较为著名的如王缉思、阎学通、张睿壮、唐世平、秦亚青等学者的著作。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学习是大有裨益的。此外，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国关的专业杂志（这些老师都会向你们推荐），经常阅读杂志，对你专业素养的提升是很有帮助的。

还有一些提高本专业学习热情的有趣的事情。例如，可以加入系刊《新视界》编辑部，可以多参加一些讲座（每年我们系都会邀请众多的国内外名家来南开讲学），网上也有国关学习的网站。另外，根据个人经验，一定要善于从老师和学长学姐身上学习。南开国关系的老师都有非常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学术道德修养，而且都非常平易近人。他们在课堂上是老师，在课下当然可以是你们的朋友。学长学姐的帮助有时也很重要，只要用心学，总会有所收获。

当然，大学不应当仅仅是学习，否则就显得了无生趣了。在学习、生活以及社团的时间和精力安排上我建议你们有一个清晰的规划。个人认为，学习的时间还是要保证的，在可用

---

\* 作者简介：刘志，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0 级本科生。

的时间(早上7点到晚上10点)内保证至少50%的时间用来学习。社团的话,1-2个为宜,最多不要超过3个,否则你将来会疲于应付。至于生活,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宿舍睡觉和玩游戏,否则大一结束时,你会觉得非常空虚。及时做一些你感兴趣的事情,比如体育运动、音乐等。

当前,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显学了。而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的加快,这门课程也在中国相当受欢迎。我相信你们会爱上这门前途无量的显学的!

## 选择自己的道路,走出自己的特色

王芳琳\*

刚刚提笔,我又放下。这样的犹豫是因为自己只有短短两年大学生涯实在不足以写出经验与总结。我所经历的如此之少,我所感受的如此之少,实在不敢妄自归纳。唯有将自己一直所坚持的,一直所追求的东西与大家分享,那就是:选择自己的道路,走出自己的特色。

回顾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那时的我是盲目的。面对着琳琅满目的课程,丰富多彩的社团与各色各样的活动,我真的很难做出选择。每个人的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我只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一些我更喜欢的。还记得当时我选择了21世纪青年学社、学生国际交流协会与三农学社。奔波于三个社团之间,我每天既充实又劳累。21世纪青年学社所开展的主要是有关中文辩论与英文演讲的活动。由于我喜欢辩论,所以选择了这个社团。而且,我一直认为辩论是很好的,可以锻炼人的口才与思维;三农学社是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社团,平时会组织一些有关三农问题的论坛与讲座;学生国际交流协会则常常开展一些与外国人互动的活动,这个是有利于我的专业学习的。除了社团的活动,学习也是很重要的。在过去的两年中,除了学好本专业之外,我还选修了一些经济学的课程。其实专业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在每一个专业里你都会有许多的收获,前提是你用心去学习。另外,为了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我还学习了拉丁舞与西班牙语。这样看来,我的两年大学生活安排得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我一直保持着坚持自己的心态。不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我都是从自己的兴趣与梦想出发。所以,当你不知道要如何选择时,请走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问问自己的心:我想要的是什么?

世界上有如此多的人,每个人有如此多的相同之处,走出属于自己的特色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请你记住,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当很多人告诉我:你是无法兼顾学习和工作的。事实证明,我做到了;当很多人告诉我:你不可能每天早起跑步。事实证明,我做到了;当很多人告诉我:不要去印度,那是一个奇葩的国家。事实是我去了并且平安地回来了,还收获了许多东西。当你决定不去做那些没有人做到的事情时,你就注定无法拥有自己的特色。这条大学的道路,我们需要留下一些独特的足迹,毕竟我们只有四年的大学时

---

\* 作者简介:王芳琳,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0级本科生。

光。所以，不要去盲信许多人所谓的经验，那些并不适合你们。你们的道路需要你们自己来探索。探索的时候请关注内心，走出特色。

除去那些最深层次的东西，我还有一点感想希望与大家分享。作为一名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在过去两年的学习中我深深地懂得了英语的重要性。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国际时事与阅读国外的著作，阅读英文原版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其次，无论是选择出国还是就业，英语都会帮助你走上更高的平台，而大学四年是提升英语最好的时候；最后，也许所有你背过的课文都可能被遗忘，但是英语的能力会一直伴随你，成为你人生中重要的帮手。记住，只要你认真对待英语，她一定会给你巨大的回报。

再多的嘱咐都是无用，再多的告诫都是无用，人生的路都需要我们自己来走。希望我们都可以跟随本心，无愧我心。

##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 ——致学弟学妹的一封信

孙晶\*

亲爱的学弟学妹们：

两年前，我也跟你们一样，心怀对大学的美好憧憬来到了南开大学，来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那时的我心中充满了对梦想的憧憬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可是同时也充满了迷茫，不知大学生活究竟会是什么样的，该怎样去度过。下面我就“倚老卖老”地与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年来自己的感悟。

进入大学之后，大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大概就是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同学，自己可能不像高中那样出类拔萃了，难免会有落差和压力。但是，只有和优秀的人在一起，自己的内在潜能才更能够被激发出来，你才会更加睿智，更加出色。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摆正心态，保持积极的态度才能拥有精彩的人生。

大学四年真的是白驹过隙。在大学里你才会真切地感受到时光的匆匆流逝。我默默地计算了一下，713天已经从我手中溜走，杳无踪迹。现在是真的后悔自己在大一大二荒废了不少时间，感慨一句“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啊，希望学弟学妹们从大一开始就养成珍惜时间的好习惯，不做拖延症患者，更不要到大三大四时又唱起明日歌。

学习与社团活动是大学里比较占用时间的两大部分，我们也应该投入充足的精力。接下来我与大家分享我对这两方面的一些思考与总结。

#### ● 学习：多读书多看报少玩游戏多思考

也许国际政治不是你的理想专业，你想要转专业（只说一句：不要盲目跟风！），但是说实话不管刚进校门的你是不是喜欢国际关系，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每个人对它都

\* 作者简介：孙晶，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10 级本科生。

会有全新的认识。你会发现自己看待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更加理性，更加客观，渐渐地能透过表象分析事件的本质。这也许是别的专业所给不了的。

对于老师们推荐的专业书目要给予高度的重视，有空的时候细细地读一读。由于刚涉足国际关系领域，不可避免地可能比较难理解某些经典之作，所以鼓励大家主动与老师、同学交流分享自己的疑惑和感想。这非常有助于大家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把握。

同时，平时多看看报纸、看看电视，对国际、国内时事要有一定的把握，并尝试着运用学到的知识去自己解读，也不妨大胆地预测热点事件的后续发展趋势，你也许会由此发现国际政治专业还是蛮有意思的！

最后，英语对于我们专业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无论是词汇还是口语，哪一样都不能撂挑子，不要到最后才悲哀地发现从大一到大四，自己的英语水平是直线下降的。所以在通过四级六级之后，也可以准备考个GRE或者雅思之类的，这样一方面自己的英语能力不会退化，另一方面还可以拓宽自己未来的选择。

### ● 学习与社团：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当然了，刚迈入大学校门的你们对自己都要求得很严格，也许还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专业学习目标。但是，在大一这个年纪，还是要在学习的同时，尽情地享受你的大学时光的。而社团活动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选择社团时不要盲目地跟风，譬如，不能看见一些社团纳新地点前有很多人围观就上前去报名，而是要选择能提升自己比较欠缺的能力的社团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社团。只有在这样的社团里，才能结交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既能快乐地安排自己的课余时间，又能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增加许多美好的回忆。

选择适合自己、自己喜欢的社团之后，积极参加社团活动，等到了大二大三时，可以争取留在一两个社团，做社团的主人翁。大家必然会顾虑学习与社团的关系，认为一边是至关重要的学习，一边是相当精彩的社团，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是鲁迅先生说的好：“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真正给大家造成阻碍的是我们完成工作的效率和对时间的分配。只要你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社团活动，你便可以在取得优异学习成绩的同时享受精彩的社团活动带来的快乐。

在大学里，学习永远是第一位的，社团活动虽然是丰富多彩的，但是要尽量避免与正常学习的冲突。参加了社团，就需要参加会议、组织活动，这些都是需要花费很多课余时间的。所以，在选择的时候，有余力的同学可以参加两至三个社团，切不可贪多。

最后，祝愿学弟学妹们在大学这个大舞台上，尽情地展现自己，带着梦想飞翔，为明天的辉煌而努力奋斗。在大学，让自己做个优秀的大学生；即使做不到最好，也要做个快乐的大学生哦！

## 关于双辅修的一些经验之谈

肖文强\*

对于进入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学生来说,每个专业或多或少总会有一些同学是被调剂进来的。因此,每一年都有很多政府学院的学生选择转专业或者双辅修。转专业与双辅修相比,难度更大,影响因素更多,成功率更低,因而,更多的同学倾向于双辅修。接下来,本文就具体介绍一下双辅修的相关事宜。

一般来说,选择双辅修是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兴趣爱好,希望通过这个途径增长自己的知识,开阔视野;另一个则是为毕业后打算,双辅修一个相对热门的专业,一方面可以增加就业的优势,另一方面,如果要考双辅修专业的研究生,难度也会相对小一些。

双辅修其实就是双修和辅修的简称,两者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区别就在于需要修的学分数量和最后学校给的学位证书不同。以金融学专业为例,辅修修满40个学分就能拿到辅修的证明,不过这个证明只能证明你曾经学习过这门专业,对于找工作基本没有什么用处。而双修则需要修满90个学分才有双修的学位证书,这个证书在就业时比辅修证明更具优势,具备一定的含金量。当然,如果纯粹想要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而不是冲学位去的,完全可以选择蹭课这种更为简单的方式,而不必进行双辅修。

如果坚持要双辅修的话,那就需要做好一些准备。首先是选择第二专业(即双辅修专业)的问题。选择双辅修专业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该专业的就业前景、双辅修的学分绩要求、是否要经过考试选拔、学费、学习该专业的难度等。对于某一专业的就业前景,可以查看学校统计出来的数据,或者网上公布的一些数据,这个因素的变动性还是挺大的,这几年可能就业前景好,过几年也许就相对差一些;学分绩的要求,是因为每个专业接收双辅修的人数都有限额,在竞争的情况下,学分绩低的申请者自然就会被淘汰;这几年来,学校的一些专业由于申请双辅修的人数很多,便设立了考试选拔制度,例如双修金融学专业便需要通过一个数学考试;至于学费,一般是每学分30元,金融学等一些个别专业是每学分100元;双辅修专业的难度,一般体现在是否需要学习数学上。对于经济学院和高学院的专业来说,双修都需要学习4-5门数学课程,虽然是在2-3年内修完,但对于政府学院的大多数学生来说,这是一道不小的门槛,当然辅修是不用的。无论双修还是辅修,都只需要学习该专业的专业课和院公共必修课,而不需要再修校公共必修课。总体来说,双辅修专业的确定,都需要考虑上述因素。有一个特殊的专业需要注意,那便是天津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简称天大工管),天大工管是在大二上学期进行申请、从大二下学期开始进行双修的,这与其他专业从大一下学期进行申请、大二上学期开始双辅修不同。因此,如果在大一下学期申请了双辅修专业却未成功的情况下,还可以在大二上学期的时候关注天大工管的双辅修事宜。在综合考虑后,基本就能确定双辅修哪个专业了。

\* 作者简介:肖文强,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0级本科生。

在确定了要双辅修的专业之后,便是一些学习和心理上的准备了。针对双辅修的专业大多是经济类与商学类,学习上要准备的也就是数学了。我建议,从入学开始就有意识地自学经济类数学,因为在政府学院学习的高等数学像“简化版”,没有深入。当然如果能相应地接触一些双辅修专业的书籍以及旁听一些专业课的课程就更好了。心理上的准备其实更重要,因为双辅修就意味着你的同学在上课的时候你在上课,你的同学在玩的时候你还在上课,这种状态很可能会一直延续到毕业。除此之外,,双辅修的课程在时间上可能会有很多与主修专业的课程相冲突,这便需要在选课的时候格外注意,以免在选课结束之后面临上课时间冲突或者无课可上的困境。一般来说,是会选择优先修完主修专业的。

至于申请双辅修的材料准备,只需要一张申请表和一份本专业的成绩单即可。申请表与成绩单在大一下学期申请时间到了的时候,都可以在院里的教科办取得。将申请表填写完毕后,提交双辅修专业所在的学院进行审核,然后等待通知即可。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只要同学们进行申请便可以实现双辅修的。我们学院对于双辅修的申请基本没有限制,会尽量满足同学们的双辅修申请。但是双辅修的决定权在于对方院系,你的申请表会与来自其他院系也想要双辅修同一专业的同学一起来竞争该专业有限的名额,所以,保证很高的学分绩是你申请中的有力砝码。另外,有些学院会查看你的单项数学成绩。

关键在于之后的学习过程,如果没有第二年转专业或者考取第二专业研究生的打算,所要坚持的原则建议是主修专业优先,但必须兼顾双辅修专业。首先是只有主修专业以及校公共必修课的成绩才是学分绩的组成部分,第二专业的成绩是当作E类课来计算的。换言之,第二专业只要不挂科修满学分就能拿到该学位证,而不影响在班内的排名和拿奖学金等事宜。当然在学习过程中不能仅停留在第二专业不挂科的水平上,不挂科是很容易达到的,要让第二专业学得有价值,必须分配适当的时间来学习。其次,主修专业的学位证书比第二学位更有效力,因此在平常的学习中,必须学好主修专业,其次才是第二专业,时间分配上也应当如此。在选课上也是如此,两者冲突时,先修主修专业,因为第二专业的弥补空间更大。最后,期末考试周对于双辅修的学生来说是一个考验,通常会面临着一天考几门的情况。因此,在准备考试上,就要相应地提前复习,并且还要确认两门专业的考试时间是否有冲突,若有,便需要向院里申请缓考。这一系列双辅修带来的问题,都说明了双辅修并不是什么简单的差事,选择了这条路,就应当坚持下去,尽量不放弃,最终带来的结果也会很美好的。当然也有些双修的学生选择双辅修专业优先,兼顾主修专业。若是打算将来考取第二专业的研究生或者在大二结束之后进行转专业的话,这种做法可以适当考虑。

总体来说,双辅修还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谁也不能肯定第二专业就一定适合自己。但同时它也是一个让人充实的过程,虽然牺牲了玩乐的时间,却增加了新的知识。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关键在于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态度。端正了态度,结果一定不会让你后悔。

## 【班级风采】

### 09IR, 你们最棒!

姜忆楠 任娟\*

又到一年夏末秋初,毕业生对母校的眷恋刚刚沉淀,南开校园就熙熙攘攘地迎来了大一新生,开始演绎与前人相似又不同的故事。而 09IR 也在这喧嚣中,迎来了大学的最后一年。

光阴倒流至三年前,09IR 三十二名成员相聚南开,稚气未脱的脸上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吞吐天地的宏图大志;三年后的今天,昔日的少男少女们少了一丝浪漫与幻想,多了几分成熟与稳重,但不变的是他们追逐理想未曾停歇的脚步和前进路上坚定的目光。一位学姐曾



把 09IR 比作勇敢纯真的格兰芬多。的确,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09IR 都是出色的:京津地区的国关论坛和学术会议上总能看到 09IR 的身影;系刊《新视界》的编辑部自有 09IR 的一份担当;院学生会主席团 7 人中有 4 人来自 09IR……无论在哪里,09IR 总是用热情和真诚感染着每一个人,曾经的风云际会,而今大多已成往事,但那份执着至今仍令人动容。

君子和而不同。尽管人各有志,但这并不妨碍 09IR 成为一个温馨的集体。在破碎纷繁的社会中,它无私地给予每一位成员温暖和鼓励。大学也许如白驹过隙,但大学同学间的友谊将会持续一生,成为值得每一位 09IR 成员珍惜的财富与回忆。也许所有人都会大书特书自己的班级,但在这里还是要说:09IR,你们最棒!

---

\* 作者简介:姜忆楠,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09 级本科生;任娟,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 2009 级本科生。

## 10IR，肆扬青春

张晓康\*

2010年9月，怀有同样梦想的29个青年从五湖四海而来，汇聚一堂，10IR正式成军了。经过军训洗礼的我们在同甘共苦中明白了什么叫“夫欲治国平天下者，必先齐其家”。来到10IR大家庭，我们就是一家人。支部是我家，我们都爱它。为了让国政大家庭更有凝聚力，我们开展了一系列旨在为大家营造共同美好回忆的活动。班级聚餐时的把盏言欢，淋漓酣畅；起航晚会上的歌诗互答，放飞梦想；还有跨年聚会时亲手为家庭成员烹调美食的“忙碌并快乐着”。我们俨然就是一个“大同小天下”。

不论是  
还是素不相  
们都愿意用  
温暖他们。  
日活动中，  
小学，来到  
的一年级小  
讲解党团知  
歌，用行动  
手，星火代  
们聚焦国内  
来到繁华的滨



含苞未放的祖国花朵，  
识的天涯过客，我  
一颗兼爱之心去  
上学期的主题团  
我们走进浙江路  
即将加入少先队  
同学身边，为他们  
识，教唱少先队队  
诠释了“大手牵小  
代传”的精神。我  
发生的“血荒”，  
江道街头，与献血车

内的工作人员奋斗在同一战线：宣传献血知识，鼓励市民奉献爱心，乃至亲身加入献血志愿者的行列。在这个凛冽的冬日，10IR用涌动的热血和满满的爱心融化着路人心里的寒冰。

借着五四评优的东风，我们重点开展了“青年常怀使命感，外交风采代代传”主题团日活动。胸怀天下，我们聚焦热点国际时事；调查民意，我们走进坊间寻常巷陌；条分缕析，我们拨开层层迷雾；唇枪舌剑，我们去伪存真，直指事件本质。任他利比亚是是非非涡旋卷涌，日本地震引发核危机疑点重重，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究竟用心何如……国政学子畅所欲言，不同观点激烈交锋，一场舌辩群英，精彩岂容错过；模拟外交情景，其中暗藏玄机——礼仪错误有几何？看我火眼金睛一一纠来；观看中国外交风云短片，领略前人风采，承续辉煌旅途，国家利益责无旁贷，外交事业有待来者。青年当自强，使命永不忘。明日，我们将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笑傲同侪。

国政人不会停止奋进的脚步，因为我们要让10IR的口号更加响亮：巍巍国政，肆扬青春。同担大任，舍我其谁！

\* 作者简介：张晓康，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0级本科生。



## 11IR 大家庭

彭紫嫣\*

一年前,青涩稚嫩的我们因缘分走在了一起,虽然来自天南地北、说话南腔北调,但也无法阻隔我们那33颗相聚相知相互友爱的热情善良的心。

开学第一天的聚首是新生入学教育,面对着陌生的环境和朋友,我们或羞涩或大方地做着自我介绍。在这一天,我们接受了老师的谆谆教导,也得到了学长学姐的热情关注,但最令我们难忘的是我们30多人会聚一堂,各自用心地记住彼此。从此,也记住了我们拥有一个国政家庭。开学后我们一起组织参与各项班级活动,忙得热火朝天。11IR的同学们,从陌生到熟悉,从开始的安静腼腆到后来的亲切活泼,这个过程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快乐



与温暖。我们一同军训,一起吃苦,同时也感受着集体的荣誉和风采;我们探究争论学术问题时唇枪舌战,争得面红耳赤,但暗地里却也佩服和欣赏对手独特的见解;我们班级五四评优,大家既能在工作时认真投入,有条不紊地完成每项任务,又可以事后调皮玩乐,童真毕露,共享胜利果实;我们聚餐自己动手,买菜、洗菜、切菜、炒菜配合默契,笑声连连,真正融入进了生活的11IR才更显得真实、温暖。

一年过去了,我们还在一起,并且这一年让我们沉淀了许多,坚韧了许多。即将开启的大二新生活,我相信,我们不会疏远,我们的心始终归属于这个温暖的11IR大家庭!

---

\* 作者简介:彭紫嫣,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1级本科生。

**【编者按】**此书目由《新视界》编辑部在征求有关老师建议下草拟,适合对国际关系学科感兴趣的低年级本科生使用,是一份尽可能精简到最少的书目,目的在于帮助大家在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和理论流派有基本的了解。

## 国际关系专业学习入门推荐书目

### 一、国际关系概论

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五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原版影印】**

卡伦·明斯特:《国际关系精要(第三版)》(潘忠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康威·汉得森:《国际关系》(金帆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4 年版。

威廉·内斯特:《国际关系:21 世纪的政治与经济》(姚远、汪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约翰·罗尔克:《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宋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邢悦:《国际关系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 二、国际关系理论

[法] 达里奥·巴蒂斯特拉:《国际关系理论(第 3 版修订增补本)》(潘革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加] 罗伯特·杰克逊:《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宋德星、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译),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3 年版。

[挪] 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白云真、李开盛:《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宋伟:《国际关系理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 三、国际关系史

[美]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7 年版。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香港: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

[美] 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王振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美] 罗伯特·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英] 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加] 卡列维·霍尔斯特:《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 四、经典著作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英] 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美] 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倪世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美]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李保平、郝望、徐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美]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美]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美]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美]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英]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 五、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美]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美] 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挪] 斯坦因·拉尔森:《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美] W·菲利普斯·夏夫利:《政治科学研究方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研究方法（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六、美国外交政策

[美] 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周桂银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

[美] 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傅耀祖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

[美]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韩召颖：《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资中筠、陈乐民：《20 世纪的美国》，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

## 七、推荐访问网站

环球网 <http://www.huanqiu.com/>

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

中新网 <http://www.chinanews.com/world/>

美国 FP 杂志 <http://www.foreignpolicy.com/>

美国 FA 杂志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

美国智库 CFR 网站 <http://www.cfr.org/>

哈佛国际评论网站 <http://hir.harvard.edu/>

耶鲁全球在线 <http://yaleglobal.yale.edu/>

中国国关在线 <http://www.irchina.org>

Theory Talks 网站 <http://www.theory-talks.org>

## 国际关系系 2012 届部分毕业生学位论文题目与毕业去向

姓名	年级	毕业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毕业去向
袁婷	硕士	中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吴志成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
孙严妍	硕士	当代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	吴志成	中华儿女报刊社
徐婕	硕士	爱尔兰与欧盟制宪进程	吴志成	上海银行天津分行
贾方方	硕士	冷战后美国对外军事干涉活动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张睿壮	解放军理工大学理学院
田光强	硕士	冷战后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研究	韩召颖	南开大学读博
胡建东	硕士	中国的“美债陷阱”及其出路	韩召颖	建行宁波分行
刘雯	硕士	日本对东盟地区国家的公共外交	韩召颖	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局 117 勘探队
张宝平	硕士	冷战后中哈能源合作研究	赵龙跃	邯郸某政府机关
邓子立	硕士	冷战后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	王翠文	京信通信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殷茵	本科	浅析中美两国在南海领土争端中的角力	韩召颖	南开大学读研
马倩	本科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双层博弈分析——以国际大豆定价权问题为例	徐振伟	英国杜伦大学留学
毛伟	本科	欧安组织的发展演变与美俄等国的博弈研究	徐振伟	南开大学读研
王萌	本科	普京与叶利钦外交战略的对比——从拉斯韦尔政治人格理论的角度	刘丰	香港中文大学读研
马骥	本科	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	刘丰	东北师大读研
杨小龙	本科	浅析冷战后北约的战略转型——以联盟为视野的分析	霍特	北京大学读研
陈名明	本科	马英九“外交休兵”政策简析	霍特	华润置地(山东)
田凡	本科	李登辉主政时期的大陆政策	霍特	中信银行太原分行
王燕玲	本科	国际河流的争端解决与区域合作——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	霍特	厦门银行
王颖	本科	和平队的成因分析——从美国文化和政府战略的视角	霍特	天津雀巢有限公司
刘明	本科	依附理论能否解释金砖四国的发展问题	阎梁	南开大学读研

孙熙隆	本科	民族文化心理如何影响统一国家形成	阎梁	南开大学读研
余程程	本科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何起源于南欧	阎梁	乌特勒支大学读研
陈凯	本科	影响国际组织多边经济制裁效力的原因探析	阎梁	深圳发展银行天津分行
刘鹏	本科	埃及政治动荡中的美国因素	刘兴华	武汉大学读研
茅军芳	本科	李明博任期内韩国对外政策分析	刘兴华	杭州市人社局
阮艳婷	本科	“韩流”推广与韩国文化外交	刘兴华	中国教育行动支教

[责任编辑: 孙迪 江育恒]

### ..... 罗莎·卢森堡 .....

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Róża Luksemburg, 1871年3月5日 - 1919年1月15日)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

1914年, 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布支持德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她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合作成立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斯巴达克同盟 (Spartakusbund)”, 与社民党内以艾伯特为代表的右倾势力斗争。该组织于1919年1月1日转为德国共产党。1918年11月, 在德国革命期间, 她创办了《红旗报》(Die Rote Fahne), 作为左翼的中央机构。1915年 - 1918年被多次关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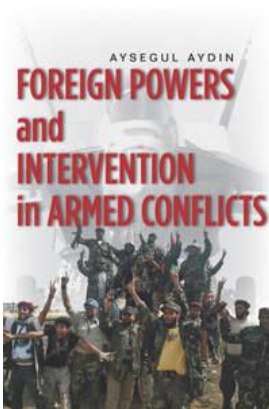
罗莎·卢森堡起草了德国共产党党纲。她认为1919年1月柏林的斯巴达克起义是一个错误, 但起义开始后她还是加以支持。当起义被自由军团 (魏玛政权的右翼敢死队, 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组成) 镇压时, 卢森堡、李卜克内西与其他数百位支持者被逮捕, 遭到严刑拷打并被杀害。

由于他们的死亡, 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烈士。目前德国提供以她为名的左派政党奖学金。

[整理: 孙跃 彭紫嫣 于凯玥 王宝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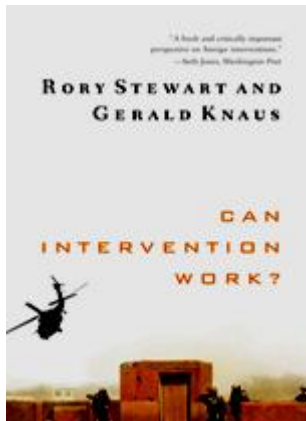
## 新书架 (三)

**【编者按】**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对于国家间冲突和他国内战的干涉在近些年来颇有愈演愈烈之势。目前不断升级的叙利亚问题正是对外干涉问题最鲜活的实例。国家和国际组织是否对国际争端和他国人权、种族等尖锐问题有干涉的权力? 如何干预, 通过什么手段来进行对外干预? 本期新书架展示了相关著作, 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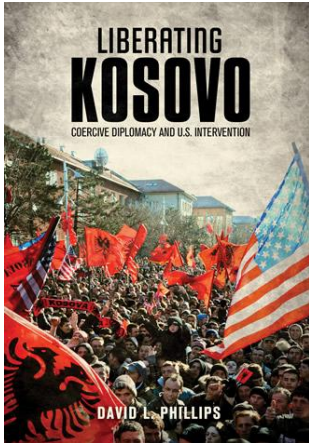
阿耶斯加尔·艾登:《武装冲突中的外国势力与干涉》, 加利福尼亚: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12 年。(Aysegul Aydin, *Foreign Powers and Intervention in Armed Conflict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武装冲突中的干涉对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一直充满了谜题。本书认为重新思考干涉——重新界定什么是干涉以及为什么外国势力对其他国家的争斗有兴趣——在理解冲突如何在外部势力的进出之中发展升级起到首要作用。本书建立了一个新的干涉模型, 超越了经济、国际关系理论、安全研究之间的传统界限, 并把经济利益和国内关于国外势力的政治集团放在了关于干涉决定的中心位置。本书结合历史上和当代冲突的定性和定量的信息, 包括在国际争端和国内战争在内的干涉, 提供了对一系列干预(外交、经济和军事)的深入讨论。同时在国际大环境下, 为读者提供了未来关于干涉问题讨论的综合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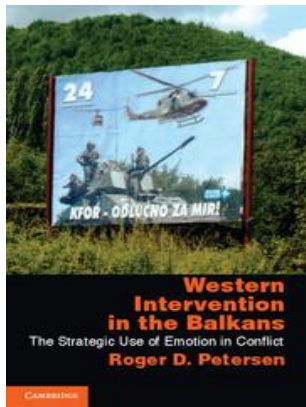
罗里·斯图尔特、杰拉尔德·诺斯:《海外干涉有效吗?》, 纽约: 诺顿出版公司, 2012 年。(Rory Stewart, Gerald Knaus, *Can Intervention Work?*,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2012.)

本书研究了从波斯尼亚到阿富汗大规模海外干涉带来的影响, 为海外干涉提供了新颖且至关重要的视角。两位作者都在海外政治军事干涉上有着特殊的亲身经历。本书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一些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新时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是与非。作者通过对波斯尼亚、伊拉克和阿富汗大量军事行动的深入研究, 揭示了历次军事干涉行动带给国际关系、人权以及人类对民族国家建构理解的巨大影响。作者还剖析了从新保守主义者到自由派的帝国主义者对于实行干涉主义的哲学思考。除此之外, 作者还凭借在军事、非政府组织和伊拉克省政府的丰富经历为我们揭示出我们对大规模海外干涉抱有怎样的期待, 以及海外干涉或将将以怎样的最优方式实现世界上的积极变革。



大卫 L. 菲利普斯：《解放科索沃：强制外交与美国的干涉》，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2 年。（David L. Phillips, *Liberating Kosovo: Coercive Diplomacy and U.S. Interven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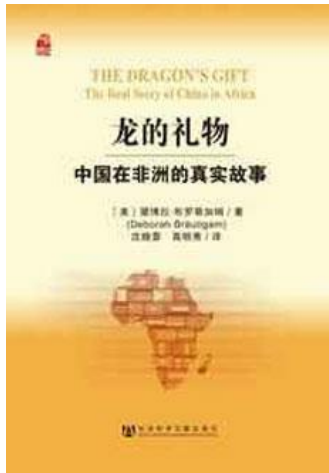
在解放科索沃的问题上，本书作者为读者提供了关于谈判和军事手段如何使科索沃的独立最终达成的令人信服而具有吸引力的解释。20 世纪 90 年代科索沃人被卷入到南联盟严重的种族内战之中，因此科索沃人产生了强烈的独立情绪。1999 年 3 月北约轰炸了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在同年 6 月联合国开始了一系列的关于科索沃问题的谈判，科索沃于 2008 年独立。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对科索沃战争高层参与者的采访，本书记录了米洛舍维奇如何达到权力的顶峰，科索沃人民的痛苦遭遇，以及导致南联盟解体的各种事件。作者分析了北约、联合国、美国所采取的外交、空袭和种种维护和平的措施是如何在科索沃独立进程当中产生影响的。本书同时提出了一个当地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应该在何时采取何种手段来防止种族清理和严重的人权侵害。



罗杰·彼得森：《巴尔干半岛上的西方干涉：冲突中情绪的战略使用》，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 年。（Roger D. Petersen, *Western Intervention in the Balkans: The Strategic Use of Emotion in Conflic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冲突给予人类震撼性体验。体验的影响则通过情绪表现出来。滥杀创造了恐惧；针对性暴力事件产生愤怒和复仇的渴望；政治地位的颠覆萌发了怨恨；文化偏见导致种族蔑视。这些情绪可能成为政治主导者的资源。西方干涉大多基于人性非理性这一观点。相应地，干涉政策大都旨在通过威逼利诱去影响行为。作为回应，较贫穷弱势的一方也利用情绪封锁和改变西方推行的这种政策“游戏”。本书研究了西巴尔干半岛过去二十年中情绪在冲突和干涉中的战略性使用，关注了阿尔巴尼亚人和斯拉夫民族（科索沃、黑山、马其顿、南塞尔维亚）的冲突并与波斯尼亚进行比较。本书系统的将对情绪的研究融入对冲突的研究。由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政治学在干涉政策方面出现了新的发展方向，而本书必和那些新方向有着清晰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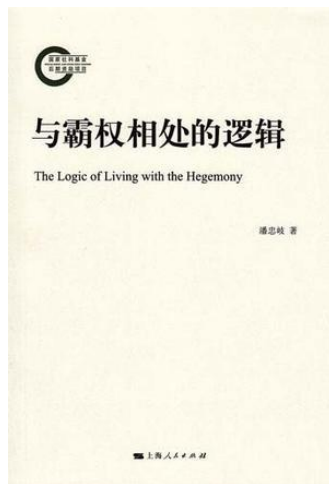




[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沈晓雷、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美国美洲大学国际服务学院教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30 年来一直研究中非关系、外国援助、发展问题,近年来在非洲国家展开翔实调研,对美国、中国和欧洲相关政府机构、企业和国际组织负责人进行了采访。她所著的《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一书还原了几十年来中国的非洲参与历程,澄清了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渲染的不实传言。本书对那些曲解

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言论进行了有力驳斥。黛博拉教授既赞赏中国为非洲带来的财运和机会,也提到了中国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在她看来,“西方把龙当作是强大又有可能对他人构成威胁的象征”,或许非洲人也会有这样的模糊认识,这也是为什么她把书名定为《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的原因所在。



潘忠岐:《与霸权相处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安全关系经历了很多起伏波动,从战略伙伴的终结到战略方向的迷失,经有名无实的战略伙伴和短暂的战略对抗,再到致力于构建新的战略合作,试探新的战略定位。要从根本上认识其背后的逻辑机理,为发展中美安全关系提出建设性的长期方略,必须超越简单的实证分析,从两国战略互动的视角,探讨中美安全关系。作者构建了一个以中美战略互动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全面考察了冷战后美国历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从老布什的领导地位

战略,经克林顿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到小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再到奥巴马的重振领导地位战略,进而分析冷战后美国战略调整对中美安全关系的影响,以及美国霸权战略的困境和中美安全关系的根本难题,为中国更好地与霸权相处提出一些战略性的思考。

(供稿:郭晓琼 杨雪 左锦涛)

[责任编辑:杨雪]

## ♣学术交流♣

## 吴志成教授应邀参加“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国际战略”学术研讨会

(通讯员:郭伟伟)2012年6月8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国际战略”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校、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福特基金会等国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全球治理的新发展和新问题”、“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责任”、“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机制和突破口”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针对目前全球治理中的新问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吴志成教授发言认为,国际主体利益多元化和国际社会民主化程度低是当前制约全球治理发展的主要因素。

与会专家学者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加强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已成为共识;鉴于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增强我国软实力和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要求,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成立将为推动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搭建一个更高、更宽和更好的学术研究平台,构造一个沟通国际国内权威研究机构的学术网络。

## 罗宾·路易斯受聘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并做客“周恩来论坛”

(通讯员:张萌)6月18日,美国环球教育集团董事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SIPA)前执行院长罗宾·路易斯博士受聘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并作为“周恩来论坛”嘉宾在范孙楼116会议室为南开师生带来精彩讲座。致聘仪式上,副校长关乃佳向罗宾·路易斯博士致送聘书并佩戴校徽。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教授主持致聘仪式并介绍罗宾·路易斯简历。政府学院部分师生出席。



致聘仪式后,路易斯教授围绕“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做主题讲座,讲座由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常健教授主持。路易斯教授简单回顾了美欧高等教育的历史、现状,并高度评价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他认为,高等教育没有统一的模式,各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历史传统、文化、资源等因素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在追求量的扩大的同时,也应该注重质的提高,并积极优化利用全球资源为之服务。

在互动环节, 路易斯教授与到场师生就中国高等教育的输入和输出、国家软实力建设、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大学的目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 乔纳森·维尔肯菲尔德受聘南开客座教授

(通讯员: 李金潼 摄影: 徐芳宇) 7月3日, 知名国际冲突与国际谈判研究专家、马里兰大学副校长乔纳森·维尔肯菲尔德 (Jonathan Wilkenfeld) 教授受聘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并做客“周恩来论坛”, 为师生做题为“国际谈判与国际环境”的精彩讲座。



讲座结束后, 为进一步加强马里兰大学与南开大学之间的学术交

流与合作, 乔纳森·维尔肯菲尔德教授还与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有关教师就“Project ICONS”、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 数据库的共享、师生互访等事项进行了认真商讨。乔纳森·维尔肯菲尔德表示, 马里兰大学很愿意与南开大学建立深厚的合作关系, 这次访问南开大学的目的一就是希望与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合作建立国际谈判模拟中心, 借此促进两校在相关学科领域更深入的合作。

乔纳森·维尔肯菲尔德现任马里兰大学副校长兼副教务长, 主管马里兰大学国际合作办学, 是美国国际政治、外交和国际谈判方面的专家。

马里兰大学是美国马里兰州政府所属的公立大学, 始建于 1856 年, 占地 1200 英亩, 是全美最大的校园之一, 也是美国著名的公立大学。马里兰大学拥有丰厚的学术资源, 是华盛顿地域唯一的一所大型综合公立高等院校。2004 年, 马里兰大学与我校合作建立孔子学院, 这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在美国创立的第一所孔子学院。

## 南开大学师生参加 2012 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

(通讯员 摄影: 李金潼) 2012 年 7 月 14-15 日, 在北京西郊宾馆会议室, 主题为“纷争与合作” 2012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召开, 会议由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 王雪莲教育基金资助。来自大陆 60 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港澳台地区和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近千名学者、专家和学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其中 20 余位南开大学在校师生参加了相关小组的主持或讨论。



据悉,今年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召开的第五届年会,与往届年会相比,本届年会的整体规模、参会人数、参展单位等方面又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共同体会议秘书处遴选出2篇优秀论文代表,将资助他们参加2012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美国新奥尔良举行的2012年美国政治学会年会。这表明,学术共同体年会在稳步提升国际国内影响力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和促进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 “长江学者”徐勇教授做客“周恩来论坛”

(通讯员:高雁飞)8月22日,华中师大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徐勇作客南开大学“周恩来论坛”,作了题为“国家化与地方性:地方治理改革的双重趋势”的学术讲座。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教授主持讲座。



徐勇教授针对地方治理改革的双重趋势展开深入讲解,结合“全球化趋势”、“国家性建构”、“地方性复活”、“草根性成长”四个关键词阐述了地方治理改革的国家化与地方性,并指出地方自治必须依托“国家一体化”与“草根性成长”两个条件,最后提出理想化的地方治理改革是双向型运作,即中央权力适度向地方下放及民众对地方治理的适度参与。

徐勇教授的演讲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回应。答疑环节,徐勇教授就制度建构、体制争议等问题与在场师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并对中国的复合性体制问题做了相关补充。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博士后流动站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政治学会会长。

## ♣师生活动♣

## 政府学院第四届中韩交流活动圆满结束

(通讯员:廖明希 王倩雯)7月9日至11日,韩国忠南大学社会学院师生代表团来到南开大学进行为期三天的友好访问,与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师生们共同研究中韩文化,增进两校间的了解与友谊。

7月9日下午,韩国忠南大学社会学院师生代表一行17人到达南开园,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教授带领学院师生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客人。忠南大学师生此行以中韩文化交流为主,分别就中韩的饮食文化、交通文化以及影视娱乐文化三个主题分为三个小组进行对比研究。

7月10日,忠南大学师生在政府学院师生和翻译的陪同下,游览天津著名景点,品尝天津美食,收集小组研究资料。从充满异域风情的意式风情街到热闹繁华的滨江道,从书声琅琅的大学校园到历史底蕴浓厚的古文化街,都让韩国师生流连忘返,两校师生经过一天的相处更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经过前期的精心准备,7月11日下午,“忠南大学——南开大学”学生学习交流成果分享展示会在范孙楼116如期举行。现场气氛轻松活泼,韩国学生形式丰富、风格独特的展示给南开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次交流活动的圆满成功使两校师生加深了了解,使两校的友谊更加深厚。

## 南开学子赴伯克利等高等学府暑期游学拿学分

(通讯员:江育恒)尽管南开大学拟实行的暑期小学期2013年才开始实行,但已有部分学生提前“尝鲜”赴世界一流名校游学。来自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的吕海、刘雨晨、赵政等同学在认真完成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拓展了视野、丰



富了个人经历,圆满完成在暑期学校的学习任务。

7月2日到8月10日,南开大学9个学院的26名学子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加夏季小学期课程,并已经获得全球大学认可的正规学分。

在伯克利,南开学生分别参加了3周或6周的学习,学习了2-3门正式注册的课程,取得了4-6个正式学分。其间,同学们选修了伯克利开设的美国研究、市场营销、组织行为学、心理学、动漫研究、网络程序设计、全球学等工程、社会、经济管理类课程,直接感受伯克利教师的授课风格,并体验

了伯克利学生的学习生活。美国一流名校的全英文教学模式,教师敬业、职业、多元化的授课和课堂组织方式,小组讨论、合作学习和集体评价的互动机制,“精讲、多学、严考”的课程考核模式,以及多样化、分布式的成绩核定方法,让同学们印象深刻,也受益匪浅。

另一支由55名学生组成的游学队伍在7月底奔赴伦敦,参加牛津大学暑期课程,专业涉及经济、管理、法律、行政管理和国际关系等。这也是南开学子首次赴牛津大学参加暑期课程。

学生们抵达后第二天即正式开始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习生活。第一周的生活紧张而充实,每天有四个小时的课程,其余时间安排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由于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学习法律或经济类课程,加上对英式英语发音的不适应,刚开始学习遇到一些困难。不过,同学们在带队老师的帮助和辅导下,很快便适应了新的生活节奏,融入新的学习氛围。经过四周的学习,通过考核者可以获得12个学分。

## 非盟公共管理研修班访问政府学院

(通讯员:杨娜)8月26日,北京大学非盟公共管理研修班一行30余人访问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杨龙教授、韩召颖教授和部分教师代表在范孙楼116与来访客人进行会谈。杨龙教授代表学院对非盟研修班的成员表示欢迎,介绍了南开大学及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概况,并希望非盟在中非学术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韩召颖教授回顾了南开学校的历史,对南开大学师生的对外交流情况进行了简要说明。



国际关系系教师杨娜向非盟研修班成员介绍了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全球治理研究的进展,指出跨学科、跨学校、颇具开放性的全球问题研究所是开展全球治理研究的平台;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非洲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状况研究越来越受关注。国际关系系教师黄海涛提出,中国对非洲的研究分为感知非洲、支持非洲、理解非洲和研究非洲四个阶段,如何使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更有效、更可靠和易被接受是当前非洲研究的关键。

非洲代表对中非贸易合作前景及技术转让、知识交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倡加强中非校际交流合作。双方就非洲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中非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双方就几个方面的合作达成了初步的意向。

北京大学非盟公共行政管理研修班由商务部主办,北京大学承办,分别在5月和8月举行,此次来访的研修班是法语第一期,学员来自非盟总部人力资源、社会事务、战略政策等

部门, 以及部分非洲国家总统 (总理) 府的官员。研修班的举办为非洲官员更多更好的了解中国、促进中非双方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慰问承训官兵和参训学员

(转自南开新闻网) 8 月 28 日,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孙跃、院长吴志成、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奚先来等学院领导以及 2012 级各班班导师、学院团委全体干部一行冒着酷暑, 先后来到迎水道校区和校本部, 实地检阅我院 2012 级全体参训新生, 对承训官兵及参训新生进行了慰问。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一大早, 新生们排着整齐的队列等待学院领导、老师们的检阅。整齐的步伐铿锵有力, 嘹亮的口号震天动地, 抖擞的精神和高昂的斗志无不彰显了政府学院 2012 级新生的精神面貌, 展示了所有参训学员经受军事化训练后所锤炼出的军人气质与风采。



在迎风飘扬的“军训团 7 连”旗帜下, 院长吴志成代表学院对参训官兵表示了诚挚的谢意和衷心的感谢, 并转交了部分慰问品。而后吴院长深切激励所有参训学员, 他指出: 军训是大学生活的第

一课, 是南开公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同学们应该在军训中培养遵守纪律、吃苦耐劳、勇于担当的意志品质, 坚决完成军训任务, 通过军训劳筋骨, 明心志, 强意志, 为未来的大学生活打下良好基础。

最后, 院领导为参训学员送上消暑饮品, 并与参训官兵亲切留影。官兵对学院领导的慰问表达了衷心感谢, 表示会继续做好以后的军事训练, 达到磨练新生意志品质的目的。参训学员也纷纷表示, 一定牢记学院领导老师的嘱托, 以优异的成绩圆满完成军训任务。

##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召开 2012 级迎新大会

(转自南开新闻网) 9 月 2 日,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012 级迎新大会在学生活动中心田家炳音乐厅隆重举行。院党委书记孙跃主持大会, 院长吴志成致辞, 校党委常委、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朱光磊出席会议并讲话。

吴志成在致辞中对 2012 级 447 名新生的到来表示衷心祝贺与热烈欢迎, 并向新同学介绍了学院的基本情况, 同时, 希望同学们在学习之余正确处理好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学习和工作的关系, 更好地成长成才。

心理学系管健副教授代表全院教师发言, 希望同学们在新的学习生活中要怀有理想地学习, 要勤奋惜时, 在学习中逐渐懂得“公能”的价值, 学术的高贵。

老生代表张晓康和新生代表张仕伯、葛佳佳先后发言，一致表示在今后的南开学习生活中，践行公能校训，努力学习，诚信科研，积极实践，做合格的南开人。

朱光磊最后在讲话时与同学们亲切、坦诚地“拉起家常”，他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南开大学也迎来了建校以来的最好发展时期，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术交流等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创建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希望同学们要珍惜在南开求学的宝贵时光，自强自立，刻苦学习，努力成才，勇担重任。

迎新大会在南开大学校歌声中落下帷幕。

[责任编辑: 江育恒 刘芮宁 沈琳]



##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2012年6月——2012年8月)

### 1. 黄海涛:《人道主义干涉的历史进程评析》,载《国际论坛》2012年第4期。

**内容摘要:**人道主义干涉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渊源。尽管不同历史阶段的人道主义干涉理论都在力图论证干涉行为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但相关的实践仍然充满了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实施干涉的动机、过程和效果等方面。通过对其历史进程的考察可以发现,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和实践同特定时期的国际政治因素关系密切。冷战后,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相对增强,人道主义干涉更有可能被其用于改变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石的当代国际秩序。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国际秩序;国家主权

**作者简介:**黄海涛,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外交政策研究、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等。

### 2. 黄海涛:《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基础及其内部冲突》,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内容摘要:**人道主义干涉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传统。然而,人道主义干涉的倡导者们所援引的思想渊源和法律根据并不能有效地成为干涉行动的正当性支持,其中存在较为严重的理论冲突。《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思想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一大进步,尽管在实践中主权国家内可能存在种种问题,但作为一种政治权威,该原则本身仍是中小国家在国际政治现实中抵御强权、维护秩序的最佳且唯一的选择。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正当性基础;正义战争论

**作者简介:**黄海涛,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外交政策研究、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等。

### 3. 徐振伟:《1930年代苏联构建集体安全的失败——一种基于“威胁平衡理论”的分析》,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内容摘要:**1930年代,如何认识和应对德国法西斯的威胁是摆在欧洲各国面前的一道难题。苏联基于自身对威胁的感知,提出共同应对德国威胁的“集体安全政策”,最后以失败告终。从国际关系结盟理论视角来看,沃尔兹代表的“传统结盟理论”认为各国会制衡权力最大的国家,斯蒂芬·沃尔特在对沃尔兹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威胁平衡理论”,认为国家需要制衡对其威胁最大的国家,而不一定是权力最大者。从“威胁平衡理论”的基本观点来看,苏联建立集体安全努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欧洲各国对“谁是最大威胁国家”的不同认定,

进而加剧了集体行动的难度。

**关键词：**威胁平衡；集体安全；苏联

作者简介：徐振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当代国际关系。

**4. 韩召颖、高婉妮：《论跨国倡议网络的作用——以美国和墨西哥劳工运动合作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7期。**

**内容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以及交通、通讯技术的日益发达，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私人基金会、大众媒体、教会、商会、知识分子共同体等非国家行为体在一些特定的问题领域越来越活跃。自这一时期起，美国和墨西哥两国的劳工团体联合人权与环境保护主义等组织，借助《北美劳工合作协定》框架下的合作平台，将维护劳工权益这一传统议题与全球化扩张下的捍卫人权与社会正义等目标相结合，实现了跨国、跨领域的广泛合作。作者利用跨国倡议网络理论，对这一现象发生的背景、条件及作用模式进行了探讨。具体而言，美墨两国劳工运动合作发生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之下，是传统劳工运动陷入困境之后兴起的一种新劳工运动形式。在合作的过程中，参与运动的行为体利用掌握的信息，建构运动象征，并通过对强大行为体的杠杆撬动以及对运动结果的追踪等策略，将“回飞镖模式”与“反向回飞镖模式”结合起来，形成了复合型回飞镖模式。

**关键词：**美国和墨西哥劳工运动；跨国合作；倡议网络；复合型回飞镖模式

作者简介：韩召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美关系、国家安全、国家关系理论；高婉妮，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1级博士生。

##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7期

1. 陈志敏、常璐璐：《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第4-23页。
2. 庞珣：《国际公共产品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第24-42页。
3. 汤蓓：《试析国际组织行政模式对其治理行为的影响》，第43-63页。
4. 韩召颖、高婉妮：《论跨国倡议网络的作用——以美国和墨西哥劳工运动合作为例》，第64-79页。
5. 王军：《多维视野下的网络战：缘起、演进与应对》，第80-98页。
6. 董青岭、戴长征：《网络空间威慑：报复是否可行？》，第99-116页。
7. 郭树勇：《中国特色议会外交刍议》，第117-126页。
8. 王雷：《中国崛起的政治文化变迁与启示——基于逻辑机理、发展进程视角的分析与阐释》，

第127-155页。

### 《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

1. 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第5-38页。
2. 周建仁:《联盟形成理论:评估及对中国的政策启示》,第39-63页。
3. 鞠海龙:《菲律宾南海政策:利益驱动的政策选择》,第78-93页。
4. 钟飞腾:《国内政治与南海问题的制度化——以中越、中菲双边南海政策协调为例》,第94-115页。
5. 马洪喜:《美国主流媒体视野中的中日领土争端问题研究——以〈纽约时报〉(1980-2010年)为例》,第131-146页。
6. 罗国强:《理解南海共同开发与航行自由问题的新思路——基于国际法视角看南海争端的解决路径》,第64-77页。
7. 张卫彬:《国际法庭确定领土边界争端中地图证据分量考——U形线地图在解决南沙群岛争端中的作用》,第116-130页。
8. 陈勇、张昆:《美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国形象”塑造——探析〈时代〉周刊(1949-2008年)的中国报道》,第147-160页。

### 《外交评论》2012年第4期

1. 李国强:《关于南海问题的若干理论思考》,第1-9页。
2. 李晨阳:《对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反思》,第10-20页。
3. 钟飞腾:《南海问题研究的三大战略性议题——基于相关文献的评述与思考》,第21-36页。
4. 任远喆:《南海问题与地区安全:西方学者的视角》,第37-48页。
5. 廖雷:《中国主流媒体在南海争端中的作用与影响——基于信号传递视角的分析》,第49-65页。
6. 葛红亮:《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评析》,第66-80页。
7. 郭宏:《公共政策与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第81-96页。
8. 唐海华:《中欧关系调整下的中国民众的欧盟观——对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焦点团体访谈的深度分析》,第97-111页。
9. 李潜虞:《中国对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政策(1957-1965)》,第112-128页。
10. 蒋华杰:《公共外交的意识形态化:冷战时期中国培训阿尔巴尼亚实习生计划解读》,第129-143页。
11. 李意:《阿拉伯国家的抗争政治:动因及结果》,第144-156页。

**《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5 期**

1. 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第 1-8 页。
2. 王鸿刚:《“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战略博弈》,第 9-14 页。
3. 欧洲所课题组(张健、王莉、王剑南、杨芳、曲兵、李超):《主权债务危机对欧盟外交的影响》,第 15-21 页。
4. 张茗:《“全球公地”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第 22-28 页。
5. 何奇松:《太空安全问题及其多边主义博弈》,第 29-34 页。
6. 黄仁国:《中美“两国协调”(C2)评析》,第 35-40 页。
7. 许勤华:《欧盟能源一体化进程及前景》,第 41-45、51 页。
8. 刘林智:《北非地区动荡化与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第 45-51 页。
9. 肖洋:《西非航线权益博弈及中国的应对》,第 52-57、65 页。
10. 宣玉京:《韩国对朝人道主义援助及其政策》,第 58-65 页。

**《国际问题研究》2012 年第 4 期**

1. 唐家璇:《继往开来,共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第 1-7 页。
2. 崔天凯:《中美在亚太的良性互动》,第 8-11 页。
3. 马振岗:《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第 12-20 页。
4. 潘锐:《“上海公报”发表 40 年与当前的中美关系》,第 21-28 页。
5. 郭震远:《中美合作:特点、影响因素和前景》,第 29-38 页。
6. 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第 39-50 页。
7. 刘飞涛:《美国涉台政策辩论及对台军售政策走势》,第 51-65 页。
8. 时宏远:《美国的印度洋政策及对中国的影响》,第 66-79 页。
9. 刘友法:《未来 10 年中国周边经济安全形势及对策思考》,第 80-89 页。
10. 张贵洪、邱昌情:《印度“东向”政策的新思考》,第 90-103 页。
11. 吴大辉:《新普京时代:危机征候与治理选择》,第 104-118 页。
12. 王毅:《“后时代”的形成及其特征》,第 119-127 页。

**《美国研究》2012 年第 2 期**

1. 孔祥永、梅仁毅:《如何看待美国的软实力》,第 7-28 页。
2. 朱成虎、孟凡礼:《简论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第 29-42 页。
3. 张业亮:《同性婚姻问题与美国政治》,第 43-65 页。
4. 张勇:《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第 66-81 页。
5. 高程:《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第 82-96 页。
6. 冷雪梅:《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从“偏向”到“摊牌”》,第 97-113 页。

页。

7. 陈积敏:《美国非法移民的治理及其困境》,第114-129页。
8. 理查德·范伯格:《学者与决策者的关系——来自白宫的看法》,第130-141页。
9. 赵天一:《奥巴马外交政策评说——读〈塑造历史:贝拉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第142-150页。
10. 叶凡美:《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新作——读戈登·伍德的〈自由的帝国:早期共和国历史(1789-1815)〉》,第151-156页。
11. 李恒阳:《“核安全与地区防扩散形势”研讨会综述》,第157-158页。
12. 李洋、卢宁:《著述巡礼》,第159页。

### 《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

1. 王逸舟:《安全研究新视角——中国人可能的贡献?》,第1-5页。
2. 余潇枫:《国际安全研究是一门“学科”吗?》,第6-13页。
3. 刘德斌:《国家类型的划分——拓展国际安全研究的一种思路》,第14-22页。
4. 朱锋:《巴里·布赞的国际安全理论对安全研究“中国化”的启示》,第23-34页。
5. 张小明:《一部国际安全研究学科史力作》,第35-38页。
6. 崔顺姬:《“积极和平”对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启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第39-44页。
7. 甘均先:《〈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贡献与缺失》,第45-48页。
8. 巴里·布赞、琳娜·汉森、廖丹子:《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中国的反思与借鉴》,第49-62页。
9. 曾向红、辛万翔:《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否必然?——承认理论视角下的一种考察》,第63-84页。
10. 熊志勇:《美国民意看中国六十年——变与不变的趋势分析》,第85-96页。
11. 沈鹏:《美国的极地资源开发政策考察》,第97-116页。
12. 安东尼·H·科德斯曼、刘春梅:《中美在中东和中亚地区的反恐合作——在求索中前进》,第117-136页。
13. 王明芳:《政治动员与冷战后美国对伊朗的政策》,第137-148页。
14. 朴钟锦:《中国“诗赋外交”的起源及近代发展》,第149-162页。
15. 陈锴:《试析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地缘文化关系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之策》,第163-174页。
16. 李玲飞、连玉如:《“亚欧区域整合问题”研讨会综述》,第175-178页。
17. 黄立志:《探寻安全研究的中国视角——比较安全思想学术研讨会综述》,第179-183页。

**《欧洲研究》2012年第2期**

1. 田德文:《国家转型视角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研究》,第1-20页。
2. 马胜利:《法国民族国家和民族观念论析》,第21-32页。
3. 杨解朴:《从文化共同体到后古典民族国家:德国民族国家演进浅析》,第33-48页。
4. 张海洋:《从天主教共同体到失败的民族国家——西班牙国家构建的历史考察》,第49-68页。
5. 赵柯:《“小国家”整合“大民族”——瑞士国家与民族建构的历史进程》,第69-81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课题组(周弘、陈新、熊厚、秦爱华):《2011年欧盟在华投资企业商业景气调查报告》,第82-107页。
7. 吴弦:《欧盟国家利比亚军事干预解析》,第108-121页。
8. 邱美荣、周清:《“保护的责任”:冷战后西方人道主义介入的理论研究》,第122-138页。
9. 陈小鼎:《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应用及其前景》,第139-151页。
10. 杨海峰:《“国际转型中的欧洲:挑战与趋势”——上海欧洲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综述》,第152-154页。

**《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2期**

1. 邓子立、王翠文:《冷战后中国何以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第1-37页。
2. 徐进:《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战略的效用分析》,第38-61页。
3. 杨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2008—2011)》,第62-106页。
4. 江忆恩、胡若愚:《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回应阎学通的“假朋友”理论》,第107-132页。
5. 威廉·卡拉汉、卡宁汉-克洛斯、王垦:《古代中国权力与当代中国思想》,第133-161页。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6, No. 3***

1. Martin Höpner and Armin Schäfer, “Embeddednes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Waiting for Polanyi in a Hayekian Setting,” pp. 429-455.
2. James Ashley Morrison, “Before Hegemony: Adam Smith, American Independ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Era of Globalization,” pp. 395-428.
3. Daniel C. Tirone and Burcu Savun, “Exogenous Shocks, Foreign Aid, and Civil War,” pp. 363-383.
4. Alexander B. Downes and Todd S. Sechser, “The Illusion of Democratic Credibility,” pp. 457-489.

5. William Nordhaus, John R. O Neal and Bruce Russett, "The Eff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on National Military Expenditures: A Multicountry Study," pp. 491-513.
6. Glen Biglaiser and Joseph L. Staats, "Finding the 'Democratic Advantage' in Sovereign Bond Ratings: The Importance of Strong Courts,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pp. 515-53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6, No. 3***

1. Jacob Gerner Hariri, "The Autocratic Legacy of Early Statehood," pp. 471-494.
2.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Inequality and Regime Change: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Democratic Rule," pp. 495-516.
3. Katherine Cramer Walsh, "Putting Inequality in Its Place: R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wer of Perspective," pp. 517-532.
4. Christopher F. Karpowitz, Tali Mendelberg and Lee Shaker, "Gender Inequality in Deliberative Participation," pp. 533-547.
5. Mala Htun and S. Laurel Weldon, "The Civic Origins of Progressive Policy Change: Comba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Global Perspective, 1975-2005," pp. 548-569.
6. Regina Bateson, "Crime Victimiz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p. 570-587.
7. Mahcish Shami, "Collective Action, Clientelism, and Connectivity," pp. 477-500.
8. Nadia Urbinati, "Competing for Liberty: The Republican Critique of Democracy," pp. 588-606.
9. Clifford J. Carrubba and Tom S. Clark, "Rule Creation in a Political Hierarchy," pp. 607-612.
10. Christopher Mecsroth, "Socratic Method and Political Science," pp. 622-643.
11. Mark Andreas Kayser and Michael Peress, "Benchmarking across Borders: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Necessity of Comparison," pp. 661-684.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2***

1. George Lawson, "The eternal divide?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03-226.
2. Kai He and Huiyun Feng,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revisited: Prospect theory, balance of threat, and US alliance strategies," pp. 227-250.
3. Irja Vormedal, "States and market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role of tipping points in international regime formation," pp. 251-275.

4. Jordan Branch, “‘Colonial reflection’ and territoriality: The peripheral origins of sovereign statehood,” pp. 277-297.
5. Iver B. Neumann, “Euro-centric diplomacy: Challenging but manageable,” pp. 299-321.
6. Brian C. Rathbun, “From vicious to virtuous circle: Moralistic trust, diffuse reciprocity, and the American security commitment to Europe,” pp. 323-344.
7. Jeremy Green,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and the Anglo-German prelude to World War I,” pp. 345-368.
8. Bernhard Zangl, Achim Helmedach, Aletta Mondré Alexander Kocks, Gerald Neubauer, and Kerstin Blome, “Between law and politics: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behavior,” pp. 369-401.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1***

1. Stephen Biddle, Jeffrey A. Friedman and Jacob N. Shapiro, “Testing the Surge: Why Did Violence Decline in Iraq in 2007?” pp. 477-500.
2. Robert A. Pape, “When Duty Calls: A Pragmatic Standard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pp. 477-500.
3. John Mueller and Mark G. Stewart, “The Terrorism Delusion: America's Overwrought Response to September 11,” pp. 477-500.
4. S. Paul Kapur, Sumit Ganguly, “The Jihad Paradox: Pakistan and Islamist Militancy in South Asia,” pp. 477-500.
5. Paul Staniland, “Organizing Insurgency: Networks, Resources, and Rebellion in South Asia,” pp. 477-500.
6. Ulrich Krotz, Richard Maher, David M. McCourt, Andrew Glencross, Norrin M. Ripsman, Mark S. Sheetz and Jean-Yves Haine, “Sebastian Rosato Debating the Sources and Prospect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p. 477-500.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2***

1. Elliott Green, “On the Size and Shape of African States,” pp. 229-244.
2. Joshua D. Kertzer and Kathleen M. McGraw, “Folk Realism: Test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Realism in Ordinary Citizens,” pp. 245-258.
3. Mark J.C. Crescenzi, Jacob D. Kathman, Katja B. Kleinberg and Reed M. Wood, “Reliability,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 pp. 259-274.
4. Anthony Mc Gann and Wayne Sandholtz, “Patterns of Death Penalty Abolition,



- 1960–2005: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pp. 275-289.
5. Inanna Hamati-Ataya, “Beyond (Post) Positivism: The Missed Promises of Systemic Pragmatism,” pp. 291-305.
  6. Clayton L. Thyne, “Information, Commitment, and Intra-War Bargaining: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al Constraints on Civil War Duration,” pp. 307-321.
  7. Richard Saull, “Rethinking Hegemony: Uneven Development, Historical Blocs, and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pp. 323-338.
  8. Michael D. Tyburski, “The Resource Curse Reversed? Remittances and Corruption in Mexico,” pp. 339-350.
  9. Philip Arena and Scott Wolford, “Arms, Intelligence, and War,” pp. 351–365.
  10. Garry Rodan and Caroline Hughes, “Ideological Coali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Social Accountability: The Philippines and Cambodia Compared,” pp. 367-380.
  11. Elena V. Mc Lean, “Donors’ Preferences and Agent Choice: Delegation of European Development Aid,” pp. 381-395.
  12. Isa Camyar, “Part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ainstream Parties, Niche Parties, and Trade Openness,” pp. 394-404.
  13. Yury V. Bosin, “Supporting Democracy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hy the Impact of US Assistance Has Been Below Expectations,” pp. 405-412.
  14. Jong Hee Park, “What Determines the Specificity of Subsidies?” pp. 413-426.
  15. Jason Sorens and William Ruger, “Does Foreign Investment Really Reduce Repression?” pp. 427-436.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6, No. 4***

1. Bruce Russett, “Award for Article of the Year in JCR for 2011,” p. 579.
2. Luis de la Calle and Ignacio Sánchez-Cuenca, “Rebels without a Territory: An Analysis of Nonterritorial Conflicts in the World, 1970–1997,” pp. 580-603.
3. Hanne Fjelde and Desirée Nilsson, “Rebels against Rebels: Explaining Violence between Rebel Groups,” pp. 604-628.
4. João Ricardo Faria and Daniel Arce, “A Vintage Model of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pp. 629-650
5. Muhammet A. Bas and Andrew J. Coe, “Arms Diffusion and War,” pp. 651-674.
6. Hoon Lee and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pp. 675-703.

7. Johannes Urpelainen, "Unilateral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Bureaucrats: An International Delegation Problem," pp. 704-735.
8. Patrick Rafail, Sarah A. Soule and John D. McCarthy, "Describing and Accounting for the Trends in US Protest Policing, 1960-1995," pp. 736-765.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9, No. 3***

1. Tim DiMuzio, "Capitalizing a future unsustainable: Finance, energy and the fate of market civilization," pp. 363-388.
2. Andrew Baker, "The public interest' agenc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case of the 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pp. 389-411.
3. Patrick J. W. Egan, "Is worker repression risk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abour rights and assessments of risk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p. 415-447.
4. Juan D éz Medrano and Michael Braun, "Uninformed citizens and support for free trade," pp. 448-476.
5. Ben Clift and Jim Tomlinson, "When rules started to rule: the IMF, neo-liberal economic ideas and economic policy change in Britain," pp. 477-500.
6. Xiaobo Su, "Rescaling the Chinese state and regionalization in the Great Mekong Subregion," pp. 501-527.

***Security Studies, Vol. 21, No. 3***

1. Kenneth A. Schultz, "Why We Needed Audience Costs and What We Need Now," pp. 369-375.
2. Branislav L. Slantchev, "Audience Cost Theory and Its Audiences," pp. 376-382.
3. Jack S. Levy, "Coercive Threats, Audience Costs, and Case Studies," pp. 383-390.
4. Erik Gartzke and Yonatan Lupu, "Still Looking for Audience Costs," pp. 391-397.
5. Jonathan Mercer, "Audience Costs Are Toys," pp. 398-404.
6. Marc Trachtenberg, "A Comment on the Comments," pp. 405-415.
7. Mark L. Haas, "Missed Ideological Opportunities and George W. Bush's Middle Eastern Policies," pp. 416-454.
8. Galen Jackson, "The Offshore Balancing Thesis Reconsidered: Realism,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Europe, and America's Decision for War in 1917," pp. 455-489.
9. Arie Perliger, "How Democracies Respond to Terrorism: Regime Characteristics, Symbolic Power and Counterterrorism," pp. 490-528.

***World Politics, Vol. 64, No. 3***

1. Xun Cao, "Global Networks and Domestic Policy Convergence: A Network Explanation of Policy Changes," pp. 375-425.
2. Moonhawk Kim, "Disguised Protectionism and Linkages to the GATT/WTO," pp. 426-475.
3. Amy H. Liu and Jacob I. Ricks, "Coalitions and Language Politics: Policy Shifts in Southeast Asia," pp. 476-506.
4. Cheol-Sung Le, "Associational Networks and Welfare States in Argentina, Brazil, South Korea, and Taiwan," pp. 507-554.
5. Benjamin E. Goldsmith and Yusaku Horiuchi, "In Search of Soft Power: Does Foreign Public Opinion Matter for US Foreign Policy?" pp. 555-585.

[整理: 刘芮宁 任娟 孙跃]

[责任编辑: 任娟]

## 读编往来

【编者按】金秋九月，我们又迎来了12级的新生力量。本期“读编往来”邀请了一位12级的新同学分享他们面对崭新的大学生活时的心情，同时也收集了一直关注《新视界》的“老生代表”和老师的来信，他们也提出了对于迎新、对于本刊的建议与期待。



李安琪(12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我不知道其他12级新生是怀揣怎样的心情收到南开的录取通知书,我的,很复杂,因为有不干、也有兴奋。同大多数新生一样,我不了解南开,不了解自己的专业,但是这些问题,都因为有热情的学长学姐而一一被解决。而更幸运的是,我有如此的眼福提前看到了系刊——*The New Vision*。

《新视界》让我眼前一亮,更重要的是,为学术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长知识、开眼界。那一刻我很骄傲本系拥有自己的系刊,对于编辑部的学长学姐也是深感佩服哦!尤其是看到毕业感言,真心感受到了你们对南开、对系刊的爱。

对于国关,我关心时政,阴差阳错就被划到了这个专业,所以蛮憧憬即将来临的大学生活。希望贵刊可以更多地增添些迎新的版块,引导我们早点入门。另外,喜欢“英采飞扬”之类的,虽说乍一看不懂,但是的确有益于能力的提高。还有哦,建议刊物内

容更丰富多彩一些,多多交流的栏目。

小编:谢谢安琪的来信!小编首先代表编辑部,欢迎12级的新生力量加入到国际关系系的大家庭来!在这里,你们将展开一段崭新的旅程,而《新视界》将与你们一起,在路上永不止步。作为学生自办的刊物,《新视界》一直致力于为同学们搭建一个相互交流和学习的平台,比如你们此时手中的迎新特辑,正是系刊为大一新生准备的入学礼物。而另一方面,系刊的活力也正是来源于你们,每一年新生力量的加入和成长。

因此,小编希望在系刊上越来越多地看到你们的文字,听到你们的声音。系刊也会一如既往地努力为同学们创造提供交流和沟通的机会,开辟更多的渠道和空间。你们有什么困惑和不解,也欢迎来信咨询,小编会尽心尽力为你们解答。最后,小编代表编辑部对12级的同学们致以美好的祝愿,祝你们在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中学业有成,愉快成长!



赵姝婧(11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又到一年迎新时,依稀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是一名懵懵懂懂的新生,对国际政治这个专业还不甚了解。其实当初报这个专业,完全是因为对国际事务感兴趣,而现在,当年的我们现在还真应了我们的新生辅导员助理庞强学长写给我们的那句话“新生不新,老生不老”。经过一年的学习,对国际

政治这个专业也有了自己初步的了解。说实话,学习的旅程中,除了平常教我们专业课的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之外,《新视界》这本属于我国政人的系刊也是我了解学术前沿的带路人。

如今,《新视界》又要迎来一批新的国政人,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系刊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帮助,在此,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意

见希望编辑部能考虑。很多新生在初入校时,并不十分了解国际政治专业及其研究方向、就业前景等等,我认为迎新特辑应该继续增加介绍一下本专业的相关内容,让学弟学妹们有更深入的了解。另外,为了帮助高年级学生作出更好的选择,可以适当介绍本专业的就业方向、研究方向,同时列出国内外在同一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校和教授以及申请流程。

祝愿《新视界》越办越好,为本专业的建设添柴加薪!

**小编:**谢谢姝婧的来信!一直以来,《新视界》本着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的原则,努力为同学们打造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小编很高兴能够看到,《新视界》能够在你的专业学习上有所助益。而你们的肯定,正是《新视界》成长不可缺少的养分。我们将会继续改进和提高,也欢迎姝婧以及更多同学参与进来,在系刊这个平台上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如今又是一年迎新时,我们再次推出了迎新特辑,希望为12级的学弟学妹更好地解疑答惑。小编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我们会用心做好迎新特辑,为大一新生提供更多更深入的专业内容,同时也会尽力体现学生刊物的特色,提供同学们关心的相关资讯。

再次感谢你的来信和建议,希望你继续支持和关注我们!

**徐振伟**(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作为《新视界》的忠实读者,我们见证了它的诞生、成长与发展,《新视界》刊物质量的不断提升让我们感到高兴和欣慰,也真心感谢各位编辑们的辛勤努力与默默付出。每每拿到新出的一期刊物,总会认真的从头至尾翻看一遍,了解国内外的最新动态。作为一名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和教学的老师,结合自己的实践,我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方面,“国关人物”专栏不仅应介绍当今蜚声国际的国际关系大师,同样应该介绍那些已经故去但仍闪耀着思想光芒并指导人们实践的学术巨星。如修昔底德、爱德华·卡尔、德约·兰克,等等。正是有了他们的前期贡献,后来的学者才能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登高望远。不仅介绍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同样应该介绍他们笔下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际

关系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如俾斯麦、黎塞留、梅特涅、基辛格、苏秦、张仪、李鸿章等人。正是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纵横捭阖,才为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经典案例。同样,他们的人生轨迹以及他们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也为后人汲取人生的智慧从而达到经世致用,以古鉴今;不仅介绍西方的国际关系大家,也应介绍中国的国关大家和名家。

另一方面,《新视界》也应适当涉及国内政治的内容和政治学的相关原理,国际政治从根本来说应是比较政治,内政决定外交,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和延伸,一个国内问题成堆矛盾尖锐激烈的国家,即使其外交策略再成功,外交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而日益崛起和强大的中国不仅让人们看到了自信走向世界的步伐和展示“肌肉”的力量,同样让人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内部自身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存在的问题。因为这种国内治

理和民族国家的整合决定了中国展示自信和力量的强度和长度。卑之无甚高论，以上是我的一点想法，不尽之处请谅解。

给我们写信吧!

把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对我们改善栏目的建议，以及希望得到我们解答的疑惑，发给我们吧！来信请发：[newvision@mail.nankai.edu.cn](mailto:newvision@mail.nankai.edu.cn)。我们将尽可能迅速和详细地回答你的提问。

**小编：**非常感谢徐老师的来信！您的建议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和鞭策。两年来，《新视界》的茁壮成长，离不开您和其他老师的悉心指导。而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师长的建议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支持。小编代表编辑部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地提升刊物质量，拓宽视野的广度。我们也希望徐老师今后能继续关注《新视界》，多多提出批评和指正。

[整理:董柞壮 马垚粮 赵政 左锦涛]

[责任编辑:左锦涛]

##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 一、总 则

1. 正文注释采用页下注（脚注），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2. 注释格式：中文字体为宋体，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字号小五，单倍行距。
3. 学位论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课程论文一般不做要求。
4. 所引资料务必真实、准确、规范。

### 二、中文注释

#### （一）著作

1. 专著：著者，文献名，卷册序号，出版地，出版机构，出版时间，页码。若出版机构名称已包含地名，不必重复注出。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1 页。

2. 编著。应在编者姓名后加“编”或“主编”、“编著”。

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0-68 页。

3. 译著。在著者姓名前可以“[]”标明著者国别；在文献名之后，可标明译者。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六章”。

4. 如著者、编者为二人，两者姓名之间以顿号间隔；如为三人以上，可省略为“×××（第一责任者姓名）等（编）”。

宇燕、盛洪：《旧邦新命》，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146、158 页。

吴志成、薛晓源主编：《欧洲研究前沿报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陈志瑞等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9 页。

#### （二）文章

1. 文集论文：著者，文章题目（加书名号），文集编者名称，文集名，出版地、出版单位及版次，页码。

[美]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17页。

## 2. 期刊论文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09-117页。

## 3. 会议论文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6月15-17日,第3页。

## 4. 学位论文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论文,1999年4月,第55页。

### (三) 其他

如引用资料来自政府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例如: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中国与八国财长就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新华社莫斯科2006年2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室:《中国外交——2006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60页。

## 三、外文注释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释出,可参照相应文献释出的通约惯例。

### (一) 著作

专著:著者,文献名(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著作者姓名以名前姓后的顺序书写。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8.

如为编著,则编者姓名后加“ed.”(编者为一)或“eds.”(编者为二人以上)。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Chapter 3.

如著作者为三人以上, 第一责任者姓名之后可省略为“et al.”(意即 and others)。例如:

Judith L. Goldstein, et al.,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p. 160.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 作者, 文章标题(加双引号), 文集编者, 文集名称(斜体), 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 页码。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2. 期刊论文: 作者, 文章标题(加双引号), 刊物名称(斜体), 刊物出版卷次、期号及年份, 页码。例如: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188-213.

3. 报纸文章: 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报纸名称(斜体)及具体出版日期, 如能注明版面更好。

Joseph S. Nye Jr., “Lessons in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02.

## 4. 会议论文

David Shambaugh, “The 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November 3-4, 2005.

## 5. 学位论文

Ruizhuang Zha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tives: National Interest vs. Id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 p. 9.

### (三) 其他

如引用政府或国际组织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

Daniel Landau,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55.

## 四、重复引用和转引

### (一) 重复引用

如重复引用同一文献,不论中外文,只需注明著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第 101 页。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2-113.

### (二) 转引

#### 1. 中文文献

先将转引文献按上述注释方式释出,以句号结束。再以“转引自”把载有转引文献的来源文献按相应方式释出。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2 页。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1 页。

#### 2. 外文文献

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 194. Quoted in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 19.

## 五、互联网资料

使用互联网资料时,著作者、文献名称等类项同上述相应体例,同时注明详细网址和访问时间。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2009 年 11 月 17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 (最后访问时间:2009 年 12 月 10 日)。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 (最后访问时间: 2009 年 12 月 14 日)。

## 六、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供制作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时参考。

### (一) 中文部分

中文参考文献的书写体例同中文注释体例, 文献排序规则如下:

1. 中文作者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2. 译著按照作者中译名顺序排列。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 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 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期刊和文集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3.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4.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5.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 《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 第 165-176 页。
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 (二) 外文部分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 可参照相应文献的通约惯例。书写体例如下:

1. 第一著作者姓名以姓前名后的顺序书写, 姓名以逗号间隔;
2. 以第一著作者英文姓氏顺序排列, 首行缩进 2 字符;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同一作者姓名多次出现以“——”代替;
5. 期刊和文集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4): 323-353.

- .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 1151-1169.
-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1.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67.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4-41.
- . 2002. "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 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London: Macmillan. pp. 1-18.

## 征稿启事

《新视界》(季刊)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国际关系系学生自筹自办、倡导学术性和生活性相结合的学生刊物。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为师生搭建交流的平台、营造学术的争鸣氛围,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助力。“立足于南开,但又限于南开”,我们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和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主要有学人访谈、学术讲堂、学术论文、书山有路、国关人物、他山之石、新书架、英采飞扬等栏目。另外,根据学科发展及国际形势变化,本刊还适时增设论文工作坊、学界动态、聚焦、笔谈等浮动栏目。本刊欢迎学术性论文(包括书评),国内外国际关系学者访谈、学术历程介绍及轶事,新书评介及学术动态等方面的稿件。来稿正文字数在 10000 字以内为宜。

### 投稿须知: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由于本刊**内部发行,不影响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本刊将竭诚为作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交流平台。
2. 来稿需为 Word 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格式参阅本刊附录《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投稿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mailto: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并提供 200 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职称,邮箱,电话,通信地址等)。
3. 首次涉及的外国人民、地名、机构名及其他专有名词,中译名请参照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并在中译名后括号内注明原文。
4. 所有学术性来稿采取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将在一个月内审读来稿并告知作者是否采用。对拟采用的稿件,编辑部将请作者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并在出刊后向作者寄送该刊物两本。另外,本刊根据栏目需要有权对来稿酌情删改,如不同意请在来稿中注明。
5. 编辑部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中国天津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300071)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mailto: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主页: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